

影响你一生的世界名人·十三

最具影响力的 思想先驱

（上册）

邢春茹 主编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响你一生的世界名人/邢春茹主编.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7.3

ISBN 978 - 7 - 80711 - 716 - 2

I. 影... II. 邢... III. 名人 - 列传 - 世界 IV. 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6743 号

辽海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1960 千字 印张: 110
责编: 于文海 陈晓玉 200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6.00 元 (全 20 册)

前 言

马克思曾经说过：“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以及哲学、宗教和道德等社会科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能深刻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文学的功能是以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是用具体的、生动感人的细节来反映客观世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能使人产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并从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教育和陶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为工具来塑造艺术形象的，虽然其具有形象的间接性，但它能多方面立体性地展示社会生活，甚至表现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展示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

作家是生活造就的，作家又创作了文学。正如高尔基所说：“作家是一支笛子，生活里的种种智慧一通过它就变成音韵和谐的曲调了……作家也是时代精神手中的一支笔，一支由某位圣贤用来撰写艺术史册的笔……”因此，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是社会生活的雕塑师。

文学作品是作家根据一定的立场、观点、社会理想和审美观念，从社会生活中选取一定的材料，经过提炼加工而后创作出来的。它既包含客观的现实生活，也包含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因此，文学作品通过相应的表现形式，具有很强的承载性，这就是作品的具体内容。

文学简史主要指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这跟各国历史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历史的发展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时代背景，而文学的发展也形象地记录了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

总之，学习世界文学，就必须研究世界著名文学大师、著名

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历史，才能掌握世界文学概貌。

为此，我们综合了国内外最新的世界文学研究成果和文学发展概况，编撰了“世界文学知识大课堂”丛书。本套书系共计 20 册，包括《中国文学发展概论》、《中国文学大家》、《中国文学精品》、《世界古代文学发展概论》、《世界古代文学大家》、《世界古代文学精品》、《世界近代文学发展概论》、《世界现代文学发展概论》、《西欧现代文学大家》、《南北欧现代文学大家》、《中欧现代文学大家》、《俄苏现代文学大家》、《美洲现代文学大家》、《亚非现代文学大家》、《西欧现代文学精品》、《东南欧现代文学精品》、《中北欧现代文学精品》、《俄苏现代文学精品》、《美洲现代文学精品》、《亚非现代文学精品》。

本套书系内容全面具体，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和系统性，是广大读者学习了解世界文学的良好读物，也是广大图书馆珍藏的良好版本。

本书由萧枫同志主编，参加编撰的还有宋涛、张林、李雪、胡元斌、窦俊平、廖海丽、聂丽、寻美琴、李娟、鹿清斌、王德雪、张立立等人，在此对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目 录

泰勒斯	1
老 子	4
孔 子	8
释迦牟尼	13
巴门尼德	18
考底利耶	20
伯里克利	24
墨 子	28
德谟克里特	29
苏格拉底	32
亚里士多德	34
柏拉图	36
德摩斯梯尼	41
孟 子	45
庄 子	47
亚历山大大帝	49
伊壁鸠鲁	53
屈 原	55
荀 子	58
阿基米德	60
韩 非	63
董仲舒	65
司马迁	68
盖乌斯·恺撒	70

王 充	73
诸葛亮	76
穆罕默德	82
王安石	85
朱 熹	90
托马斯·阿奎那	93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96
托马斯·莫尔	99
王守仁	102
马丁·路德	105
约翰·加尔文	109
李 贽	113
让·博丹	117
弗兰西斯·培根	120
托马斯·霍布斯	123
阿姆斯·夸美纽斯	126
勒内·笛卡尔	130
黄宗羲	133
王夫之	135
帕斯卡	137
夏尔·孟德斯鸠	139

泰勒斯

公元前 7 世纪至公元前 6 世纪，小亚细亚是当时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汇地，交通方便，经济发达。伊奥里亚地区的米利都城是一个发达的工商业城市，这里产生了古代哲学史上著名的也是第一个哲学派别，主要代表人物即是泰勒斯。他用自然界的现象来说明世界统一的基础，把事物看成是运动的、变化的、发展的。他的思想，表明希腊人开始摆脱蒙昧的神话时代而向理性思维时代迈进，它是希腊人认识史上光辉的起点。

泰勒斯是米利都的本地人，出身于名门望族。关于他的生卒年代，已无法详细考证，但公认为他与梭伦是同时代人，终年约 78 岁。

泰勒斯从事过政治活动，聪明好学，善于思考，是一个富有智慧的人，被誉为希腊七贤之一。关于他的一生有许多轶闻趣事，说明了他的超常智慧和社会影响。

泰勒斯年轻的时候四处游学，他到过埃及参观过胡夫大金字塔，他在埃及学到很多知识，并将这些知识带回到希腊。他利用金字塔影子的长度计算出金字塔的实际高度，他还会用几何学的方法精确地计算出海岸上的船只到岸边的距离。据说，他在一个圆里面画出了直角三角形，并且还为此发现宰了一头牛献祭。

据有关史料记载，数学方面的一个圆被它的直径等分；等腰三角形的底角相等；如果两条直线相交则对角相等；半圆内的内接角是直角以及如果给出一个底边及底边相关的两个角，即可确定一个三角形的定理，都应归功于泰勒斯。

他还是一个天文学家，几乎是第一个研究天文现象的人。他最早研究星象学，并发现了小熊星，第一个测定了太阳从冬至到夏至的运行，并提出月亮的体积只有太阳的 $1/120$ 。他发现了冬至、夏至和

春分、秋分的联系，初步确定了太阳从起点到终点的行程。他还发现了一年的四季，提出四季说，并把一年分为365天。他把精通天文学的知识，用到了增加财富上。有一年冬天他观测来年的气候，并且预言来年的橄榄肯定会大丰收。于是他拿出所有的钱租用了丘斯城和米利都两地的全部榨油器，由于是冬天，闲置的榨油器只要很少的租金。到了橄榄收获的季节，丰收的橄榄需要大量的榨油器，这时，泰勒斯便可抬高价格转让榨油器，为此，他挣了一大笔钱。他用自己的行动向那些看不起知识的人们表明，有知识的人要想挣钱，很容易就能成功。

作为希腊及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的哲学思想是很简单的，他的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是：水是世界万物的本原与实体，万物由水而来，是水的变形，但万物又复归于水。水包围着大地。大地在水上漂浮，不断地从水中吸收它所需要的养分。

泰勒斯之所以把水看成是世界万物的本原，既有从神话世界中吸取的思想成分，也有来自对现实生活的观察。

在希腊远古神话中，就有水神和海神创造万物祖先的说法。但是，泰勒斯哲学观点的形成，最根本的还是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古代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水这种生命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对人们生活、社会生产及万物生长和存在的特殊作用。泰勒斯到过埃及，尼罗河每年的洪水泛滥给当地人民带来衣食之源的肥沃土壤，那里的人们认为，大地是浮在水上的。尼罗河水养育了埃及人民，是埃及文明形成发展的基础。泰勒斯看到这种现实以及地中海，爱琴海汹涌的波涛使希腊成为强邦富国的情况。据此，他相信“地浮在水上”，并解释地震说，这就像船在水上，由于水的运动发生摇摆一样。

泰勒斯把一种具体物质形态作为世界本原，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哲学观念。他的哲学思想使人类最早抛弃用超自然的力量来说明客观世界的神秘观念，是人类在认识世界方面开始从宗教迷信中解救出来的重要标志。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当时的社会变革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奴隶主贵族极力利用宗教迷信来宣扬

他们是神的后代和人间的合法代理人，妄图用神的灵光来维护他们世袭特权的情况下，泰勒斯的哲学观点无疑给奴隶主以沉重打击，反映了工商业奴隶主反对迷信，宣扬科学，发展生产的要求。把水作为万物的起源，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多么简单幼稚，但是，在人类刚刚由神话传说向哲学思维转变的时代，这却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需要很大的精神勇气。

老 子

老子是中国古代春秋时期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全世界最早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伟大哲学家。有关他的生平事迹已难详考。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是春秋时期楚国苦县人（今河南鹿邑县）。

据考证，老子曾做过东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即主管王室藏书的史官。由于这样的原因，老子不仅熟谙典章制度，对政治上的兴亡治乱也多有见闻。

老子感到周王朝的衰亡已在所难免，于是便弃官西走，据说他西出函谷关，骑着青牛，到过我国西北沙漠以西的地方。后来不知所终。

老子经过函谷关的时候，关令尹喜知道他将隐去，请老子著书，于是老子写下了五千字，这就是他惟一的著作《老子》。他的思想主张，大部分也就保存在《老子》这本书里。《老子》共八十一章，分上下两篇，一共只有五千多字。后来的人又称它为《老子道德经》，因为这本书所讲的是道与德的问题。另外又有称它为《道德经五千言》、《老子五千文》的。

目前学术界倾向这一观点：《老子》一书并非老子亲手所著，其中的主要思想都是老子的。它的成书时间不会晚于战国中期。

《老子》一书，文词简短，但比较艰深难懂。后人作了许多注解，最通行的有汉河上公注、魏王弼注和清魏源的《老子本义》等等。虽然经过后人的增订补充，但《老子》一书中的主要思想仍然是老子的创见。通过《老子》这本书，可以了解老子的哲学、政治思想和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古人以为宇宙间的事物都有神在统治着，最高的神就是天，或者称为天帝。天帝是有意志的，它有知识，能喜能怒。

到了春秋时期，这种“天帝”观念开始起了变化。因为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对于天帝统治人民的威力有了怀疑，老子就是较早地从哲学方面有意识地、明确地否认天帝的思想家。

老子否认天帝的存在之后，接着提出了一个“道”是天地万物本源的学说。

老子认为一切都在“道”中，不过在一切还没有从“道”分化出来的时候，只在一种细微原始的状态下存在。

老子认为万物的形成和发展有四个阶段。即“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在这些阶段中，“道”和“德”是基本的，“万物莫不遵道而贵德”，“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中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些论点都表明，万物的形成和变化不是受超自然的意志支配的，也不是有某种预定的目的。这是老子最早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反映。

老子学说的精髓，是他的辩证法思想。

老子从观察天地万物的发展变化，社会历史与政治方面的成与败、存与亡、新与旧、福与祸等对立物的双方面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发现了事物内部所具有的一些辩证规律。

老子首先认识到，宇宙间的事物都是在运动变化之中的。

按照老子万物皆生于“道”的自然观，老子却又认为事物的运动变化只是一个反复的循环而已。

而且，老子还认为万物的生灭变化是没有穷尽的。

他又认识到，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接着又提出，对立的双方是互相转化的。

《老子》一书还深刻地论证了物极必反的道理。

老子还初步意识到量的积累可以引起质的变化。

老子发现并了解事物的矛盾性要比一般的古代哲学家更广泛更深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是不完备的、自发的、朴素的。老子的思想中，仍然有形而上学的观点。

在认识论上，老子分别提倡“为学”与“为道”两种方法。《老子》中说“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并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干，

而是要无所为而为，就是要顺乎自然。

老子从他的认识论出发，在《老子》一书中提出如何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描绘了他所认为的理想世界的图景。

老子反对任何进步的东西，他把历史前进的产物看作是“有为”。不仅在理论上反对“有为”，并且认为“有为”在实践上必然失败，即《老子》中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走以取天下”。

为了反对“有为”，老子主张“无为”。他认为“有为”是从“无为”堕落而来。《老子》中说：“为无为，则无不治”。

他就认为应该用这种无为而治的办法来治理国家。他认为理想的统治者治理国家，是让人民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不要去干涉他们。用无所作为听其自然发展的办法，来达到治理好国家的目的。

在老子看来，虚无的东西才是最有用的东西。道本身就是空虚而看不见的东西。

老子反对用刑、礼、智这些东西来治理国家。他反对重税，反对强大的兵力，反对工商业，反对知识和文化。认为这些都是违反了无为而治的原则。

老子告诫统治者，如果违反了无为而治的原则，就会引起人民的变乱，以至无法维持自己的统治。

老子又主张愚民政策。

从无为而治的观点出发，老子所追慕向往的理想世界，乃是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老子》中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阵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的这种理想社会，是远古的原始社会，这自然是不可能出现的。老子的幻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春秋战国之际，战争频繁，生活动荡不安，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减轻剥削的愿望。但是，小国寡民的理想，是违反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它是一种保守落后的思想。

老子否认天命的存在，打破了天帝的崇高地位，提出“道”来作为天地万物的本源，并且把天地万物的生长、运行和灭亡，看成是自然的作用，并没有什么神的意志在支配。这种思想对我国古时的“神造万物”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很大的进步。

老子提出的对立双方互相转化及物极必反等辩证的思想，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是极为光辉的思想火花，是值得我们特别珍视和骄傲的一份历史遗产。

老子的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是一种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幻想，还有他的哲学思想中形而上学的东西，都是他思想体系中的不足。但不能因此否认老子的成绩和历史地位，老子仍然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道家学说对我国封建社会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老子》一书也是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喜欢阅读的著作。

我国古代哲学家，研究人生的问题比较多些，而对于生活的态度、道德的修养等问题，注意的则较少。老子关于道的学说，第一次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宇宙观，对后来的哲学家有很大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汉朝初年的黄老学说提倡休养生息的政策，就是以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为内容的一种政治学说。历代的封建统治阶级也常常采用老子所阐明的驾驭臣民的法术，来加强他们的权力，巩固他们的统治。

老子的道家本与张道陵创于汉末的道教互不相干，道家是哲学派别，而道教是一种宗教，但张道陵为了吸引群众的注意和信仰，尊老子为“太上之君”，《老子》也成为了道士们诵读的经文。

孔 子

孔子（公元前 551 - 前 479 年），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中国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

孔子的祖先原是宋国的没落贵族，是殷代贵族的后代，后来到了鲁国。

孔子只有 3 岁的时候，父亲孔伋便亡故了。据他自述，在 15 岁时就已经立下了要好好学习各种知识和本领的志愿。

孔子在 19 岁时结了婚。后来孔子逐渐成了博学多能的人。名气也越来越大。他的邻居常夸他多才多艺，但孔子很谦虚地认为自己只会赶车。

大概孔子在 26 岁的时候，才做了一两回小官，一回是当“委吏”，这是管理仓库的小吏，另一回是当“乘田”，这是管理牲畜的小吏。

在孔子 30 岁的时候，开始招收弟子讲学，这是他从事教育事业的开端。他的第一批弟子有颜渊的父亲颜路、曾参的父亲曾点等，以后还有有名的贵族孟僖子的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还有子路、子贡、颜渊、冉有等等。

在洛邑孔子会见了大思想家老子，当时老子正担任“守藏室之史”，孔子依照当时的礼节，从自己车上下来，手里捧着作为见面礼的大雁，把它送给老子。

孔子向老子请教了很多东西，老子都根据事实和情理给孔子作了明确的解答。老子也深深器重虚心求知的孔子。

孔子得到老子的教诲，非常感动，回到鲁国，跟弟子们这样赞美老子：“像龙一样。”

公元前 522 年，齐景公来到鲁国，与孔子问对，很是赞赏孔

子的话。当时鲁国发生了“三桓”叛乱，鲁定公被三桓驱逐出国，孔子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决定离开鲁国。

公元前517年，孔子到了齐国，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有记录的政治活动。

孔子先当了齐景公的亲信高昭子的家臣。齐景公向孔子请教政治的大道理，遭到老政治家晏婴的反对，孔子便干脆离开了齐国。回到鲁国，这一年孔子37岁。回国之后，孔子便继续从事教育事业。

公元前501年，也就是鲁定公九年，孔子51岁，在鲁国当了中都宰。中都宰是中都的行政长官。孔子做了一年中都宰就很有成绩，当时各诸侯国都想学孔子的治理方法。于是，孔子由中都宰升为司空，司空是掌管工程的长官，不久他又由司空而为司寇，司寇是掌管司法的长官。

这个时期，孔子虽然担任司寇，可是他是主张用道德来感化人民的。

鲁国在政治、外交上取得胜利，又削弱了贵族势力，因而国内的秩序暂时安定下来。这就更加重了齐国的忧虑。为此，齐国君臣经过商议，又想出一个对付鲁国的办法，即通过离间鲁国君臣关系，来逐步削弱鲁国的力量。孔子的处境显得越来越尴尬。于是孔子辞了职。

孔子辞职后，率领弟子离开鲁国去了卫国。

卫灵公听信谗言，便派公孙余假监视孔子的出入，孔子感到很别扭，就决定离开卫国。

公元489年，吴国大举攻陈，陈国陷入混乱。孔子听说当时楚昭王非常开明，正好楚昭王也希望孔子能到楚国去，曾派人来接，于是孔子决定到楚国去。

孔子走到楚国边境上，楚昭王打消了用孔子的念头。

经过一番思考，孔子决定还是回卫国去。孔子再一次来到卫国，卫灵公也有意请孔子来担当重要职务。

过了两年，吴国进攻鲁国，曾为孔子弟子的冉有等七百名武士，英勇杀敌，坚决抵抗，吴国方才退兵。季康子感到鲁国情势

这样危急，又见孔子的弟子们这样有才能，于是便派人到卫国来请冉有。孔子非常得意地说：“这回有回国的希望了。”

冉有回到鲁国，当了季氏的家臣总管，不久齐军入侵鲁国，冉有作为统帅打了胜仗，立了大功。季康子问孔子是何样人，冉有如实叙说了孔子的才能和抱负。

季康子遂派人带了重礼，迎接孔子回国。这是公元前 484 年。孔子已经 68 岁了。他离开鲁国，在各地过了 14 年的漂泊生活。现在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故土鲁国。

经过 14 年的奔波，孔子对政治生活不那么热切了。他觉得他不朽的事业还是文化教育，于是他把他晚年的主要经历投在教育事业上。

西周以来的文化教育为奴隶主贵族所垄断，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权利，这种教育叫“官学”。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打破“官学”限制，开创私人讲学的人。他主张“有教无类”。从而打破了周代贵族教育的等级界限，使教育及于平民，这在当时是进步的。

孔子主张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士”、“君子”。“士”是周代统治阶级中的最下层，“君子”是在位者的统称。所谓“学而优则仕”，即是说学好了就能做官。

孔子很注意对学生性格的了解和培养。他针对弟子不同的性格施于相应的教导。

孔子注重诱导式的启发教育，而不是要求学生死读书。他的教育方法，是建立在学生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

孔子对弟子使用的语言，往往是含蓄而形象，耐于咀嚼。他的循循善诱、触类旁通的启发教育在教育史上是有卓越贡献的。

孔子在当时以博学多能著称。他的博学是由于“学无常师”，“不耻下问”得来的。他教育学生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在教导弟子的时候，最反对主观自是，他说要杜绝四种弊病：一是捕风捉影的猜想；二是把事情看得很死；三是固执自己片面的看法；四是把主观的“我”看得太大，处处放在第一

位。他教育学生在知识上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孔子常常以自己的不断求知、积极学习的态度来鼓舞弟子。他所谓的“学”主要是指人伦道德的修养和力行方面。他强调“行”的重要，但他也很重视读书。

在学与行的关系上，孔子主张学行并重。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即学和思的关系是辩证关系，两者不可偏废。从《论语》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所讲的“思”就是推理，有所发明。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周礼”即当时的奴隶主贵族制度几乎是最完美的制度。他说：“周兼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认为到了春秋末期就是“天下无道”了。所谓“无道”，就是天子诸侯、大夫、陪臣等级制度不能维持了。

孔子认为“礼”必须以“仁”为其先决条件。把“仁”应用到政治上，就是他的“爱众”的思想，这是孔子所讲“仁”的内容的另一面。那么怎样做才能达到“仁”呢？孔子提出两种方法：一是忠恕违道不远；二是克己复礼为仁。

但是孔子认为“仁”的世界观只有封建阶级的“君子”才能俱备，小人是无缘份的。这是孔子思想的局限。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这是孔子对传统有神论的一种修正。

但是孔子所了解的“天”似乎也有神秘的一面。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把“命”视为是一种与人对立的、异己的力量。

孔子虽然认为人的生死富贵以及成功失败，是由天命决定的，但是人还是可以尽自己的力量，做他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孔子对于“鬼神”的存在持比较明确的怀疑态度。孔子还经常把诗歌和音乐当作向弟子进行教育的重要科目之一，他对音乐十分精通，且充分肯定诗歌的价值。

孔子晚年在鲁国集中力量把古代相传下来的文献加以整理，

参考了大量各国的史书，着手编写了历史著作《春秋》。《春秋》是我国保存下来最早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它具有鲜明的时间观念，记载历史事件，天文现象（如日食、月食发生的年、月、日），都很准确。它的另一个特点是神话色彩很淡，主要是写人的历史，这在 2000 多年前是难能可贵的。《春秋》中虽然有不少孔子的企图，但他是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来编写的。孔子在编写《春秋》上，删繁就简，千锤百炼，一丝不苟。他自己曾说：“后代人知道我孔丘的，将因为这部《春秋》，后代人责骂我孔丘的，也将因为这部《春秋》。”他简直把《春秋》当成了他的第二生命。

公元前 479 年（鲁哀公十六年）春，孔子病倒在床，再也没有起来。7 天过后，在弟子们的痛哭声中，离开了人世，终年 73 岁。遗体被安葬在“孔林”（今山东曲阜城北门外的洙水旁）。

总而言之，孔子是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最著名的、对后世的影响最大的、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也是享有盛名的人物。作为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和最早的史学家，他的言论和成绩是无可比拟的。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对孔子这样评价：“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菜，设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崇之。白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的创始人，原名乔达摩·悉达多，意为“成就一切者”。释迦牟尼这一名字是在他成佛以后，世人对他的尊称，意为“释迦族的圣人”。

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 565 年，圆寂于公元前 486 年，共活了 80 岁，与我国春秋时代的孔子是同时代的人。

据我国佛经记载，在古印度靠近雪山南麓森林繁茂的地方，有一个富庶的小国，这就是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年轻的净饭王是位文韬武略样样精通之人，后与毗邻的拘利族天臂城主善觉大王的女儿摩耶结为夫妻。

王后 40 岁那年，才有了怀孕征兆。怀胎 10 月后的一天，王后生下一个男孩。只见他相貌端丽、神态安详，并无一般婴孩的哭闹表现。这就是后来成为佛祖释迦牟尼的乔达摩·悉达多。他的诞生地兰毗尼园后来成为佛教徒世代朝拜的圣地。

在皇宫优越的物质条件下，释迦牟尼一天天成长起来。

释迦牟尼天姿聪慧、悟性极佳，少年时代，便养成了爱思考、爱提问的良好习惯。其父净饭王期望他长大以后成为“转轮圣王”，有意加以培养。他命儿子同释迦族姓儿童约万人一起到教书法师跋陀罗尼（意为“普友”）的学堂学习。释迦牟尼很快就脱颖而出。对太子的博学多才，法师常常惊叹不已。除此之外，太子还学习哲学、韵文、占学、数学、历法、祭法、祈祷学、妖怪学、技艺、蛇学等多种知识与技能。

当释迦牟尼长到 17 岁时，释迦族姓的长辈们都来拜见国王，请求国王为太子选择贤妃！净饭王纳言下诏，召集释迦种姓年轻美貌的女子五百人，让太子挑选。释迦牟尼后来钟情于一位名叫俱夷的女子，她父亲是一名持杖者。持杖者说：我姓之宗法，须

通晓技艺之人，才可把女儿嫁给他。使臣回禀国王，国王颇为不快。释迦牟尼听到后倒是极力赞同，应允七天后举行技艺。比赛那天，五百多名释迦族青年男子聚集到王宫竞技场上，约定比赛数学、文字、音律、剑术、角力、射箭、骑马、游泳、跑步等项目。释迦牟尼在全部项目中都占优势，最终获胜。持杖者心悦诚服地把女儿嫁给了他。

在当时社会里，婆罗门教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教义规定青年人要经历四种生活，即梵行期、家住期、林栖期、游行期。释迦牟尼就是顺从这个社会习惯，进行了四方出游。

释迦牟尼成婚后，并未改其沉思的习惯，他对见到的任何一种现象都能作长时间的思考。

一日，释迦牟尼及随从数十人乘车马从东门出游。在郊外野径旁，一个老人拄杖而过。驾车者告之：此人为老所迫，“老”非国法，众人至壮被老残。太子想像着父母妻氏乃至自己，不论此时多么年轻富有，终将老去，实在让人痛苦！于是游兴顿无，命起驾回宫。

几日后，释迦牟尼又从南门出宫郊游，行至不远，见一病人，驾车者告之：此人已被病缠身，病危常在将近死。太子心想，患病之人周身无力，即使头脑聪锐手足健全也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多么令人痛苦！有什么办法可以免除这种痛苦呢？”回宫后，他整日为寻思这个问题愁眉不展，国王见了甚是担忧。

过了几日，释迦牟尼又启请出游西门。出城不久，遇见四人抬着一具棺材迎面走来，死者家属跟在后面，捶胸顿足呼号哭泣。驾车者告之：瞻州次是已死人。释迦牟尼想，怎样才能使人返老还童、青春永驻，怎样才能使疾病远离，生命长存呢？回宫以后，闷坐苦思，忧形于色。

过了十几日，释迦牟尼始终未找到答案，于是启奏净饭王，要出游北门。刚出北门，遇见一比丘（和尚），驾车者告之：此人名丘僧。此时丘僧走近说：解脱之道，不在王宫在山林。释迦牟尼大受震动，心想：这就是我苦苦追寻的事业啊！于是下定决心舍弃王位，离家寻找解脱之道。这时释迦牟尼已经 29 岁，妻

子俱夷即将分娩。

北门出游回来第二天，释迦牟尼前去拜见净饭王，说道：恩爱聚会，必有离别。愿父王许我出家，为众生寻求一条解除痛苦的途径。净饭王听后非常难过，他想尽一切办法挽留太子。但释迦牟尼一心谋划着如何逃出城去。

第七天晚上，释迦牟尼趁众人困乏歇息的机会，偷偷溜出寝宫，来到马厩，叫醒车夫，让他驾车送他出城。

释迦牟尼逃出王宫，经过七天七夜的长途跋涉，离开迦毗罗卫国，来到“毗舍离城”（古印度一国名，第二次经典结集处）外跋伽婆仙人苦行林。当时矢志的跋伽正在这里苦修。释迦牟尼看见许多修苦行的婆罗门，释迦牟尼待了几日，认为修苦行不能获解脱之道，便告辞跋伽，继续寻找真谛。

却说净饭王发现太子出走后，立即派出王师大臣及许多随从，由车夫领路，急追而来。释迦牟尼正想前往摩揭陀国的灰白山中寻道，在半途就被追上。王师及大臣百般规劝，仍不见太子回心转意，于是留下桥陈如等五人跟随太子，率余下众人回宫复命去了。

释迦牟尼继续南行，他们渡过凶险的恒河，来到摩揭陀国（古印度国名，王舍城之所在国），受到国王频毗婆罗的热情款待。

释迦牟尼带领五人渡过尼连禅河，来到河边的迦暗山修行地。此后，他先后寻访了新学派领袖、年逾百岁的阿罗逻迦罗摩和数论先师优陀迦罗摩子，并且吸收了二位大师的禅定观想方法。

释迦牟尼离开两位数论大师后，又到了伽耶，当时在尼连禅岸边的苦行村，住着许多苦行者，面对苦修盛行的当时社会，释迦牟尼一时找不到更佳的修行方法。他想：五浊使世道险恶、人心叵测，我为自身清静，破除邪谬，普渡众生，应当修禁行和苦行。于是他就这样修行了六年。《佛本行集经》中对他的修行结果有如下记载：身体羸瘦，喘息甚弱，如八、九十衰朽老公，全无力气。六年苦修，使释迦牟尼的体质大大受到了损害。

六年后的一天早晨，太子来到尼连禅河边饮水，他看见了自己投在水中的身影心中不禁悲叹：六年苦修，残身伤智，徒劳无益。若丢掉苦行，仍像先前居家沉思，或许能获得解脱之道。于是决定净身进食。

太子走进尼连禅河，在清澈的河水中洗掉了六年积沉下来的污垢。由于身体十分虚弱，洗浴后感到头昏眼花，攀着一根树枝才上了岸。

这时，一个叫善生的村姑沿河而来，她献上鲜牛乳救了释迦牟尼。随从桥陈如等三人见太子喝了牛乳，以为他意志已灭，前功尽弃，大为气恼，纷纷离他而去。

释迦牟尼不久来到佛陀伽耶的一棵毕钵罗树下。释迦牟尼端正身体，并发誓不获誓不起此坐，便默坐进入禅定境界。

他在毕钵树下连坐了七天七夜，未进一粒米粟。

到第七天黎明，释迦牟尼忽然感到长期萦绕在头脑里千丝万缕的疑难全部释然，混沌已久的大脑豁然开朗、大彻大悟了。原来，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在永不停息地变化，万物变化的惟一归宿就是因果报应。有因必有果，因果必循环。人生如舟，苦海无涯，只有断绝一切欲望，多积累施舍的善行，才能消除烦恼，才能宁静地忍受各种痛苦，得到真正的解脱。这就是释迦牟尼所证得的“正觉”。

从此，释迦牟尼成为佛陀（BUddha）（简称佛，意思是觉者，智者）。释迦牟尼成佛这一天是公元前五三〇年农历十二月初八。那年他35岁。

此后的释迦牟尼因到处传播佛教而受人敬仰。

释迦牟尼成佛后，来到鹿野苑（今印度的波罗奈城），寻找跟随他多年的桥陈如等五人。

释迦牟尼寻到他们后，开始向他们传授自己的法道。

释迦牟尼的初次说法，完全征服了桥陈如五人的心。他们一齐跪拜，乞求佛陀收他们为徒，这就是释迦牟尼最初的五个弟子，野鹿苑是他得道后第一次传授经法的所在地。

在鹿野苑最初说法后，释迦牟尼暂时行走在缚罗迦河的沿岸。为众人排忧解难、指点迷津，传播佛教，不久就收了弟子六十多人，

师徒众人在缚迦河岸传道。后来释迦牟尼让六十佛徒分散而去，云游四海，佛教广泛地传播起来。

释迦牟尼在 35 岁至 80 岁的 44 年间，云游印度各地，向人们传布教法，普度众生。尽管他拥有上千名弟子、上万个信徒，仍身遭诸多不幸。当时，婆罗门教是佛教兴起前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它严格划分人的等级优劣，以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而佛教主张一切教徒皆情同手足，不论贵贱，它的教义对婆教产生了巨大冲击。于是释迦牟尼成为被诽谤和诋毁的对象。

在他晚年时候，教团还发生过分裂现象。

此外，释迦牟尼为协调僧团内部人与人的关系，使之和睦统一，为了制约比丘和比丘尼的行为，有利于他们的修行和扩大佛教影响，制定了这样那样的戒规。为此释迦牟尼也遭到非议。但他善恶兼容，不计前嫌，最终令万人倾服，受万人朝拜。

释迦牟尼为传播佛教奔波劳碌了一生，于公元前 486 年圆寂（涅槃）在拘尸那伽城（今印度联合省伽夏城）的跋提河边。

释迦牟尼死后，古印度各国为争夺他的遗骨（“舍利”，火化后呈珠状物）而大动干戈。后经调解，决定将遗骨骨灰分成八份，各自带回“舍利塔”供养。此外，当地人还搜集释迦牟尼的毛发、衣物，建塔封存供养。这些“舍利塔”至今古风犹存。供八方游人瞻仰、祭拜。

巴门尼德

巴门尼德是古希腊哲学爱利亚学派的创始人。他的鼎盛年约在公元前 504 年。出身于意大利南部爱利亚城邦的一个富有的家庭，据说曾为爱利亚城邦立过法，到过毕达哥拉学派的活动中心克罗顿，晚年游历过雅典。

巴门尼德曾受到毕达哥拉和毕达哥拉学派的影响，但他的哲学的主要来源，却是克塞诺芬尼关于神是不动的“一”的理论。

现存的巴门尼德的著作残篇是被称为《论自然》的一首不完整的长诗，共 19 条残篇，154 行，包括序诗、真理之路和意见之路 3 个部分。“序诗”32 行完整无缺，它以女神启示的形式提出两条道路，一条是通向真理之路，另一条是不包含真理的意见之路。

“真理之路”是全诗的主体。这部分的基本思想是：对于存在和非存在有两种不同的回答，一种认为，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另一种认为，存在者不存在，非存在必然存在。前者是通向真理的、实在的途径，后者则是不可设想的；前者靠健全的理智来判断，凭思想来推论，后者是以茫然的眼睛、轰鸣的耳朵以及舌头为准绳。从“存在者存在”这一前提出发，沿着前一条途径推论，就可以得到关于存在的真理：①存在是永恒的，不生不灭的；②存在是一，是连续的，不可分的；③存在是不动的；④存在是有界限的，形如球体；⑤只有存在可以被思想、被表述，也只有存在才有真实的名称。

“意见之路”这部分的内容是：用光明与黑暗、火与土、轻与重等两种对立的力量，说明日月星辰是怎样产生的，男女的性别、畸形与怪胎、聪明与愚蠢、感觉能力的差异等等是怎样形成的。他认为感性世界变动不居的现象属于非存在，对此作出解释

是必要的，但是它只不过是以感觉为依据的不包含任何真理的凡人的意见。

巴门尼德关于两个世界的理论，触及到本质与现象、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在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他解决二者关系的途径是错误的。他的“存在”，原来的意思相当于中文的“有”，凡是能说是“有的”东西都是存在，不管是独立的一物，还是某种属性。巴门尼德把事物的各种属性都抽象掉以后得到了这个最普遍、最一般的范畴，这在人类认识史上是一大贡献。但是，他把依靠抽象思维从现实世界中概括出来的“存在”绝对化、独立化，把它变成同现实世界相对立的、分离的、不动的、独立存在的东西，这就走向了客观唯心主义。

在哲学史上巴门尼德首先提出“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这个命题。在他看来，只有思想才能把握存在，每一思想都有它所表达的存在物。而“存在”是唯一的，没有“存在”之外的思想；非存在不是思想的对象；被思想的东西和思想的目标是同一的。对巴门尼德提出的命题历来有不同的解释。G. W. F. 黑格尔认为这是唯心主义的伟大命题。英国哲学家 J. 柏奈特认为巴门尼德的存在肯定是一个空间上有广延的东西，所以，巴门尼德是“唯物主义之父”。还有人认为，在巴门尼德的时代，人们还不知道思想与存在是主客观的区别；巴门尼德的意思只是说，感觉与非存在（即感性事物）是同一的，二者都是有生灭的、运动变化的、杂多的，思想与存在都是无生灭的、不动的、单一的、不可分的，二者的内涵一样，并无“存在”之外的思想，否则就有另一个存在，所以说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单凭这个命题不能判断他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

在巴门尼德之后，柏拉图提出理念论，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他的关于“存在”的思想。德谟克利特则在变化着的现象背后寻找不变的本质，并且把原子与虚空看作存在和非存在，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了巴门尼德的思想。亚里士多德总结前人的成就，对存在作了深入的研究和细致的划分，提出了范畴的理论和本体的学说，从此，对存在的研究成了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课题。

考底利耶

考底利耶生活在公元前 4 世纪，是古代印度的政治家和政论家，他所著的《政事论》非常著名，他也因此而成名。

考底利耶，印度语为 Kautilys，别名那迦和毗湿笈多。具体生卒年代正史没有记载，已不可考证了。他具备卓越的政治才能，协同旃陀罗笈多在旁遮普一带组织人民起义，推翻了希腊——马其顿侵略者的政权。旃陀罗笈多在他的谋划和协助下，于公元前 324 年在印度西北部称王，接着率军东征，推翻了腐朽的难陀王朝，定都于华氏城，即现在的巴特那。考底利耶作为国王的大臣、顾问和国师，辅佐国王建立和统治着这个新兴起的庞大的奴隶制国家，是孔雀王朝的奠基人之一。

考底利耶原籍是古代印度西北部文化中心咀叉始罗城，出身在一个婆罗门家庭。他出生后不久父亲即去世，由母亲抚养成人。母亲对他影响很大，她希望儿子成为一个有教养的教师。他经过刻苦学习后，精通三部《吠陀经》，通晓天文、地理，熟悉有关冶金学的知识。他更关心政治活动和国家事务。但他的才华没有得到王室重视，反而引起难陀王朝宫廷的嫉妒和轻视。他决心脱离难陀王朝，另外开辟一个施展自己才能的新天地。考底利耶碰到失意的旃陀罗笈多之后，便把他带到咀叉始罗城，对他施以教育，从而成为旃陀罗笈多的导师和顾问。

从反对亚历山大的入侵开始，考底利耶就支持旃陀罗笈多的事业。最初，他们在咀叉始罗同亚历山大的希腊——马其顿驻军进行斗争。他们组织边区部族，发动印度人推翻外族入侵者的政权。考底利耶在他的《政事论》中充分地表明了对外族统治者的民族仇恨。他指出外族征服者是怎样榨干了这个国家的财富。当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在巴比伦死去的消息传来时，考底利耶抓

住时机，让旃陀罗笈多提出反对外族侵略者的号召。这种呼吁给他带来了同盟者，众多的印度人民集中在他的麾下，同外族入侵者拼杀。希腊军队于公元前 322 年被驱逐出去，咀叉始罗城被收复。旃陀罗笈多在考底利耶的协助下，取得了反对侵略的胜利，并在斗争中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势力。

在驱逐了亚历山大的侵略军之后，旃陀罗笈多在考底利耶的劝导和协助下，攻打腐败无能的难陀王朝。在战争中，考底利耶进一步施展了他的军事才能。他毫无顾忌地认为，为了达到目的应不择一切手段，他利用敌营中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进而消灭敌人。尽管缺乏这方面的史实材料，史剧《罗刹婆与指环印》却从侧面描写了考底利耶为获得旃陀罗笈多的政敌罗刹婆的合作所采取的权术和计谋。他终于笼络和迫使这位难陀王朝末代国王的重要大臣为旃陀罗笈多服务。考底利耶的策略使难陀王陷于孤立。由于考底利耶的谋划，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难陀王朝被打败了，新的王朝——孔雀王朝建立起来了，旃陀罗笈多登上了王位宝座。旃陀罗笈多死后，考底利耶又辅佐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宾头沙罗（公元前 300 年～前 273 年在位）继续工作了一段时间。

公元前 311 年前后，塞琉古继承了亚历山大在巴比伦的统治后，转而向东方扩张。公元前 304 年，他的军队渡过了印度河，孔雀王朝迎击入侵之敌。考底利耶的军事策略发挥了作用，战败了塞琉古。塞琉古把印度河西部一直到喀布尔各省都割给了旃陀罗笈多，相传塞琉古还把女儿嫁给他，而后缔结了和约。孔雀王朝与西亚的希腊人保持着密切联系，这对孔雀王朝的巩固与发展有极大好处。塞琉古派往华氏城的使者麦斯特湿斯在那里住了 5 年，他写的《印度志》一书，成为研究印度古代史的重要资料。

考底利耶的另一重大贡献是给后世留下了不朽著作《政事论》。这部著作的内容涉及到内政、外交、民政、军事、商业、财产和司法等方面，甚至包括度量衡和历法等。从《政事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考底利耶的智慧和他的多方面的学识，以及他的范围广泛的统治艺术。在以后的许多世纪中，《政事论》引起了众多政治家、研究者的广泛注意。到 20 世纪初，它的完整的

手抄本被发现后，又引起学者的注目，它被整理出版并翻译成多种文字。研究者对它提出许多新的见解，有人认为这部著作不可能是一个人的观点，有着后世人士的许多修订和增删。大多数学者认为它出自考底利耶的手笔，但经过后人修改，大约在公元2世纪最后修定。

《政事论》是一部巨著，包括15卷，共180篇（按另一种分法为150章）。最重要的内容是关于国家组织的问题，它论述了国家各个部门的职能。国家有会计、财政、矿业、兵工、农业、贸易、航运、畜牧和税收等部门，这些部门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农村按照征税原则加以组合。《政事论》并提到各种不同的交通道路，以及国家和人民在维护交通方面的责任。

《政事论》涉及到政府理论和实际方面的许多题目。它论述了国王、大臣、顾问、政府各部及其在外交、战争与和平方面的各种职责。为了加强奴隶主的政权，考底利耶主张国王有绝对权力。国王是最高的统治者、军队的统帅、法律的执行者，他有任命官吏的最高权力，国家是为国王而设的，国王是至高无上的。《政事论》第六部中很明确地叙述了构成“国家”的七种要素，即国王、大臣、土地、要塞、国库、军队和同盟者。他同时提出国王应是精力饱满而头脑清醒的人，国王要调配军队，注意国家收支的核算，留心乡村发展的事务，任命高级官员，下达命令，接受侦探所搜集的秘密情报，制定和执行作战计划。因此，他主张国王必须学习，还要花些时间用于自省。《政事论》论述了一套森严的政治结构，国王、军队、官吏及各部的组织，需要十分周密而雷厉风行的制度和作风。它特别强调对各省行政机构的控制，从而强调加强侦探活动。

考底利耶在《政事论》中也提到货币等经济问题，有一章专门论及钱币的铸造与货币制度的采用，并规定国王在土地的产品中征收1/6的赋税，有的甚至高达1/4。它规定：全印度都是国王的财产，国王征收赋税、罚金及买卖上的什一税。

《政事论》所谈及的问题十分广泛，从某些侧面反映了孔雀王朝的历史，也是当代印度政治历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它一反

印度其他文献的常态，脱离了连篇累牍的宗教规范和神话传说的窠臼，而成为论述国家机构与组织问题的一部政治论著。

《政事论》论述了孔雀王朝的整个政治制度，同时也捕捉到了与外国的联系，如提到中国的丝绸。据考证，孔雀王朝时代，印度和中国还没有接触，有的学者据此认为这部著作是孔雀王朝以后时期编成的。但《政事论》论述的基本上是孔雀王朝的社会情况和制度。虽然不能排斥此书有后人修改、编纂的成份，但它最初确实出于考底利耶之手却是比较可信的。

《政事论》的作者极端地宣扬了国王在国家中的作用，并强调了使用暴力的恐怖统治，把古代奴隶制印度的政治体制加以理想化。这是由作者的奴隶主阶级立场所决定的，也反映了他的历史局限性。印度以后的历代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专制国家，在官僚政治、警官制度和赋税制度等方面，大体都沿袭了孔雀王朝的制度，作为他们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因而不能不肯定《政事论》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印度历史学家也承认：“古代印度关于政府的学说，在《法治》和考底利耶的《政事论》中已奠定了主要基础。”

考底利耶这位古代印度政论家的业绩和他的著作《政事论》，已成为印度的历史遗产为后人重视。

伯里克利

伯里克利是公元前 4 世纪古希腊奴隶主民主政治的杰出代表者。在他的领导之下，雅典进入了“黄金时代”。

伯里克利出生于名门，长在豪贵之中，却没有染上一般纨绔子弟的种种恶习。他教养良好，学识渊博，品格端正，结交的都是堪称良师益友的当代英才，如智者达蒙、哲人泽诺、博学广识的阿纳克萨哥拉斯等等，他们对伯里克利思想道德的培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刚正不阿、廉洁奉公、胸怀宽阔、目光远大，他坚韧不拔、冷静沉着、器宇轩昂、擅长演说，这一切都构成了他作为一名优秀政治家的品质。

对内，他以加强民主政治为核心。伯里克利代表雅典工商业奴隶主和中下层自由民的利益。公元前 462 年，伯里克利为健全奴隶主民主政体施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诸如：把国家的政权从战神山议事会转移到公民大会、500 人会议和陪审法庭三个部门之下；各级官职向广大公民开放，雅典全体男性公民都可以通过抽签、选举和轮换而获得担任官职的机会；实行公薪制；规定只有父母双方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能获得雅典公民权。

对外，伯里克利为扩大雅典的势力范围和所得利益，加强控制提洛同盟，积极争取雅典在希腊世界海陆两方面的优势和霸权。因此，雅典与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在伯里克利的主持之下，雅典的军事连连取得胜利，并于公元前 454 年把海军势力伸展到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周围地区。雅典在希腊半岛的威势达到顶点。

雅典的另一个强敌波斯也被打败，并于公元前 449 年双方签订和约。

伯里克利把他控制之下的提洛同盟变为“雅典海上帝国”，

并将同盟金库由提洛岛迁到了雅典，盟金变成了“贡金”，雅典成了众盟邦中发号施令的“君主国”。

但是，伯里克利的“帝国”统治激起了一些盟国的不满。于是，他的政敌借机集合保守势力，在对待斯马达、提洛同盟和建设雅典卫城等重大问题上同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伯里克利得到了大多数雅典公民的支持，他击败了对手，连年当选并出任雅典最重要的官职——首席将军，完全掌握了国家政权。此时，雅典的奴隶制经济、民主政治、海上霸权和古典文化臻于极盛，璀璨辉煌，堪称“黄金时代”。

雅典的殖民地遍布爱琴海岸，强大的舰队经常出没于辽阔的黑海领域，战争的胜利使它获得大宗的战略物资和赔款。伯里克利迫使各盟邦统一使用雅典的银币和度量衡制，经济飞速发展起来。贸易往来范围既广，商品种类又繁多。充裕的财政收入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公职人员和服役军人都能从国家领取足额的公薪和津贴，低等级的公民的经济政治地位也得到了改善。

尤其值得雅典人骄傲的是，在伯里克利的倡导推崇之下，他们创造出了足以令千秋万代景仰的高度繁荣的古典文化。

伯里克利这个政治家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他的理想和抱负是要使雅典不仅登上希腊霸主的宝座，而且要成为“全希腊的学校”。在他身边，聚集了希腊大批著名的学者文人和艺术大师，杰出的哲学家阿纳克萨哥拉斯、雕塑家菲狄亚斯和悲剧家索福克勒斯都与伯里克利过从尤密。他们在雅典这一安宁和谐的人间圣地相互交游、传道、授业、解惑，寻求真善美，探索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真谛。

伯里克利有一个美丽出众的妻子，她才华超人，灵心慧性，举止典雅，不少哲学家和艺术家都愿与她交流，包括苏格拉底都对她很重视，许多人都跑来向她求教，可谓名噪一时。

为了培养民众的艺术情趣，伯里克利专门颁布政策，发给贫苦公民以观剧津贴，使他们有机会走进剧院欣赏戏剧。他还规定每个节日都要举行音乐会，并附加上一些趣味性的竞赛，这以后

就成了雅典人长久以来的传统。为配合音乐演出，奏乐馆也被修筑出来。

大规模修建雅典卫城是伯里克利为发扬光大希腊古典文化做出的流芳百世的贡献。公元前 447 年，一场浩大的工程拉开了帷幕。一大批出色的雕塑家、建筑师、工艺学者齐集雅典，在以同盟金库的贮存作为经济后盾的基础上，先后兴建了帕特隆神庙、雅典卫城正门、赫淮斯托斯神庙、苏尼昂海神庙、埃列赫特伊昂神殿，以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各种塑像浮雕等精美绝伦、千古不朽的造型艺术杰作。

位于雅典中心的卫城是最出色建筑的集合。它建立在 150 米高的陡峭的山巅之上，全部用大理石修建而成，庄严精美，辉煌灿烂。智慧女神雅典娜的铜像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尊雕塑，它出自古希腊最负盛名的雕刻家菲狄亚斯之手。这尊神像高 12 米，形象威严而又优美。雅典娜身穿黄金战袍，头戴黄金头盔，胸前的护身甲上嵌着女妖美杜莎的头像，端正地站立着。她左手持着一柄长矛，右手托着胜利女神尼凯的小雕像，身边放着一面圆形女神盾，盾上雕刻有一条盘旋而卧的巨蛇。神像裸露出来的肢体部分都是用上等的象牙雕刻而成。但这尊雅典娜神像在公元 146 年被罗马帝国的皇帝安东尼·庇乌搬走，至今下落不明。

伯里克利的文化政策是与其政治、经济和对外政策紧密相连的。无论是修建公共工程还是举办节日演出，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民主政治，改善广大公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以及树立雅典的光辉形象来吸引希腊各邦的景仰和向往。应该说：伯里克利的行动是卓有成效的。

雅典的繁荣发展和不断的扩张，引起斯巴达的不安和干预。伯里克利对这一切都心中有数。公元前 431 年，战争爆发，伯里克利审时度势，沉着应战，第一年的战争基本上按他的计划进行。在为阵亡将士举行的国葬典礼上，伯里克利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演说。他从根本制度和生活方式上热情歌颂了雅典的伟大成就，清晰透彻地表述了他的政治思想，应当是他 40 年政绩的最后总结。伯里克利骄傲自豪地宣布：“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

全体人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

正当他充满信心地领导雅典人继续应战时，一场可怕的瘟疫袭击了雅典城。顿时，城内尸体堆积如山，人心涣散，再加上外敌进逼，怨声四起。在伯里克利政敌的活动下，人们把罪过归咎于他。但雅典仍需他的领导，不幸的是，不久之后，瘟疫也夺去了伯里克利的生命。

在他死后，雅典失去了坚强的领导。伯里克利苦心经营的统一大业功败垂成，古希腊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墨 子

墨子，名翟，中国战国时期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墨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子出身于小手工业者，精通器械制造，技术与同代著名的公输盘（即鲁班）齐名，他们都曾用木料制成鸟，能飞上天空，三天三夜落不下来。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手工业者，墨子在当时享有盛名。

墨子后来从手工业者上升为“士”，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开始了讲学生涯。三四十岁时，墨子就有了北方圣人之称。他一生在各国奔走，上说教于诸侯，下教授于弟子，极力宣传他的政治主张。由于墨子长期生活在小生产者中间，广泛接触下层劳动群众，所以能深切地体验和同情他们的疾苦和愿望，因而他身上也保持了劳动群众勤劳节俭、反对不义和邪恶的精神。这些都体现在他的著作中。

墨子长期授徒，逐渐创立了墨家学派。这个学派是一个有严密组织和纪律的学术团体。墨家的多数成员都是具有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工匠。墨家成员被人称为“墨者”，他们有自己共同信仰的领袖，称为“巨子”。大多数成员都同属小生产者阶层或出身于小生产者阶层，因此他们的主张是代表这一阶层的。

墨子的学说记录在《墨子》一书中。这部书在汉代原有七十一篇，到今天只剩下五十三篇。这本书不是墨子一个人的著作，很可能是他的学生根据他们的笔记整理的。

儒家和墨家相互驳难，揭开了先秦“百家争鸣”的序幕。在整个战国时期，墨家是和儒家并驾齐驱的“显学”。作为这个学派创始人的墨子，无愧于我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

德谟克利特

德谟克利特，古希腊哲学家，与留基伯并称原子论的创始人，出生于色雷斯的海滨城市阿希德拉德谟克。在他定居的家乡从事研究工作之前，曾到埃及、巴比伦甚至印度等地游历，广泛接触和吸收东方文化，这同早于他的希腊学者泰勒斯和毕达哥拉斯的情况很相像。

德谟克利特经常外出旅行，花费了父亲留给他的绝大部分财产。他整天冥思苦想，举止怪诞，还在花园里解剖动物尸体，以至于家族中有人认为他发疯；亲属中有人企图占有他的家产，便控告他浪费祖产，把好端端的园子变成杂草丛生的荒地。根据当时的法律，犯了这种罪的人要被剥夺一切财产并逐出城外。但是，聪明善辩的德谟克利特在法庭上据理力争；加之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曾为他治病知道他并非疯癫、败家，而是一个智慧出众的科学家，于是出庭为他作证。这样，德谟克利特终于被判无罪。

德谟克利特涉猎数学、天文、地质、物理、生物、医学诸学科，提出圆锥体、棱锥体、球体等体积计算方法，在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政治学和法学上也有所建树，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赞美他是古希腊“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德谟克利特在自然科学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是创立原子论，为2000多年后现代原子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原子论的最早提出者，本是德谟克利特的老师留基伯，但这位提出过“绝对虚空”、“这个虚空中运动着的原子”和“必然性”3个新概念的留基伯，据说他的著作中仅留下这样一个片断：“没有任何事物的产生是无缘无故的，万物的产生都有其根源，都是必然的。”

德谟克利特继承并发展了留基伯的原子学说，指出宇宙空间除原子和虚空之外，什么也没有。原子一直存在于宇宙之中，不能无中产生，也不能被消灭。原子在数量上是无限的，在形式上是多样的。运动是原子的固有属性。不同形状、不同大小的原子，在运动中以不同的排列次序与位置结合起来，产生物体和表现物体的性质。例如，水的原子平滑呈圆形，因此水才能流动而无固定形状；火的原子是多刺的，这便是烧灼使人感到痛的原因；土原子是毛糙凸凹不平的，所以结合在一起形成坚固不变的大地。自然界物质发生明显变化是由于结合在一起的原子分散开，又重新以新的形式结合的结果。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中没有鬼神存在的空间。他认为鬼神是原始人面对残酷而奇妙的自然现象感到恐惧，再加上知识匮乏而臆造出来的。除永恒的原子以及原子之间的虚空外，从来就没有不死的神灵。他甚至认为，人的灵魂（思想）也是由精细的原子构成的，也是一种物体，原子分离，物体消灭，灵魂也随之不存。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古希腊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重要成果。列宁称他是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路线的代表人物。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哲学，虽然在当时不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想国道德哲学的追随者多，但 100 多年后伊壁鸠鲁在其受人欢迎的哲学中引用原子论而使之流传下来；2000 多年后，由于道尔顿的《化学理论的新体系》（1808 年）使化学变成原子学说的化学，使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获得新生。

当然，德谟克利特的原子不可再分的观念，直到 1897 年汤姆逊发现电子后才得以打破，但近人严复（公元 1854 ~ 1921 年）翻译的《天演论》中仍有“莫破尘”以称原子，可见原子论影响之大。

除原子论外，德谟克利特还有一些其他重要的思想。他认为认识是事物中不断流溢出来的原子所形成的“影像”作用于感官和心灵的结果。他主张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都受因果必然性和客观规律的制约，而不存在什么偶然性。他特别强调

教育的重要性，主张道德教育可以造就人的第二本性，而教育方法应以鼓励和说服为主；同时也要注意个人的道德修养，强调要与自己的旧思想作斗争，每天都要有新思想。

在社会伦理观上，德谟克利特宣称快乐和幸福是人生的目的。他说快乐和幸福并不是暂时的、低级的感官享乐，而是有节制的、精神的宁静和愉悦；快乐和幸福并非神之所赐，而是人自身的选择和创造。虽然当时有些哲学家讥讽他和他的哲学是“令人发笑的哲学家”和“享乐哲学”，但德谟克利特按照他的幸福观，对智慧、勇敢、节制、正义以及义务和良心等道德范畴，作出了与柏拉图截然不同的解释，在西方伦理学史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古希腊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

公元前 469 年，苏格拉底出生于雅典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他的父亲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士。

苏格拉底在幼年时期，作为雅典奴隶制国家中一个自由民的子弟，曾经受到一定的教育。长大之后，由于家境比较贫困，苏格拉底曾继承父业，以雕刻维持生计。

苏格拉底勤奋好学，尤其喜爱哲学研究。当时雅典是希腊文化的中心，古典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大多在这里展开。许多学者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在公民大会上展开辩论，对辩论术、语法和修辞学等都有研究，从而出现所谓的“诡辩派”。他们四处游历，广收门徒，培养有志于学习他们知识的人。苏格拉底青年时就师从于诡辩派学者，后来逐步形成自己完整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成为当时雅典最有名的哲学家之一，不少有名望的人都拜他为师。著名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和雅典专制主义执政者克里提阿斯都是他的学生。

苏格拉底的门徒中，有不少人出身于贵族奴隶主家庭。苏格拉底认为，“与其自己去治人，不如训练能够治人的人更为有用”。在教授过程中，他既不直接地向学生传授他认为是真理的科学知识，也不直接地向学生讲述现成的科学原理和结论，而是用“问答法”进行教学，启发听众自己去寻找正确的答案。他经常先向学生提出问题，然后引导学生做出回答。如果答案错了，也不立即给予纠正或指出错误所在，而是根据不正确的答案提出补充的问题，使对方的答案显出荒谬，或迫使对方承认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说自己像助产婆一样，虽年老不能生育，但能接生，即能帮助别人获得知识。所以人们称这种方法为“苏格拉底

法”，也叫“产婆术”。

公元前 431 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苏格拉底曾参加了三次战役，并在波提狄亚一役中救了他的弟子——著名将领西亚比得的生命。公元前 404 年，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彻底失败而告终。在斯巴达扶植下，以克里提阿斯为首的三十个大贵族在雅典实行专制统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十暴君统治”。从政治上来看，苏格拉底是当时雅典农业贵族思想的代表者，他拥护专制制度，坚决反对民主。因此他支持他的学生克里提阿斯的统治。“三十暴君统治”时期，施行恐怖政策，迫害民主派；当权八个月后被雅典民主派推翻，克里提阿斯本人战死。

暴君统治垮台后，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政权逮捕。公元前 399 年，他在雅典受审。法庭以传播异说、毒害青年、反对民主的罪名判处他死刑。按照雅典法律的规定，被判死刑的人可以选择流放徒刑来代替死刑。此外包括柏拉图在内的他的几位有钱的学生多方营救，并买通了看守，如果苏格拉底愿意，他就可以逃走。但苏格拉底不肯这样做，他做好了随时去死的准备。临刑前，几个学生到监狱去看他。学生们围坐在敬爱的老师周围，苏格拉底给他们讲述关于生与死和灵魂不朽的思想。随后，他安详地喝下了刽子手给的毒酒离开了人世。

苏格拉底生前好谈论而无著作。他的哲学观点和教育观点多见于与其弟子柏拉图的一些对话，如《自辩篇》、《克里多篇》、《斐多篇》等。在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行回忆录》中，也记述了苏格拉底的思想。通过这些，苏格拉底的主张为人们所熟知，并一直流传到今天。

苏格拉底对自然科学不感兴趣，而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伦理性问题的研究上。他认为，哲学应当从怀疑开始，要把人对于物质自然也即是客观世界的求知，转化为对于内在自我也即是主观世界的求知。知识只是一种“自我认识”。教育的目的也正在于此，他认为有知识的人才具有美德。苏格拉底的思想对后代有巨大的影响，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亚里士多德出生于希腊北部卡尔喀狄克半岛的斯塔吉拉城。这个城市邻近马其顿，是希腊的一个殖民地。亚里士多德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阿米尼斯塔的宫廷御医。亚里士多德从孩提时代就受到良好的精神熏陶，并享受着优厚的物质生活。

亚里士多德从小爱好学习，广泛接触各种科学知识，同时，家庭教育使他从小就注意实验的学问。亚里士多德从小就显示出惊人的多方面才能，他精通戏剧、诗歌、医学、心理学、政治学、历史、逻辑、修辞学、伦理学、自然史、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等，令人叹为观止。

17 岁时，亚里士多德来到雅典，进入柏拉图办的学园学习。他以柏拉图为师，在那里学习和工作了 20 年之久，成为柏拉图得力的学生和助手。

柏拉图死后，亚里士多德周游各地。公元前 343 年，亚里士多德被马其顿国王聘为他儿子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想把亚历山大培养成一个文明的人，希望他能成长为一位优秀的哲学家。但是亚历山大为了完成征服希腊、最终征服世界的美梦，放弃了老师的理论哲学。公元前 336 年，亚历山大继任马其顿国王。公元前 335 年，亚里士多德结束了他在马其顿的生活，回到希腊，在雅典阿波罗圣林的吕克昂体育场开办了一所利森学院。

亚历山大对亚里士多德办学给予了大力支持，为他的老师提供了巨额经费，同时在远征中经常给他捎回各种动植物标本。亚里士多德在学院里一面讲学，一面从事哲学和其他各种科学研究。亚里士多德生性不喜安静，给学生们讲课时，总不能稳稳当

当地坐在那儿，特别是上午听课人少的时候。他和学生们在柱廊里踱来踱去，阐述他的观点，回答他们的问题。因此，他的学院被称为逍遥派学校。直到今天，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还被称为逍遥派体系。

亚里士多德是古代西方最渊博的学问家，古代希腊哲学与自然科学的集大成者。他在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物理学、生物学、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和美学各方面，都有许多著作。

在哲学上，亚里士多德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他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曾经批判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学说，认为物质永恒存在，不能被创造，理念世界不能成为现实世界的基础和根源。然而他在物质和形式的问题上，又表现了唯心主义观点，认为存在着脱离物质的形式，还认为神是世界的推动者。这样，他就倒向了唯心主义。

在政治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制度是合理的。公元前 326 年，他和弟子们写了对 158 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评论，把政体分为合理和不合理的两类。合理的是君主、贵族和共和三种政体；不合理的是这三种政体的退化形式，即专制、寡头和民主政体。

亚里士多德根据物质和形式关系的观点，认为人身上具有肉体 and 灵魂两部分。教育就是要发展灵魂的高部分——理性部分。通过体、德、智这几方面的教育，使人得到和谐的发展。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是最早论证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的。

亚里士多德把教育作为维持国家秩序的工具，主张教育由国家负责，受国家控制。他认为教育对剥削阶级内部来说是必要的，主张教育民主，剥削阶级内部一律受平等的教育，至于奴隶与劳动人民，那自然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病逝，他所建立的帝国迅即瓦解。亚里士多德因曾为亚历山大之师，只得逃离雅典。公元前 322 年，他在异乡凄凉地死去，终年 62 岁。

亚里士多德在历史上影响很大，他多方面地总结了希腊各科学的成果。恩格斯称他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

柏拉图

柏拉图（公元前 427 ~ 前 347），是古希腊的教育家和哲学宗师。无论是作为苏格拉底的得意学生，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都足以使他名垂青史。

柏拉图原名阿里斯托克勒（Aristocles）。这是他袭用祖父的名字。父亲叫阿里斯通。他母亲的家族是雅典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亲戚多系当时的达官显贵。

相传在 12 岁那年（前 415），巴来斯特拉体育学校教师阿里斯顿见他前额宽广，身体强壮，给他一个绰号 plato，即宽阔、壮伟之意，后来成为他的正式名字。

由于出身贵族，柏拉图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柏拉图文学造诣极高，一些名著不仅在哲学领域大放异彩，而且写出了许多文学杰作。

柏拉图青年时代曾想从事政治活动，他的家庭也允许他比较容易地登上显要地位。然而他却走上学者的道路，这与雅典的衰落和政治的腐败不无关系。

当然引导柏拉图走上哲学道路不仅仅是这些。柏拉图具有广泛的兴趣和多方面才能，很早就对哲学产生了兴趣，尤其是苏格拉底的哲学。苏格拉底被认为是当时雅典最有智慧、最有教养的人。他对柏拉图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柏拉图忠实地跟随这位导师学习长达 8 年之久，深得苏格拉底哲学的真谛。他是苏格拉底学生中最有名气的一位，并被称为惟一的继承人。

苏格拉底喝完毒药，静静死去以后，雅典的政治气氛使人窒息。为了免于遭受迫害，柏拉图和他的挚友们纷纷逃离雅典，侨居墨加拉，与他的好友欧克里德到处避难。在这里，柏拉图经常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这时他 28 岁。以后 12 年侨

居他乡的生活不但在哲学方面，而且在政治上对柏拉图的生活都有不同的影响。

柏拉图与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一世及其姻亲第翁的交往，对他的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柏拉图一生 3 次访问叙拉古。公元前 368 年，柏拉图第一次来到叙拉古，在那里他结识了第翁。第翁是狄奥尼修一世的妻弟，又是他的女婿，那时他天资聪颖，喜欢哲学，与柏拉图一见如故，他仰慕柏拉图，希望柏拉图能够运用自己的智慧，帮助改善叙拉古的状况。但是，第翁主张开明政治，厌恶宫廷的奢侈习气，因此在宫廷中不受欢迎。狄奥尼修一世是一个在政治上、军事上野心勃勃、踌躇满志的君主，他结识和接待柏拉图在很大程度上是附庸风雅，博取礼贤下士的美名。柏拉图和第翁之间的亲密友谊已使他不快，加之柏拉图为了实现自己培育“哲学王”，用哲学思想来改革国家的目的，往往直言不讳，发表刺耳的言论，这样他并不能受狄奥尼修一世的宠爱。柏拉图后因与狄奥尼修一世发生冲突，而返回雅典。

柏拉图返回雅典后，开始从事教学工作。公元前 387 年，柏拉图 40 岁时，创办了一所学园。

柏拉图的“学园”影响了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并从而影响了后来发展起来的学院和大学。但是不能简单地从现代大学的角度看待“学园”。当时的“学园”还具有某种宗教团体的气息，以主管学术和艺术的诸女神“司”做为“保护神”，全体人员过着集体的生活。在“学园”自己的“礼拜堂”中举行宗教仪式，在公共食堂中一起用餐。一部分个人财物归集体公用。学园的课程主要有算术、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天文学和声学，以及社会、政治、伦理等。但是所有这些学习，只是为学习辩证法奠定基础。在柏拉图看来，最高深、最高尚的学科是哲学即辩证法。柏拉图十分重视数学学科，据说学园大讲堂的门前写着这样的话：“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柏拉图亲自授课，采用的主要方式是“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即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自由研讨。

“学园”的创立，使得雅典不仅像伯里克利骄傲声称的在政治、艺术的意义上是全希腊的学校，而且名副其实地在哲学和学

术上成为“全希腊的学校。”“学园”创立以后，吸引了诸多外邦青年到雅典向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等人求教。柏拉图学园培育出了不少卓越的学者。比如亚里士多德，欧多克索、克塞诺拉底，赫拉克利特、泰阿泰德、斯彪西波等等。

公元前 367 年，叙拉古的狄奥尼修一世去世，他的儿子狄奥尼修二世继承了王位。他受教育不够，因此完全不适合担当起他父亲抑制迦太基人扩张的伟大事业，而迦太基人的扩张正威胁着西西里西部希腊文明的存在。狄奥尼修二世不得不借助他的姐夫第翁。第翁和他的妻弟狄奥尼修邀请柏拉图到叙拉古，帮助他们维护政权。柏拉图虽然觉得成功的希望不大，但仍接受了第翁的邀请。

但是不久，狄奥尼修性格暴力的一面就表现出来，同时对比他年纪较长的第翁也心怀不满。第翁后来被放逐。柏拉图失望地返回雅典。这是他第二次访叙拉古，仍然没有实现他的所谓理想的国度的目标。

柏拉图离开叙拉古后，仍同狄奥尼修二世保持个人通信联系，并试图缓解狄奥尼修与第翁之间的紧张关系。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狄奥尼修不但没收了第翁的个人财产，而且为了王朝的利益，迫使他的妻子改嫁。柏拉图出于对第翁友谊起见，再次航行到叙拉古，并在那里度过将近一年时间，希望能挽救这种局面。在这段时间，柏拉图为提议中的希腊城市联邦起草了一部宪法的序言。但是旧体制的影响太强大了，柏拉图曾一度处于危险的境地，狄奥尼修的野蛮侍卫一度敌视他。依靠阿启泰以塔伦托人的名义强烈干预下，他才得以逃离虎口，回到雅典。柏拉图对西西里的政治亲自介入才告结束。

从此以后，柏拉图在学园里继续他的教学事业。

公元前 347 年，这位 80 高龄的老哲学家与世长辞。他亲手创立的学园前后持续了 916 年之久。这个学园可称为欧洲第一所固定的学校，为晚期希腊和罗马时期的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柏拉图一生写了大量的著作。以柏拉图名义流传下来的著作

有 35 篇对话、13 封信札和一本定义集。这些著作包括：《申辩辞》《克里多》《理想国》《智者》《法律篇》《政治家》等。其中《理想国》最为著名，其次是《法律篇》。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描述和设计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理想国度。他认为人的灵魂有理性、意志和欲望（情感）三个部分，一个理想的国家也是相应地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统治者阶级；第二等级是武士阶级；第三等级即劳动者阶级。

柏拉图认为，在理想国中，三个等级的人应安分守己、各守本位，尽力尽职，国家才能“和谐一致”，成为理想的国家。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主张实行“共产”制度，并对第一、二等级严格的教育、训练。取消第一、二等的私有财产，取消家庭、实行共妻共子，无论男女都住公共房子，吃公共饮食；为了保持种族优良，由统治者决定婚配。子女一出世便离开父母，由国家养育和施行教育、训练，使之成为优秀人才。这就是最早的“共产”社会。

在柏拉图看来，理想的实现，关键在于哲学，即要有哲学家来当国王。他十分强调哲学家的作用，强调国家权力与哲学理性的合一，认为只有以哲学为工具来治理国家，才能实现对武士和劳动者进行智慧的统治。

柏拉图第一、二次叙拉古之行，就是想实现“哲学王”的观点，但种种原因使他最后丧失了对实现理想国的信心。

柏拉图后期的对话如《法律篇》和《政治家》中所提出的主张，已经和《理想国》中的政治主张有所不同了。在《政治家》和《法律篇》中，较强调法律的作用。

柏拉图的哲学，提出了以理念为核心的一系列哲学思想。柏拉图的理念哲学主要强调三点：

第一，在理念和事物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理念是惟一真实的存在，是事物的原因；而事物，只是理念的影子，是理念的产儿。人们日常感觉到的具体事物都是易变的、相对的、不真实的，而只有通过理性认识到的理念才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的真实，进而根据两种不同的认识对象把世界分为“可见世界”和

“可知世界”。

第二，吸收了“摹仿说”，并且提出了“分有说”来阐述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所谓“分有说”就是指出具体事物之所以存在，乃是因为它（或它们）有了理念的结果。

第三，在理念与理念关系上，他又把理念分成了若干等级，形成理念的等级系统。具体事物的理念是最低级的理念；数学或科学的理念是较高级的理念，艺术和道德的理念如美、勇敢、正义等是更高级的理念；最后，善的理念是最高理念。善是“超于存在之上，比存在更尊严更有威力的东西”，也就是说，善是至高无上的神的化身。

作为哲学家的柏拉图，对西方哲学的影响是巨大深远的。由柏拉图所创立的以理念为核心的哲学体系，把理念推向了古代思辨辩证法的顶峰，而且一直影响、制约着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他是西方传统文化的奠基者和杰出的代表人物。

德摩斯梯尼

“德摩斯梯尼，如果你有与你的智慧相当的权力，马其顿人的战神就不可能在希腊握有权柄。”

这是一段铭文，镌刻在一尊青铜雕像上。这尊青铜雕像塑造的就是古希腊卓越的演说家、著名的政治家德摩斯梯尼。

这位演说家兼政治家曾有一名言：“辞令的灵魂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他的一生就是遵照这句话去做的。他不断采取积极的行动，与马其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维护自己的祖国希腊的利益。

当德摩斯梯尼登上雅典政坛的时候，希腊各城邦发生了严重危机。希腊北方的马其顿，在国王腓力二世的治理下迅速崛起，它四处扩张，咄咄逼人。而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各城邦内部对待马其顿的态度形成两大截然对立的主张：一种表示欢迎马其顿干预希腊事务；另一种竭力反对马其顿的扩张，主张消除各城邦之间以及城邦内部的不和，维护独立和民主。

德摩斯梯尼作为后一派的代表，他多次登上雅典公民大会讲坛，发挥全部演讲才能和精力声讨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维护雅典的主权和尊严。在一系列演讲中，他力图激发雅典公民保卫城邦的热情，号召全体希腊人团结一致，跟企图奴役希腊人的马其顿国王作殊死的斗争。

德摩斯梯尼反对腓力的演说总计 8 篇，通称“腓里皮卡”，其措辞之精密，逻辑之严谨，构成强大的鼓动力和说服力，对腓力的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无情的揭露。从此以后，“腓里皮克”（“腓里皮卡”一词的单数）成了一个专门名词，专指猛烈抨击和揭露政治的演说。如有名的西塞罗反对安东尼的演讲词就被他自己称作“腓里皮克”。

从此，德摩斯梯尼享受着崇高的荣誉，应该说是他出众的演说才华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德摩斯梯尼的演说才华并非天生就有，相反，应该说他在此一方面的天然资质是很差的。

少年时的德摩斯梯尼沉默寡言，一旦说起话来，还发音不清，逻辑不明，疲软无力。最终使他走上杰出演说家道路的原因，是源于一场财产纠纷。

德摩斯梯尼的家庭非常富有。他7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他父亲去世时，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遗产（一个武器作坊、一个家具作坊和其他财产）。由于德摩斯梯尼尚处幼年，遗产被他父亲指定的监护人管理。贪婪的监护人肆意侵吞了他的财产，德摩斯梯尼成年之后，只得到了全部遗产的1/12。他多次索求，也毫无结果，即使通过法庭打赢了官司，也得不到实质性的补偿。为此，德摩斯梯尼决定向雅典著名的演说家、擅长撰写关于遗产问题讼词的伊塞学习演说术。

多年的官司使德摩斯梯尼变成了著名律师。为谋生计，他又代人撰写法庭辩护词，这使他的辩论技艺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渐渐地，德摩斯梯尼开始向往政治生活，逐渐向一名演说家迈进。

最初，德摩斯梯尼登上讲坛时，虽然准备好了精彩的演说词，却因吐字不清，含含混混，说不出一句有力度的话，而被挑剔的雅典人毫不客气地赶下了讲坛。而且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不止一次两次。

然而失败打消不了德摩斯梯尼的决心。他痛定思痛，对自己的缺陷认真地总结了一番，然后对症下药。为了训练发音，他向著名的演员请教朗读的方法，并把小石子含在嘴里，迎着呼啸的大风和汹涌的波涛大声朗诵：为了克服气短，他故意选择陡峭的山坡，一面攀登一面不停地吟诗；为了纠正姿态，他专门装了一面大镜子，随时观察自己的举动，并在头顶上悬挂一柄锋利的剑，以改掉那些多余的动作，尤其是没事就爱乱耸肩的习惯；为了潜心于练习，他把自己的头发剃掉一半，难以见人，于是便留

在家中终日练习；为了写出精彩的演说词，他刻苦读书，把修昔底斯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抄写了8遍，连他的政敌都不得不夸赞他的修养深厚。他那篇有名的反腓力演说，连腓力本人看到后都说：“如果我自己听德摩斯梯尼演说，我也会投票赞成选举他当我的反对者的领袖。”

由此可见，杰出的成就来源于背后刻苦的锻炼，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也没有不劳而获的天才。

公元前341年，德摩斯梯尼发表了他最著名的第三篇反腓力演说。他指出：“关于马其顿人的狡猾阴谋是毋庸置疑的，腓力所力求实现的惟一目标是劫掠希腊，夺去天然的财富、商业和战略据点。腓力利用希腊人中间的分裂和内讧作为达到他卑劣意图的手段。”他认为，尽管目前局势极端险恶，但仍然有可能制止马其顿的扩张。他打了个生动的比喻：“当雅典之舟尚未覆没之时，舟中的人无论大小都应动手救亡。一旦巨浪翻上船舷，那就一切都会同归于尽，一切努力都是枉然。”

德摩斯梯尼通过这篇演说词阐述了自己对雅典政治制度的认识。他极度推崇雅典的民主宪法和公民政治自由，他认为这种政治制度有潜在的巨大力量。而雅典的现状是，公民对社会事业的关心和勇于奉献的精神正在渐渐减退，代之以不纳税、不服兵役，一味期望国家的资助，这导致了国家的衰微。在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面临的困境和社会的症结之后，他用激动人心的词句鼓舞雅典的公民：“即使所有民族同意受奴役，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也应当为自由而战斗！”

受这篇演说词的鼓舞，雅典人民群情振奋，在隆重召开的公民大会上作出重要决定：派遣使者联络友邦。很快，雅典拥有了自己的反马其顿同盟。在援助拜占廷的战斗中，腓力国王遭到希腊军队的重击，败退而走。

德摩斯梯尼赢得了极大声誉，雅典人把胜利的花环奖给他，作为对他的肯定。他被任命为海军总监，进行了一系列有益于军事行动的改革。但此时，腓力的军队仍然在希腊的领土上不断推进着。希腊组织的反马其顿同盟联军由于各怀私心，不能团结一致，又被腓力在喀罗尼亚发生的决定性战斗中打败。

公元前 336 年秋天，由于腓力被刺杀，事情又出现了转机，德摩斯梯尼从失败的压抑中抬起头来，积极参加各种公共事务。雅典的公民大会决定为他的功绩做出赞颂，并决定授予他一顶象征荣耀的金冠，而这却遭到了埃斯希涅斯的强烈反对。埃斯希涅斯是亲马其顿的主要将领，同时也是负有盛名的演说家。于是，一场空前激烈和精彩的辩论在这两位难分上下的演说家之间展开了。最终，德摩斯梯尼还是技高一筹，他以充沛的感情和有利的论证赢得了广大听众的支持，而埃斯希涅由于略逊一筹，败给了德摩斯梯尼，他羞愧难当，不得不离开雅典，远走他乡。

孟 子

孟子，名轲，字子舆，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中国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

孟子3岁时父亲就死了，他在母亲仉氏的抚养下长大成人。他的母亲很懂得教育之道。早年，他家住在墓地附近，送葬的人忙忙碌碌、挖坟掘土，孟母觉得这样不利于孟子成长，就把家搬到集市附近。但是集市上叫卖声不绝，吸引了年幼的孟子，孟母又把家搬到学宫附近，每天可以接触到很多读书人——这就是有名的“孟母三迁”。

孟子小时候学习不用功。有一次，孟母织布时，孟子正好放学回来。孟母问他学习怎么样，孟子满不在乎地说：“和以前一样，不好也不坏。”听了这话，孟母举起一把刀，一下就把刚织好的布割断了，并语重心长地说：“学习就跟织布一样，布断了再也接不起来，学习时不用功，就永远也学不到本领。”孟子深受教育。

在母亲严格的教育下，孟子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对他以后在思想和学术上的发展影响很大。

孟子后来拜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为师。在学习过程中，孟子对孔子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认为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人了。孟子的学说和子思的主张有很多相通之处，所以后人将他们合在一处，称作思孟学派。

孟子为了适应战国形势的需要，将孔子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孔子仁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复礼”，就是维护周礼。到孟子生活的时期，周王朝已完全衰落，所以孟子抛弃了维护周礼的一些内容，支持当时已经掌权的地主阶级。

孟子还反对兼并战争，但并不反对统一，他认为统一是使天下安定的根本保证。这也是孟子适应时代的发展，在思想上有所进步的体现。不过，孟子认为只有实现仁政，用“仁”的力量使天下归服才是真正的统一，这是他继承儒家思想的表现。

孟子学成之后，为了宣传儒家学说，他也像孔子那样，带领学生去各国游说。

孟子先后游历过齐、宋、滕、鲁、魏等许多国家，晚年做过齐国的卿相。当时齐、魏是大国，对于战国形势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这两个国家是他重点游说的对象。

孟子第一次到齐国，齐威王崇尚武力，对孟子的主张不感兴趣。但为了尊重士人，准备赠送他金子。孟子认为一个君子不能被钱收买，所以坚决不受。

后来齐宣王即位，孟子再次来到齐国，被封为客卿。但孟子的王道仁政对企图争霸天下的齐王来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最后齐国直接攻燕，大行暴政，导致孟子对齐国的彻底失望，终于在公元前 312 年左右离开了齐国。

孟子宣传的爱民的王道仁政，在统治者看来不是当务之急，因此一直未被采纳。

孟子 70 多岁时，带领学生万章、公孙丑等回到了家乡。

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孟子和学生们一起整理了《诗》、《书》等儒家典籍，同时将自己当年游说时的言论编纂成书，即今存的《孟子》七篇。书中反映了孟子的思想，除了仁政学说外，还有性善论以及民贵君轻等思想。孟子同时还是一个教育家，特别强调认识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根据这个观点，他提出了学要专心有恒，要注重独立思考，教学要循序渐进等许多教与学的原则。

孟子的思想，在当时不为人看重，但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宋以后，他的著作《孟子》一书却被奉为经典，对于中国历代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道德传统产生了很大影响。后世统治者特别抬高孟子，把他作为儒家“正宗”，奉为“亚圣”，后人把他和孔子的思想并称为“孔孟之道”

庄 子

庄子，名周，中国战国时期宋国的蒙（今河南商丘东北）地人，我国先秦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道家学派集大成的人物。

庄子因家境贫困，住在狭窄的小巷子里，靠编织草鞋度日，饿得面黄肌瘦，有时不得不向人借米救急。但是庄子学识渊博，思想高超，对于各派学术都有研究，甘于贫寒，不屑于和权贵同流合污。

楚威王听到他的名声很高，曾派两个使者，带了重礼，请他到楚国为相。庄子正在河边钓鱼，他毫不动心，只是讲了个故事，意思是我庄子不愿被人钳制使用，我情愿像乌龟一样在烂泥里爬着。总之，为了自由的生活，庄子一辈子不愿做官。还有一次，惠施在梁国为相，听说庄子来到梁国，有人报告说庄子要夺相位。惠施非常害怕，派人在国中搜了三天三夜。于是庄子就直接去找惠施，也讲了个故事，他把自己比作凤凰，把梁国的相位比作死老鼠，现在你惠施好像一只猫头鹰得到了死老鼠，却害怕凤凰去抢，岂不知凤凰的高洁。这些事情典型地反映了庄子崇尚自由、志向远大的人格。

处于纷争动乱的时代，庄子没有积极地去改变它，而是强调历史的倒退，产生了消极的极端厌世的思想，也就是生不如死的情绪。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庄子也认识到生死是自然规律，以一种通达洒脱的态度看待生死。

庄子的妻子死了，惠施去吊唁，看见庄子坐在地上，一边敲瓦盆一边唱歌，毫无悲戚的表情。惠施很奇怪，庄子解释说，人死了，如同四季变化一样自然，仍然存在于天地之间，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这是天命的自然变化，为什么要伤心呢？

庄子临死前，弟子想要厚葬他，庄子说，我用天地作棺材，日月当宝璧，星辰当珍珠，事物做随葬品，这不很好吗？弟子说怕禽鸟破坏他的尸体。庄子说，埋在地下一样给蝼蚁吃，何必夺了这个的食给那个吃呢。可见，这位哲人正是怀着达观的情绪看淡生死的。

庄子“著书十余万言”，现在流传的有《庄子》三十三篇，为道家经典之一，分为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共三个部分。内篇是《庄子》全书的精华，全面阐明了庄子的宇宙观、历史观、人生观、道德论和政治论。外篇的作者可能是庄子后学，对内篇的观点进行了具体阐述和发挥。杂篇中有些是伪作，但大部分作品也都符合庄子的思想。

庄子认为当代的乱世是历史的堕落，主张要退回人兽杂处的蒙昧时代，这方面比老子更进一步。庄子深刻地揭露了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和丑恶现实，但是他不是积极去面对，而是消极逃避，甚至是厌世。

庄子的思想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在魏晋时期，道家著作备受重视。到了唐朝，庄子还被奉为道教的神仙。当然，庄子唯心的宇宙观和消极的人生观对后世也有负面影响。

在《庄子》一书中，一些文章思想深邃，想象奇幻，气势磅礴，神采飘逸，形象动人，词藻秀美，充满了浪漫主义特色，是我国先秦散文的精品。他的哲学化的文学创作，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典范。在陶渊明、李白等大诗人身上，都或多或少体现了庄周这种风格。

庄子还是一位语言大师。他才华横溢，行文汪洋恣肆、奇诡飘逸，还独创了许多生命力无穷的新词，丰富了祖国文学语言的宝库。在文章中，庄子用了比喻、拟人、夸张等等多种多样的修辞手法，使文章极富感染力。庄子的文学成就达到了先秦散文的最高峰，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以及文艺理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一直到近代，鲁迅、闻一多、郭沫若等都在《庄子》中汲取过营养。

亚历山大大帝

马克思曾说过：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外部极盛时期是亚历山大时代。

亚历山大（公元前 356 ~ 前 323 年），古代马其顿国王，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少时即有征服世界的野心，并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据说，每当他得悉父亲胜利的消息时就发愁，惟恐自己会因而不能享到征服世界的光荣。公元前 336 年夏天，亚历山大继位，时年 20 岁。当时国内环境十分困难，宫廷骚乱，北方各部落暴动，希腊、马其顿起义，此伏彼起。亚历山大果决地击败了各种反对势力。在占领忒拜后，把居民全部出卖为奴，只有神庙和诗人品达之家幸免。使希腊再度屈从于马其顿的统治之下，他以马其顿希腊联军最高统帅的身份，组织对东方的侵略性战争。

公元前 334 年春，亚历山大藉口波斯人曾经蹂躏过希腊的圣地，又参与刺杀腓力二世，而大举东征。他以解放者自居，利用波斯统治下的希腊人、埃及人等等的不满，许诺帮助他们摆脱波斯的羁绊。实质上，东侵是为了满足马其顿贵族和希腊奴隶主从战争中掠夺领土、财富和奴隶的愿望。

马其顿希腊联军渡过赫勒斯滂海峡，进入亚洲，在马尔马拉海南岸格拉尼科斯河附近，亚历山大和波斯军队首次交锋。亚历山大不顾军队长途跋涉的困难，亲自率军作战，击败波斯军队。这一役的胜利，为亚历山大打开了向小亚细亚进军的通道。不少城邦归顺，只在少数地方，他遇到了希腊雇佣军的顽强抵抗。公元前 333 年夏，亚历山大的军队在伊索斯城附近和波斯军队发生了第一次激战。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亲率军队以逸待劳，亚历山大集中优势兵力，直捣波斯军中锋。大流士三世溃逃，亚历山大

占据了大流士三世的军营。

公元前 332 年，亚历山大继续向南进军，攻陷许多城市。在此期间，大流士曾向亚历山大提议媾和，表示愿割地赔款，但亚历山大表示当可能取得波斯帝国的全部领土时，他不希望只得到其中的一部分，他并且自称为“全亚洲的统治者”。

公元前 332 年冬，亚历山大由腓尼基南下，侵入埃及，他特别注意笼络埃及的祭司支持他的统治，对他们大献殷勤，慷慨馈赠。他在尼罗河三角洲，即现在亚历山大城所在的地方建立了一座城市，并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为亚历山大里亚。

公元前 331 年春，亚历山大在埃及补充了自己的军队后，率军向东进发，经过巴勒斯坦、叙利亚，来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在尼尼微附近加于加麦拉村，与波斯的军队发生一场决定性的战斗。

10 月 1 日清晨，战争开始了。波斯军队首先发动了攻势。大流士三世命令绑着锋利刀剑的战车全力冲扑过去，指望以数目众多、装备精良的战车一举击溃马其顿的方阵，结果扑了空，却被亚历山大的军队击得溃不成军。

亚历山大继续向东推进，深入了波斯腹地。他进行了惊人的掳掠，洗劫了巴比伦、苏萨和波斯利斯的王宫，夺得无数金银和财宝，还下令焚烧了波斯国王的王宫。此后，亚历山大移兵北上，占领了米底首府埃克巴坦那。为了追踪大流士三世，他率军经过险峻的山岭和无水的荒漠；来到了帕提亚和巴克特里亚。这时，巴克特里亚的总督比索斯拥兵自立，擒杀了大流士，自称波斯国王。不久，比索斯为共谋者所弃，被亚历山大擒获。他召开了有巴克特里亚贵族参加的审判大会，并以公诉人身份指控比索斯竟对自己的君主和亲戚大流士三世下毒手。他把自己打扮成波斯帝国政制的维护者，依照波斯习惯处比索斯以极刑。

大流士三世死后，波斯阿黑门尼斯王朝便告终结。亚历山大以阿黑门尼斯王朝的“合法继承人”自居。

为了慑服东方的反抗，建立更大的霸权，他继续兴师北方，转战于中亚细亚。在行进过程中虽遭到反抗，但都被亚历山大残

酷地镇压下去了。

为了巩固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他在东方建立了许多要塞城市，并且都用亚历山大命名，派兵驻守。

亚历山大深深懂得，仅仅依靠马其顿人和希腊人的军事力量，是无法统治广袤的帝国疆土的。随着征战的胜利，统治地区的扩大，他越来越多地沿袭波斯帝国及其各地的旧制，擢用东方的降臣。但亚历山大用极其严厉的手段惩办军中的反对者，甚至不惜诛杀一些战功卓著的老将和近臣。

公元前 327 年，亚历山大率领军队离开中亚，向印度进发。由于对印度的气候不适应和军中瘟疫流行，军队开始拒绝前进，要求回家。马其顿军队开始回撤。

公元前 324 年初，将近 10 年的亚历山大远征结束。

亚历山大经过大规模的军事远征，在辽阔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它的版图西起希腊、马其顿，东到印度河流域，南临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至药杀水。首都设在巴比伦。

亚历山大竭力鼓励马其顿人和东方女子结婚，以促进马其顿人和东方人的融合。

在巴比伦，亚历山大还积极准备继续进行远征，企图进一步征服地中海西部和南印地区、北非、意大利和西班牙。但是，正在此时，亚历山大突然患恶性疟疾病逝（公元前 323 年 6 月 13 日），终年 33 岁。

亚历山大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通过远征，他使希腊同西亚、中亚、印度等地的贸易更密切了；他在被征服地区建立的城市后来发展成各地的经济中心；以往波斯王宫储存的大量金银被铸成货币，促进了商品的流通。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西方经济交流和生产发展。文化上，远征前后，不少希腊学者来到东方，研究东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搜集地理学、植物学和动物学的资料和标本。在社会政治方面，亚历山大的某些措施，尽管对缓和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尖锐矛盾产生过某些影响，但从根本上说，只是沿袭了东方专制帝国的旧规。

亚历山大并不是“超人”，不应该将其理想化。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远征东方的胜利，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是当时的时势造成的。

伊壁鸠鲁

伊壁鸠鲁（前 341 ~ 前 270 年），是古希腊的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宣扬无神论，提倡快乐主义。

伊壁鸠鲁出生在希腊的萨莫斯岛上，他的父亲是一位雅典教师，强烈反对暴政。他的母亲是一个女祭司，她为人祈祷，用咒语和巫术给人治病。

12 岁时，伊壁鸠鲁就对哲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有一天，伊壁鸠鲁的老师试图向他说明世界的本源。老师说：“一切都来自混沌。”伊壁鸠鲁问道：“但是混沌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老师为难地说：“这我就知道了，也从来没有人知道。”

伊壁鸠鲁决心自己弄清这件事，他将寻找混沌的起源，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18 岁时伊壁鸠鲁来到雅典。这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征服了希腊，雅典统治者是一个典型的独裁者，他尽力毁灭希腊各城邦的民主精神，驱赶反叛的本地人。伊壁鸠鲁的父母也是这样被赶出家园，全家人被迫逃往小亚细亚。伊壁鸠鲁努力想忘掉生活的梦魇，在他返回雅典不久，就在市郊购置了一栋房子和一座花园，创建了一所教授哲学的露天学院。

这所学校实行公共教育。它向一切阶层的人们开放，甚至包括奴隶。伊壁鸠鲁解释说，因为在学习这个领域，不存在阶级的差别。老师和学生们一起住在学院，生活在平等友爱、相互尊重的气氛中。学员们的生活相当的简单和节制，水和大麦面包是他们每天的伙食，偶尔有半品脱的葡萄酒，干酪算是难得的奢侈品了，只是留到特殊节日才吃。“我靠面包和水过活而感到快乐”，伊壁鸠鲁写道，“我唾弃昂贵的香料，不是为了它们本身，而是因为随它们而来的种种烦恼。”面包、水、葡萄酒和哲学——这

些，对伊壁鸠鲁来说，就是幸福生活所包含的一切。

伊壁鸠鲁在教授学生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他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他说，世界上不存在混沌和虚无的东西。世界是由永恒的、数目无限的东西，即物质性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是不能被切割成或分裂成更小粒子的物质性微粒。构成世界的原子，是不生不灭、永恒不变的，它们在无限的空间中永恒地向下运动。他还认为，我们的世界并不是惟一存在的世界，还有其他同样广阔、同样美丽的世界存在着。它们有自己的地球以及高山和海洋，也有自己的人类和野兽。所有的世界都是自生的，没有什么东西操纵它。

伊壁鸠鲁提倡寻求快乐和幸福。他说，死是我们存在的结束。我们居住的地球，只是租给我们很短暂的一会儿，一旦该我们离开的时辰到来，我们就会被轰出这个世界。让我们用平静的心接受吧，让我们消除对死亡的畏惧，尽情享受生活赐予的快乐吧。他说最大的快乐绝非肉欲物质享受之乐，而是与世界的烦扰和混乱保持距离的心灵平静之乐。他的这种思想，其实是对希腊走向帝国化、自由城邦思想破灭的一种失望。

伊壁鸠鲁学派生活简朴节制，目的就是要抵制奢侈生活对身心的侵袭。伊壁鸠鲁发誓放弃政治生活，但并非对世界漠不关心，他认为最大的快乐是友谊，个人的幸福就在于友谊和社会之中。

虽然伊壁鸠鲁只是以面包和水为生，但总要让朋友分享他的食物。“知道谁和我们在一起吃，比知道我们吃什么更为重要。”他在临终前给朋友的信中写道：“现在是我一生中最后的和幸福的日子，我给你写信。病魔一直纠缠着我，痛楚和烦恼简直不容忍受。但是胜过这一切的是我享受着追忆过去我们一起思考和交谈的乐趣。”

屈 原

屈原名平，约于公元前 339 年左右出生在楚国一个贵族家庭里。据《离骚》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和楚王同姓。他的祖先屈瑕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被封为“屈”这个地方，后代就以屈为氏。所以从家世渊源来讲，屈原和楚王同一始祖，这个始祖就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颡项高阳氏。因此，屈原在《离骚》篇首自叙身世时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屈原的贵族出身，使他有可能会受到良好的教育，掌握丰富的文化知识，为他的诗歌创作准备了条件。而他和楚王同姓的关系，也培养了他浓厚的宗国感情。

屈原的家乡在现在的湖北省秭归县，这里历史上有许多关于屈原的古迹和传说。秭归在长江三峡附近，三峡是著名的风景秀丽的地方。屈原自小生活在这里，奇幻的风景结合美丽的神话，对他丰富的想像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自春秋以来，楚国在长期独立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在宗教、艺术、风俗、习惯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如果我们把中国北方的中原文化称作史官文化的话，那么则可以将楚文化称作巫官文化。史官文化重人事、讲求实际；巫官文化信鬼神、富于想像。其突出表现就是：神话繁荣，信巫鬼，重祭祀。神话和巫术都是用幻想的、超现实的形式反映世界，这对于屈原创作中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有极大的影响；而巫风的盛行，又推动了音乐舞蹈的发展，为屈原综合运用多种艺术形式进行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到楚怀王时期，楚国政治已渐趋腐败。屈原就是在这时登上楚国的政治舞台的。屈原学识深厚，见闻博宏，熟悉政治情况，善于外交辞令，因此，他 20 多岁时即为楚国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

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很得楚怀王信任。“与这同列”的上官大夫嫉贤妒能，向楚怀王进谗言，说屈原为楚王草拟、制订法令时，屈原总是自夸功劳，说“除了我别人是作不出来的”。楚怀王听信谗言，从此就疏远了屈原，并取消了他左徒的官职。

屈原被黜之后，心情十分忧郁，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是屈原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在这篇自传体长诗里屈原回顾了自己一生的经历：诗人早年就热爱祖国，汲汲自修，以天下为己任，辅佐楚王进行政治改革。他目击执政的旧贵族势力蒙蔽、左右楚王、败坏朝纲，痛恨他们朋比为奸、荒淫享乐，出卖民族利益，把国家引入绝路的罪恶，因而对时局和国运表现出深切的焦虑与惶恐：“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出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他明知正道直行，力斥时弊，出言讽谏会招致小人嫉恨而构祸，但为了君国，不惜做出自我牺牲，表现得真诚而执著：“余固知謇謇之患兮，忍而不能舍也。”诗人看到自己的“关政”理想遭到破坏，国运岌岌可危，抑制不住满腔的愤怒，对腐朽的贵族群臣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宁肯承受迫害，也绝不变态从俗、与世同流：“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然而，一次次的抗争，换来的却是最高统治集团更严厉的迫害。他先被黜放汉北，后被斥逐江南，萍踪浪迹、漂泊四方，前后历经数十年之久，饱经忧患，尝尽人间悲凉。

政治上、生活上的双重折磨，使得他身体一天天虚弱下去，但屈原的爱国之心丝毫没有改变。在《九章》、《招魂》等作品中，诗人表达了对故都、乡土和家国的深情怀念和对祖国山河破碎、国土沦丧的痛惜与愤慨，他虽处江南蛮荒之地，却系念着故乡，希望着返回郢都，返回朝廷，为国效力。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著名诗人。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20多篇。屈原通过《离骚》等第一批“楚辞”作品开创了中国诗歌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在文学创作上，使诗歌从《诗经》以来的四言格调发展为句式灵活多变的“楚辞”体，并在比兴手法以及幻想、夸张、铺排等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屈原成为我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形成和发展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对于后代文人创作的影响

相当深远，同时，屈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高贵品质和为追求真理“虽九死犹未悔”的不屈精神，对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以及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荀 子

荀子，名况，字卿，中国战国时代赵国人，是战国末期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

荀子生逢战国末期，当时中国正处于历史大变动时期。荀子顺应历史潮流，怀着远大的政治抱负，为实现中国统一而作舆论的准备。

荀子年轻时曾游学于齐国。当时齐国的统治者为了扩大政治影响，笼络知识分子，礼招各国贤士学者居于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著书、讲学。荀子劝说当时的齐滑王实行王道政治，争取统一天下，否则就有被人吞并的危险。无奈齐滑王居功自傲，根本听不进不同的意见，荀子只得离开齐国。

齐襄王执政时，荀子第二次入齐，此时他已六十多岁了。他曾三次被稷下学者推为“祭酒”，也就是担任学宫的主讲。可见那时，荀子在学术上已有相当的地位，而且在人品上也是深孚众望的。

后来，荀子看到秦国日强，是统一中国的希望，于是到秦国会见了秦昭王和秦相范雎，可惜他的统一天下的大计未被秦昭王采纳。

荀子到了楚国时，楚国春申君黄歇为相，正在招集贤才，于是委派荀子为兰陵令。但因遭到诽谤，荀子一度离开楚国，在赵国担任上卿，后来春申君又恳请荀子回楚。荀子再回楚国后，复任兰陵令。荀子曾教过不少学生，李斯、韩非就是荀子在楚国时所传的弟子。

后来春申君死了，荀子也就做不成兰陵令。但他从此“留在兰陵”，著书数万言，一直到死。今天流传下来的《荀子》一书，充分地体现了荀子的思想体系。

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学说的杰出代表，他和同为儒家的子思、孟子一派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荀子汲取百家思想之精华，对哲学、政治、经济及教育等都有认真的研究。他的思想理论，批判地吸收了先秦各家学说的成果，明显地带有综合百家的倾向。

荀子是先秦时期有名的无神论者，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不信天命、不信鬼神、不信先王。

荀子认为宇宙存在着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更可贵的是，他认为人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出了辉煌的“制天命而用之”和“人定胜天”的命题。从这个观点出发，荀子批评了各种对天的迷信。他初步意识到，天人关系就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人类只要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就可以征服自然。他以总结前人的思想成果为基础，在自然观方面达到了先秦唯物主义的最高水平。

荀子在认识论上也是唯物主义的。他肯定精神是物质派生的，精神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他很重视感性在认识中的作用，坚持了从物质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路线；他还把“行”作为人认识的根据和检查认识的标准。荀子把先秦认识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首倡性恶论。他强调人的道德品质是后天形成的，是环境影响和教育的结果，由此强调教育的重要性。

荀子的教学内容继承儒家传统，以《诗》、《书》、《礼》、《乐》、《春秋》为教科书，这与孔孟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荀子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認識论纳入教学过程，认为在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发挥师生的主观能动性。他用“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来激励学生，并制定了一条“从知到行”的路线。

为了实践自己的教育思想，荀子在兰陵曾广泛教育门徒，传授学术。他的传授对于保存儒家经典起到了重要作用。经他传授的人，后来都成了汉代的经师，为后来汉朝时代的学术思想开展了新的局面。

阿基米德

公元前 2 世纪，叙拉古这个古希腊城邦，出了一位科学巨匠，他就是阿基米德。

阿基米德出生在叙拉古的贵族家庭，父亲是位天文学家。在父亲的影响下，阿基米德从小热爱学习，善于思考，喜欢辩论。长大后漂洋过海到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求学。他向当时著名的科学家欧几里得的学生柯农学习哲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知识，最后通古博今，掌握了丰富的希腊文化遗产。回到叙拉古后，阿基米德坚持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们保持联系，交流科学研究成果。他继承了欧几里得证明定理时的严谨性，并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拓宽了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

他把数学研究和力学、机械学紧紧地联在一起，用数学研究力学和其它实际问题。在亚历山大里亚求学期间，他经常到尼罗河畔散步，在久旱不雨的季节，他看到农人吃力地一桶一桶地把水从尼罗河提上来浇地，他便创造了一种螺旋提水器，通过螺杆的旋转把水从河里取上来，省了农人很大力气。它不仅沿用到今天，而且也是当代用于水中和空中的一切螺旋推进器的原始雏形。阿基米德在他的著作《论杠杆》（可惜失传）中详细地论述了杠杆的原理。

有一次叙拉古国王对杠杆的威力表示怀疑，他要求阿基米德移动载满重物和乘客的一艘新三桅船。阿基米德叫 100 多人在大船前面，抓住一根绳子，他让国王牵动一根绳子，大船居然慢慢地滑到海中。群众欢呼雀跃，国王也高兴异常，当众宣布：“从现在起，我要求大家，无论阿基米德说什么，都要相信他！”有了国王的支持，阿基米德更加忘我地进行科学研究。

阿基米德曾说过：给我一小块放杠杆的支点，我就能将地球

挪动。假如阿基米德有个站脚的地方，他真能挪动地球吗？也许能。不过，据科学家计算，如果真有相应的条件，阿基米德使用的杠杆必须要有 88×1021 英里长才行！当然这在目前是做不到的。

最引人入胜，也使阿基米德为人称道的是阿基米德从智破金冠案中发现了科学基本原理。

国王让金匠做了一顶新的纯金王冠。但他怀疑金匠在金冠中掺假了。可是，做好的王冠无论从重量上、外形上都看不出问题。国王把这个难题交给了阿基米德。

阿基米德日思夜想。一天，他去澡堂洗澡，当他慢慢坐进澡盆时，水从盆边溢了出来，他望着溢出来的水，突然大叫一声：“我知道了！”竟然一丝不挂地跑回家中。原来他想出办法了。

阿基米德把金王冠放进一个装满水的缸中，一些水溢出来了。他取了王冠，把水装满，再将一块同王冠一样重的金子放进水里，又有一些水溢出来。他把两次的水加以比较，发现第一次溢出的水多于第二次。于是他断定金冠中掺了银子。经过一翻试验，他算出银子的重量。当他宣布他的发现时，金匠目瞪口呆。

这次试验的意义远远大过查出金匠欺骗国王。阿基米德从中发现了一条原理：即物体在液体中减轻的重量，等于他所排出液体的重量。这条原理后人以阿基米德的名字命名。一直到现代，人们还在利用这个原理测定船舶载重量等。

公元前 215 年，罗马将领马塞拉斯率领大军，乘坐战舰来到了历史名城叙拉古城下。阿基米德和大家一起保卫叙拉古城，他动用了杠杆、滑轮、曲柄、螺杆和齿轮的原理，设计了很多武器，比如投石机，把敌人打得狼狈不堪。

公元前 213 年，阿基米德还曾利用凹面镜的聚光作用，把集中的阳光照射到入侵叙拉古的罗马船上，让它们自己燃烧起来，罗马的许多船只都被烧毁了，但罗马人却找不到失火的原因。900 多年后，有位科学家按史书介绍的阿基米德的方法制造了一面凹面镜，成功地点燃了距离镜子 45 米远的木头，而且烧化了距离镜子 42 米远的铝。所以，许多科技史学家通常都把阿基米

德看成是人类利用太阳能的始祖。

马塞拉斯进攻叙拉古时屡受袭击，在万般无奈下，他带着舰队，远远离开了叙拉古附近的海面。他们采取了围而不攻的办法，断绝城内和外界的联系。3年以后，他们利用叙拉古城市居民的大意，终于在公元前212年占领了叙拉古城。

马塞拉斯十分敬佩阿基米德的聪明智慧，下令不许伤害他，还派一名士兵去请他。此时阿基米德不知城门已破，还在凝视着木板上的几何图形沉思呢。当士兵的利剑指向他时，他却用身子护住木板，大叫：“不要动我的图形！”他要求把原理证明完再走，但激怒了那个鲁莽无知的士兵，他竟用利剑刺死了75岁的老科学家。

马塞拉斯勃然大怒，他处死了那个士兵，抚慰阿基米德的亲属，为他举行了葬礼并建了陵墓。阿基米德被后世的数学家尊称为“数学之神”。

韩 非

韩非，中国战国时期韩国人，先秦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韩非生活在战国末期，当时社会正处在剧烈的变化之中。新兴的地主阶级正在进行着推翻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斗争，战国七雄正为争夺统一中国而进行诸侯战争。这一时期，各种思想潮流融合碰撞，层出不穷，其中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而服务的法家学说应运而生，而韩非正是法家学派的杰出代表、先秦法家学说的最后一位大师。

韩非是战国后半期韩国的一个没落贵族，他和后来成为秦国宰相的李斯同是大思想家荀子的学生。韩非说话有些口吃，但是很能写文章。他的文章写得条理清楚，分析深刻，很有说服力，李斯自己也承认，他的学问、才能不如韩非。

当时的韩国政治腐败，改革不力，在强大的邻国秦国的进攻下一再割地受辱。韩非多次上书韩王，提出修明法度、求人自贤、赏罚分明等富国强兵的建议，但是昏庸的韩王并不采纳。激愤之余，韩非奋笔疾书，写下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文章。

有一天，秦始皇读到韩非的文章，大为赞赏，说：“若能见作者一面，也不枉活了。”李斯告诉他这些书的作者是韩非，现在在韩国。为了得见韩非，秦始皇不惜出兵伐韩，终于迫使韩国乖乖交出韩非。秦始皇与韩非谈得非常投机，引起李斯的嫉妒，害怕威胁到自己的官位。李斯等人大进谗言，使韩非关进了监狱。后来李斯又派人毒死了韩非。等秦始皇后悔时，一代法家大师已经离开了人世。

韩非的著作《韩子》，亦称《韩非子》。现存《韩非子》一

书五十五篇，比较系统地体现了韩非的思想。

韩非主要继承和发展的是先秦法家先驱者的理论。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都被韩非融会贯通，成为法家学说发展的集大成者。韩非总结这些前辈法家的思想，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法、术、势三者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他认为，为了推行封建的政治变革，必须实行严酷的法治，这是国人必须遵循的方向。如果没有术的话，就会有大臣捣乱，如果有法、有术下的最高原则，不能用道德感化的办法，也不能用无功受禄的办法来治理国家。应该用论功行赏、论过罚罪的办法来治理国家。

韩非的思想符合社会走向封建统一专制局面的潮流。他和其他法家创建的封建理论为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所笃行，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

西汉建立初期，因连年战争，国家的政治、经济完全陷入一种困境。汉初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因此有“休养生息”的黄老之治。黄老之学本身包含有法家的思想，它在汉初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不过，当国力强盛后，就需要一种更为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以加强思想统治。这样，儒学由晦而显，登上了历史、政治舞台。因为有这样的背景，董仲舒才得以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了西汉著名的伦理思想家、哲学家，经文经学大师。

董仲舒从小学习十分刻苦专心，因发愤钻研儒家经典，三年中连自己家的园圃都没有去过一次，史称“三年不窥园”。可见董仲舒为经传所吸引，简直到了如痴若愚的程度。由于他不仅对《春秋》有研究，而且相当深入地掌握了儒学思想的精髓，所以当时人称他为“汉代孔子”。

在汉景帝时，董仲舒就做了《春秋》经的博士官。但他对儒学历史发生决定性影响还是在汉武帝时候。西汉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由于有前几代皇帝的休养生息作基础，国力强大起来了，思想统一的需要也变得迫切了。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让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上书对策，以备朝廷咨询任用。一时间，一百多个读书人都聚集到京都长安，都想通过金殿对策，取得皇帝的赏识，得个一官半职。

金殿对策的方法是，皇帝下制书，由对策士子们作答，交皇帝阅览。武帝下了第一道制书，士子们凝神细思，挥笔成文。武帝对几百篇贤良对策逐一阅读，觉得很平常，但当看到董仲舒的文章时，却被那精辟而有光彩的议论所深深吸引，叹为奇文。随即武帝又接连两次召董仲舒上殿策问。由于三次策问基本内容都是关于天人关系问题，所以后人称之为“天人三策”。后来，董

仲舒根据《公羊春秋》的大一统精神，进一步提出了思想统治的问题，要求废止不合于六艺、孔子之道的学说。同时，董仲舒对传统儒学重新作了解释，这些都为西汉统治者利用儒学加强思想统治准备了理论基础。

在对策中，董仲舒针对武帝希望能听到“有关治国的宏论”及有关天人关系的提问，回答说上天和人事是互相关联的，天命是可畏的。国家治理不好，上天就制造种种灾害，谴责、警告君主，如果君主仍然执迷不悟，那就要遭到亡国之祸。他又指出，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实行儒家的“礼乐教化”。他建议对人民实行“德教”，方法是在京都设立太学，在地方也设立学校。

董仲舒所谓“天”、“天意”，绝非简单的人格神或人格意志。从社会结构讲，他强调王者的中心地位，为封建大一统确定了思想武器。

董仲舒的对策，适应了当时西汉从政治上、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切中了武帝的心怀。不久，他又向汉武帝正式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这以后，董仲舒担任了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都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董仲舒在他的著作《春秋繁露》中，还提出“三纲五常”这一道德规范。“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个封建道德教条。“仁”即爱人、孝悌、忠恕等。“义”指封建道德规范和标准。“礼”是各种封建礼仪、制度和规范。“智”为判别是非之心。“信”系忠诚守信。这些都是用以调整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三纲最早源于先秦时期，董仲舒加以改造而成“王道之三纲”。

五常则是由董仲舒在孔孟宣扬的仁、义、礼、智基础上，再加上“信”而成的，即“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三纲五常的思想对我国古代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董仲舒作为汉武帝时代新的儒家学派的创建者，吸取了先秦孔孟儒家思想为主的邹鲁文化思想，同时也吸取了燕齐方士的阴阳家思想和以刑名家思想为主的三晋文化思想。新儒学思想已由一个学派的思想而发展演变为全国性的封建统治思想。尤其是他的君权神授理论和“三纲五常”说，对后世影响最为深刻。它使中国人民长期禁锢于神权政治和封建伦理政治之下。但是，由于西汉时期，封建社会正处于蓬勃兴盛阶段，董仲舒创建的儒学思想体系，总体上说，基本符合时代的需要，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着某些促进作用。

董仲舒以后，儒学逐渐开始作为官方哲学的意识形态出现，它通过教育、选举等社会制度的推行，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逐步开始了对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思想统治。

司马迁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省韩城县）人。他出生于西汉一个世代史官的家庭。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这种环境对于他以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史学家，起了很大作用。

受家庭的影响，司马迁从10岁起就能诵读古文。10岁以后，他跟随父亲来到当时的文化中心——国都长安，学习经书和史学。在那里，他受到了名师的指点，曾直接聆听著名学者、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等人讲经。他跟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听董仲舒讲《公羊春秋》，谙熟了当时的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理论，受益匪浅。他还借助父亲太史令这样一个便利条件，阅读了大量古籍、经典、百家论著和皇家档案。

从20岁开始，司马迁便到全国各地进行有目的的游览考察。他南游江淮，曾登上会稽山，寻找大禹的遗迹；又到了沅、湘一带，登上九嶷山，考察舜的墓地；北过齐鲁，到了孔老夫子的故乡曲阜，体察圣人之遗风，讲习学业，到邹县、爬峰山，在亚圣孟子生活的地方演习乡射之礼；他还到了汉高祖刘邦的故乡徐州沛县，经过号称“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的封地薛，观访西楚霸王项羽的出生地彭城，等等。拜官郎中（皇帝的小侍卫官）后，他曾奉命出征西南夷，涉过巴山蜀水，一直深入到云南腹地而返。在游历过程中，他广泛接触到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既使他开阔了眼界，又增长了知识，为他以后撰写《史记》、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历史资料。

公元前111年，司马迁的父亲去世。这对于司马迁来说是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其父临终前，要司马迁修一部史书。

公元前104年，经过充分准备，司马迁开始着手撰写《史

记》。但仅仅过了5年，正当他专心致力于《史记》的创作时，一场灭顶之灾意外地降临到了他的头上，把司马迁投进了监狱，并处腐刑。

他在《报任安书》中曾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痛苦的思想斗争过程，对死亡的看法以及忍辱负重活下来的决心。他说，人都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自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既无法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和父亲的愿望，也死得像鸿毛一样轻不可言。司马迁并没有消沉下去，在狱中，他怀着满腔的悲愤继续创作。4年后，他被赦出狱，从此，更加专注于创作。公元前91年，司马迁用毕生精力和心血写成的《史记》这部不朽巨著终于问世了。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用毕生的精力，倾注了全部心血，写成了《史记》。鲁迅先生曾赞誉《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先例。特别是他遭遇不幸后忍辱负重，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的精神更为后人所敬重。

盖乌斯·恺撒

凡是初学拉丁文的人，都有一本必读之书，叫做《高卢战记》。这是一本用标准的拉丁文写作的著作，它文笔清新、结构严谨、叙事翔实、妙趣横生，记载了公元前58年到公元前50年共计8年时间内罗马军队出征高卢的历史事迹。它的作者便是大名鼎鼎的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他是古罗马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也是共和国著名的独裁者。

恺撒于公元前100年出生于罗马古老而显赫的尤利乌斯家族，少年时便有非凡的抱负，他崇慕权力和荣誉。由于良好的家庭背景，他受到高等的教育，曾到罗得斯岛学习修辞学和演说术，并且曾拜在古罗马著名的演说家毛路门下。因而恺撒不只拥有政治家的野心，而且拥有文学家的才华和雄辩的口才，这使得他在政治道路上如虎添翼。

恺撒生活的年代正处在罗马奴隶制社会各种矛盾激化、共和国发生严重危机的阶段，由于家族的优势，恺撒早早地就与政治结缘。13岁时他当选为朱比特神的祭司，18岁时又娶了著名民主派人物秦纳的女儿为妻。后来，为了躲避政治迫害，他不得不过了一段流亡的生活。

公元前78年，危险消除之后，恺撒踏上了回国之路。途中遭遇了一群海盗，海盗见他气宇不凡，料定是个有来历的人，便抬高价码向他索取20塔兰特作为赎金。不料恺撒竟对他们的要求不屑一顾，还提出愿意支付50塔兰特，海盗们连连称奇，不禁对他刮目相看。当恺撒刚刚获得自由后，他便领着一支军队清剿了那股捉他的海盗，并且从中获得大宗财物。

在政治道路上，恺撒还擅于以金钱铺路。他经常慷慨捐资，甚至不惜荡尽家财，欠下大笔债务。但这样一来，他也笼络了许多人心。

在西班牙任职期间，恺撒政绩卓著。他通过征服许多部落而使罗马统治的疆域大大地扩展了。而且战争的胜利使他发了财，他的部下包括士兵们也都分到了油水。大家对他很满意，宣布他为“英白拉多”，即胜利的统帅之意。恺撒开始向最高权力的目标一点点进发了。

恺撒的雄辩的口才、改革派的形象、慷慨大度的品德和在西班牙等地的战功，在平民和相当一部分上层人士中间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同时，他也致力于拉拢声名显赫的权势人物以形成联盟。公元前60年的夏天，恺撒如愿以偿地同庞培、克拉苏这两位巨头达成相互支持的协议，史称“前三头同盟”。罗马这三位有巨大影响的政治家谁也不能单独掌权，于是他们便联合起来，同元老院相抗衡。

公元前59年，恺撒在庞培和克拉苏的支持下当选为执政官。在他执政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益于社会进步的改革。在遭到贵族派的激烈反对之后，恺撒凭借掌握的兵权和其他两头的支持，取得了胜利。根据恺撒的命令，在罗马开始公布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决议，他要以这种形式影响社会舆论，于是历史上最早的官方报纸就诞生了。

执政官任期届满之后，恺撒于公元前58年出任了高卢总督。他利用当地部落间的重重矛盾，借口解决纷争而派兵入侵。他用分化瓦解和武力征服相结合的办法，逐渐吞并了整个高卢地区。这些都由他自己亲手记载在《高卢战记》之中。

对高卢的征战是恺撒政治生活的重要阶段，他把从高卢掠夺来的巨额财富进一步收买城市贫民和网罗党羽。随他征战多年的10个军团是他重大的政治依靠。这引起了克拉苏和庞培对他的嫉妒。好大喜功的克拉苏在对帕提亚的战争中阵亡了，而庞培则日益拉拢贵族派，殚精竭虑地打击恺撒。至此，前三头同盟彻底瓦解了。

很快，敌视恺撒的势力在元老院会议上占了上风，庞培被授权招募军队。恺撒处于生死攸关的时刻。公元前49年1月10日，恺撒带领少量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进罗马，夺得了罗马政

权。他对政敌实行宽大怀柔的政策，获得了一部分元老贵族和骑士的支持。公元前 48 年，恺撒发动了同庞培争夺东方各行省的战争，在著名的法萨卢战役中，彻底击败了庞培。在途经埃及时，他把依附于他的埃及女王克丽奥帕特拉七世扶上了台。

一场内战过后，恺撒胜利回师罗马，被推举为集军、政、司法、宗教等大权于一身的独裁官，成了名符其实的无冕之王。

但是恺撒的独裁和实行的一系列措施，削弱了元老贵族的势力，更引起了他们强烈的不满。他们视恺撒为共和国的颠覆者和王权的觊觎者而加以反对，公元前 44 年 3 月 15 日，恺撒被密谋刺杀了，他身中 23 处剑伤，倒在庞培雕像的脚下。在政治的浪潮中乘风破浪了几十年的恺撒，尽管取得了至高的地位，最终还是丧身于政治的漩涡之中。

恺撒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堪称文武双全。在政治上他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在军事上他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常常能身先士卒，以少胜多。在文化方面，他的贡献也不小，如恺撒于公元前 46 年对罗马的历法进行了改革，制定了通常所说的“儒略历”，这种历法影响深远，在西欧用到 16 世纪，在俄国用到 1918 年，至今还为许多东正教徒所使用。恺撒还堪称为一位文学家，他良好的文化修养使他在骑马行军的征战生活中还能进行文学创作。他留下过大量书信和演说辞，可惜都已散佚。据历史上的一些文学家的记载，他曾写过《论类比》、《反加图》、《沿途杂记》等涉及面不同的著作，但流传至今的只有《高卢战记》和《内战札记》两部影响颇大的著作。这两部著作记载了恺撒亲身经历的事件及其生活的时代特色，既是战争回忆录，又是具有文学与思想价值的重要史料。

王 充

王充是中国东汉时期的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无神论者。他在批判当时的神学迷信中，捍卫和发展了先秦以来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建立了元气自然论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他的思想成就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他也被称为是中国最早的“通明博见”的无神论者。

王充自幼就很聪明，6岁开始读书识字，8岁到书馆读书，品学兼优。因此，后来被保送京师太学深造，跟大学者班彪（《汉书》作者班固的父亲）学习。他却不拘守一家之言和章句之末节，而是博览强记，通览百家之言。正是因为这种学习精神，加上自己的学术见解与班彪合不到一起，不久王充就离开了班彪，自己独立进行研究。他游学洛阳，时间长达十六七年之久。洛阳当时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各种学说和思想争论和斗争的中心。他生活很贫困，无钱买书，只能到市上书肆去博览群书，其中包括自然科学的书籍。洛阳游学对王充思想的形成，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游学的过程中，王充不盲从当时的“世书俗说”，常“考论虚实”，独自研讨，终于成为一个学识超群、“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大学问家。

有一天，王充路过街头，见围满了人，便挤了进去。只见一个道人盘腿而坐，面前放着一尊金佛，黄绫上写着“如来算命”四个字。那道人口里念念有词：“各人吉凶祸福，佛祖了如指掌。要说出事由，佛祖明示祥歹。祥者佛祖点头，歹者佛祖不动。”

王充逢场作戏，问：“我想做生意，不知能否赚钱？”只见那老道对佛像深深一揖，微睁二目，自动两唇，然后拿起金戒尺，在佛像前后绕了几绕，佛像当即频频点头，老道双手合十，说：“恭喜，恭喜，后定发财！”并要了王充三两纹银。

第二天，王充带了个泥塑金像又来到街上，对那老道佯笑

曰：“请试试这个如来菩萨灵不灵。”老道一愣，急得半句话也说不出来，慌忙拿起那尊小金佛溜了。就这样，王充在众人面前破了那道人的骗人机关。原来，佛像是铁制的，佛像的头可以动。那金戒尺则一头是铁，一头是磁石。那道人如要佛像点头，便握铁质的一端，使磁石的一端在佛像头部绕动，哪有不点头之理，反之则一动不动。

王充生活的年代，正是东汉政治稳定、生产发展时期。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大肆宣传“君权神授”的“讖纬之说”，宣扬天人感应，用神学化的儒学进行思想统治。王充继承前辈唯物主义思想家的优良传统，吸收汉代自然科学成就，写成《论衡》一书，以元气自然论批判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

他认为元气是构成天地万物最原始的物质基础，天是物质的、自然的天，没有情感，没有意义，从而动摇了天人感应的基础。他还论述水旱、雷电、日食、月食等都是自然现象，绝不是上天的谴责，明确得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而行而应人”的正确结论。在形与神的关系上，王充认为精神不能离开形体而单独存在。为了批判“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的错误观点，王充在《论死》篇中除正面说明无鬼外，还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认为自开天辟地以来，死人以亿万计，大大超过活着的人数，如果人死为鬼，那就会“一步一鬼”，到处都是，为什么主张有鬼的人却说只见到一两个鬼呢？这种批判虽不深刻，却闪耀着机智的光芒。王充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对生而知之的唯物主义先验论。他写下《实知》、《知实》两篇文章，专讲认识论，批驳圣人能“前知岁月，后知万世”的错误观点。他认为人的认识来源于感觉器官和外界的接触，“如无闻见，则无所状”，即使是圣人，同样“须任耳目以定情实”。

王充壮年时代曾做过地方小官，但他性格耿直刚烈，不卖弄聪明去追求俸禄，不为个人利害去巴结长官。经常说别人的长处，从不炫耀自己。结交朋友着重品德和才能，非志同道合的，他终日不言。由于不肯同流合污，他曾遭到诬陷。因经常与长官意见不合，他主动辞去了官职。面对仕途的坎坷，人情的冷暖，

统治者的昏庸无能和伪书俗文的虚妄，他居贫苦而志不倦，幽居独处，闭门潜思，断绝一切礼节性的往来，专心致志地著述。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封建时代下层知识分子不幸遭遇的一个缩影，但是他不屈的战斗精神、求实的态度和发展哲学理论上的毅力，却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王充的晚年是非常凄苦的，孤独无靠，贫无供养，但他并未因此而消沉。公元90年至91年间，六十四五岁的王充，仍精力充沛地写了《养性》一书。因感到自己的生命不久，于是又着手将自己历年写下的一百多篇作品整理成一部“新书”。王充说，这部书所讨论的问题有上百个，上自传说中的黄帝、唐尧，下至秦朝、汉代，“幼老生死古今”全都涉及到了。王充认为，这部书用圣人的道理作为评论是非的准则，从博通古今的人那里找依据来剖析事理，就象用秤称物品那样公平，又如拿镜子照东西那样清楚。这大概就是他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论衡”的原因。这部书的序言，就是王充临死前写的《自纪篇》。

王充的无神论思想，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他死后，都一直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异端”，受到冷遇、攻击和禁锢。他的著作《论衡》，“在中土，不得传”，后来因一知名学者蔡邕到了吴地（即今江浙一带），始得此书，带回西安，才没有使王充的思想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由于王充的思想直刺汉儒神学，所以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后代唯物主义思想家 and 无神论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诸葛亮

诸葛亮，字孔明，生于公元 181 年，卒于公元 234 年，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县南）人，是中国三国时期蜀汉政治家和军事家。著作有《诸葛亮集》。

诸葛亮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父亲诸葛珪曾做过太山郡郡丞（郡守的助手）。诸葛亮幼小时，母亲章氏病故，7 岁时父亲猝然离世。从此，诸葛亮兄弟成了孤儿，全靠叔父诸葛玄抚养长大。叔父去世后诸葛亮带着诸葛均迁居到襄阳附近的隆中隐居下来，过着边耕边读的生活。他爱读兵法和先秦法家著作，反复阅读《申子》、《韩非子》等著作，用心研究各种学派的观点和主张。

在隆中时，诸葛亮已极有才干。他自比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和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乐毅，这反映了他的政治志向。

诸葛亮经常和石广元、徐庶、孟公威、崔州平、庞统等有才华的年青人交往，切磋学问，议论国事，成了挚友。他还经常找当时颇有声望的大名士庞德公、司马徽、黄承彦等请教。庞德公称他为“卧龙”。诸葛亮在隆中度过了 10 个春秋（公元 197 年至公元 207 年）。这一时期，当时割据荆州的刘表，几次请他出来做官，他认为刘表是个庸碌之辈，便谢绝了。

诸葛亮在隆中期间，东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地的割据势力连年征战，拥地称雄，经过十多年的混战，曹操先后削平董卓、袁术、袁绍、吕布之流，占据了北方；孙权继承父兄的基业占据了江东；刘表占据了荆州地区。当时刘备（汉景帝儿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涿郡涿县人）势单力薄，先后投靠过曹操、袁绍、刘表，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但是，他并不甘心做别人的附庸，一心想独立发展自己的势力。为此，他到处礼贤下士，

广揽人才。

刘备在襄阳时，当地的名士司马徽向他举荐过诸葛亮。后来又从自己器重的谋士徐庶那里知道诸葛亮是个杰出的人才，决定到隆中拜访诸葛亮。207年冬天，刘备两次去隆中拜访诸葛亮，但都没遇上他。可是刘备为了找理想的助手，第三次去茅庐拜访诸葛亮。诸葛亮被刘备的真诚所感动，在自己的茅庐接待了他，并且把自己长期深思熟虑的统一天下的谋略说了出来。

诸葛亮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向刘备提出占据荆、益两州，谋取西南各阵统治者的支持，后取孙权，对抗曹操，进而统一全国的隆中对策。刘备为有如此理想的助手而深感欣慰，他恳请诸葛亮出山，帮自己打天下。诸葛亮慨然应允。

诸葛亮跟随刘备来到新野，帮助清理游户，扩充军队，他的各方面才能，很快在实践中显示了出来，刘备器重诸葛亮，对一切军国机密大事，都和他商量决断，两人“情好如密”。

公元208年7月，曹操统帅20万大军南征刘表。刘表病卒，刘琮抢先自立为荆州牧。刘琮被曹操的声势吓破了胆，惊惶之余，遣使投降。

刘备慌忙南撤，曹军在当阳长坂追上刘军，刘备军队被打败。当此之时，诸葛亮出使东吴，促成孙、刘联盟，扭转了局势。

公元208年11日，孙、刘联军（共5万多人）会师后，统归周瑜指挥，接着沿江而下，迎击敌人，与曹军在赤壁相遇。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以孙、刘联军的胜利和曹军的失败而告终。赤壁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这一战役为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赤壁之战胜利的基础是“孙刘联盟”。诸葛亮在成败的关键时刻，出使柴桑，正确分析形势，把握有利时机，说服孙权，促成孙刘联盟，为赤壁大战的胜利立下了头功。

赤壁大战以后，刘备势力大增，领兵进击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今湖南境内）。江南四郡纷纷不战而降，刘备乘机占据了荆州南部的大片土地。郡下诸臣推举刘备为荆州牧。刘

备领兵屯驻油口（今湖北公安南），封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类似总参谋长），并委派他督理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诸葛亮注意安定三郡的社会秩序，“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公元214年，刘备占领益州。刘备自称益州牧，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协揽军政事务。诸葛亮全力以赴协助刘备治理巴蜀。诸葛亮充分发挥卓越的治国才能，发展经济，训练军队，使刘备的势力大增。

公元217年，刘备占据汉中而结束战事，自立汉中王。

公元221年4月，诸葛亮劝说刘备即位，建蜀汉国，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刘备在成都称帝，立刘禅为皇太子，以诸葛亮为丞相。称帝三个月后，即领兵伐吴，为襄樊之战中被吴军擒杀的关羽报仇，诸葛亮、赵云苦谏却无济于事。

公元222年，吴蜀交战，吴军连破蜀军40余营，刘备大败，率残兵败将逃回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公元223年2月，刘备病危，便派人赴成都，诏诸葛亮到白帝城，“苦嗣子刘禅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表示竭尽全力，忠心辅佐幼主。同年四月，刘备病死，刘禅即位，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兼任益州牧。从此，诸葛亮全面担负了治理蜀汉的重任。

诸葛亮纵观天下风云变化，根据蜀汉的国力与兵力，制定了正确的外交路线和治国方针，以确保主动，共御强敌。对外采取和东吴恢复吴蜀联盟的关系。根据当时的国力，诸葛亮暂时对南中叛乱采取抚而不讨的政策，发展生产，休养生息，恢复国力。

公元225年3月，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平叛。诸葛亮采取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平定了南中之乱。诸葛亮恩威并施，七擒孟获，使孟获心悦诚服地率众投降，同时也赢得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心。

诸葛亮南征，不仅取得了平叛南夷的胜利，而且较好地解决了蜀汉中央与地方、统一与分裂势力之间的矛盾和蜀汉政权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此后，诸葛亮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巩固了南中的安定。

平定南中叛乱后，诸葛亮加紧训练兵马，准备北伐。公元

226年，魏文帝曹丕病死，曹睿即位。诸葛亮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第二年春，亲自率兵，北驻汉中，乘机进击曹魏。

北伐临行前，诸葛亮给刘禅上了《出师表》，阐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希望蜀汉政权能够贯彻执行。

公元228年，诸葛亮出兵北伐。街亭失守，箕谷失利，战局对蜀军不利。诸葛亮感到蜀军不宜再打下去，便率余部退回汉中。

第一次北伐失败以后，诸葛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为了严肃法纪，做到赏罚分明，他忍痛处死了违犯军令、导致战争失败的马谡。

公元228年冬诸葛亮进行第二次北伐，公元229年，公元231年二月，三、四次北伐相继失利。

经过几年的战争，蜀汉的人力、物力损失很大，诸葛亮推行“休士劝农”“教兵讲武”整顿内政，准备条件。经过三年的准备，公元234年2月，诸葛亮率10万大军杀出斜谷口，占据武功，在五丈原扎营，进行第五次北伐。诸葛亮与司马懿在渭水南岸相持。诸葛亮派人给司马懿送一套女服，想激怒他迎战，但未能奏效。两军在渭水相峙了100多天。八月间，诸葛亮因积劳成疾，一病不起，病逝于五丈原军中。

诸葛亮的五次北伐，把战争引向敌区，掌握战役的主动权，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取得了“以攻为守”的效果。

诸葛亮病逝时年方54岁，根据其遗嘱，他的遗体被安葬在沔水定军山。安葬他时，后主派大臣吊唁赠他“忠武侯”的称号，后人又称他为“诸葛武侯”。

诸葛亮在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中，辅佐刘备父子治蜀显示了非凡的治国才能。

诸葛亮把选拔人才看作是国家兴亡的大事。他反复强调“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诸葛亮的“贤”的标准一是有才能，能治军治国；二是忠于蜀汉政权，能够贯彻蜀汉的方针政策。

诸葛亮“用人不限其方”，广揽人才，使蜀汉朝中官员来自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割据集团。

诸葛亮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他劝张爽、尹默、谯周等人从事教育。蜀汉建立了国家最高学府太学，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培养封建阶级的各方面人才。

诸葛亮执政过程中，深感民乱始于政乱，即始于豪强官僚的专横自恣。诸葛亮亲自主持制定了《法检》、《科令》、《军令》、《蜀科》等法令条例，并颁布执行。

诸葛亮执法的特点是，不避权贵，不徇私情，而且刑罚有准，轻重适当。在执法过程中，诸葛亮还注意把“威之以法”和“服罪输情”结合起来，给人以出路和希望。

诸葛亮还注意把行法和教化结合起来，三令五申各种法律条令，努力做到人人皆知。诸葛亮厉行法治，科教严明，赏罚必信，使蜀汉政治清明，逐步稳定蜀汉秩序。

为了维护蜀汉的统治，增强国力，诸葛亮推行“务农植谷，闭关息民”的政策，促进农业的发展。

为了解决军粮，诸葛亮在汉中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

诸葛亮重视水利建设。组织人力，在成都市西北郊的柏河上修了一条九里长堤，人们称它“诸葛堤”。

诸葛亮实行盐铁官营政策，还鼓励种桑养蚕织锦，使蜀锦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

诸葛亮反对奢侈浪费，提倡节俭，主张丰收之年不浪费，平时注意储备，以防灾荒。

诸葛亮生活在割据势力争雄的年代，他十分重视军队建设。他认为，治理军队是保护国家，巩固政权的大计。

诸葛亮重视士兵在战争中的作用。

诸葛亮不仅严格训练和教化士卒，还注意对将领的教育。他写了《将苑》一文，人们称它是将之道。

诸葛亮还十分重视军队训练。经过诸葛亮严格训练的军队，“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

诸葛亮在治国、治军过程中提出的原则和方针，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纵观诸葛亮的一生，他的运筹帷幄的风采，宁静淡泊的气

度，谦虚务实的作风，“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百折不挠的意志，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和品格。难怪历代“端推诸葛亮是全人”，说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忠贞的典型。

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伊斯兰教的奠基人。他根据阿拉伯人固有的宗教信仰，参照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经过15年的思考、探索创立了伊斯兰教。《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经典。

穆罕默德约公元570年4日降生于阿拉伯半岛西部的古莱什部落。他的父亲名叫阿卜杜拉，他在儿子出世前就病逝了。母亲叫阿米娜。

穆罕默德早期在麦加布施并传教（公元610—613）完全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当时，第一个响应他的号召加入伊斯兰教的是赫蒂彻，她承认他的先知地位。后来他的至亲好友也相继入教。

公元613年开始，穆罕默德的传教活动由地下转为公开。穆罕默德公开主张人们应该经济平均享有，以避免贫富悬殊，善待奴仆。

穆罕默德主张慈爱、同情、友好。

穆罕默德号召人们归心安拉，归心他，才是真理，安拉是世上惟一的神。他还认为，人的命运由安拉安排，个人无法选择。他还要求人们信崇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和先知。

公元621年和622年拉吉族人和奥斯族人两次派人拜访穆罕默德，并邀请他前往雅斯里布道去调解两个部落之间的纠纷。穆罕默德答应请求前往阿格白，解决两个氏族之间的矛盾，伊斯兰教史上分别称之为“第一次阿格白誓约”和“第二次阿格白誓约”。

在麦地那穆罕默德得到了当地赫子拉吉族和奥斯族的广泛支持，并建立了第一座清真寺，规定了宗教的信仰、教规和典礼制

度，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和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

穆罕默德由麦加迁至麦地那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以后，麦加的贵族对此深感忧虑，采取种种手段进行破坏活动。为了进一步巩固麦地那政教合一的政权，穆罕默德率领穆斯林武装，用武力与麦加贵族进行斗争，由此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圣战。

公元 623 年，他亲自率领军队拦截经麦地那去叙利亚的麦加商队，袭击 3 次，均未成功。公元 624 年 3 月，穆罕默德带领 315 人的队伍，袭击由艾布·苏富扬率领的从叙利亚返回麦加的商队。穆斯林初战获胜，打击了敌人的锐气，大长了穆斯林威风。

公元 625 年 3 月，艾布·苏富扬调动 3 千余人攻打麦地那。穆罕默德亲率 1 千人出城应战。但这次穆斯林军队的部分士兵临阵逃脱，因而战败，只好退回麦地那。

公元 627 年 3 月，艾布·苏富扬率军再次进犯麦地那。穆罕默德率领穆斯林们顽强抗敌，最后征服他们，拔除了异教徒在麦地那的最后据点。

接着，穆罕默德又征服了住在麦地那与麦加之间的白尼·利哈扬族、白尼·盖尔德族等各部落，将势力范围扩展到麦加附近。

早在公元 622 年，穆斯林教徒从麦加迁移到麦地那以后，便把面向耶路撒冷清真寺行礼拜的教规调整为改向麦加禁寺。穆斯林们礼拜时，都把头朝向易卜拉欣在麦加建立的天房。原来，天房是阿拉伯人的崇拜之地，每年他们都到天房禁寺来朝觐。但是，穆斯林们迁到麦地那以后，古莱什人竟把他们拒之于禁寺之外。穆罕默德决定做一次朝觐尝试。他率领一千四百名穆斯林不配带武器，赶着大群祭祀牲口，亲赴麦加进行朝觐。经过几经周折，终于达成了“侯达比亚协议”。协议规定双方休战 10 年，麦地那人不许袭击麦加商队。古莱什人自第二年起离城三天，允许麦地那穆斯林前来朝觐“天房”等等。

侯达比亚协议以后，为确保麦地那的安全，穆罕默德集中力量打击麦地那周围的犹太人，肃清他们的残余势力。

为了扩大穆斯林势力，穆罕默德率军继续向巴勒斯坦、叙利亚一带扩张。此次远征虽然失败，但在当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叙利亚边境附近的各个阿拉伯部落相继加入伊斯兰教。穆塔城战役以后，穆斯林占领了从麦地那以北到叙利亚边的广阔地区，从而加强了伊斯兰教的力量。

穆罕默德在迁往麦地那后的 10 年传教和建设过程中，以“圣战”的名义，先后发动了 65 次战役，其中他亲自带兵出征达 27 次。

穆罕默德巩固麦地那政权以后，准备集中力量攻克麦加城，但是因达成“侯达比亚协议”而不好宣战。公元 629 年，穆罕默德找到了废除休战协议的借口，下令出征。

公元 630 年 1 月，穆罕默德征服了麦加城，又征服了附近其他一些地区。公元 631 年，阿拉伯半岛上的各部落纷纷派使团到麦地那表示友好和归顺，改奉伊斯兰教。当时盛况空前，故史称“代表团之年”。基督教和犹太教居民，亦派代表团来签订和约，愿以纳贡形式来求得宽容。

同年夏天，穆罕默德又率 3 万军队，再次出征叙利亚，与那里的异教徒部落签订了和约，同意他们可以保持原有的信仰，但每年必须缴纳一次人丁税。这一先例在非伊斯兰教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此，穆罕默德用宗教和军事手段统一了阿拉伯半岛。

穆罕默德自公元 610 年至 632 年，艰苦创教 23 年之久，他承受了一般人所不能担负的困苦，于公元 632 年 6 月 8 日（伊斯兰教历）病逝于麦地那。穆罕默德给人们留下了珍贵的宗教信仰，为伊斯兰教文明奠定了基础。他作为一名著名的宗教、政治、军事领袖将永远彪炳史册。

王安石

王安石（公元 1021 ~ 1086 年），字介甫，晚年号半山老人，宋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是中国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

宋真宗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二日（1021 年 12 月 20 日），王安石出生于临江军之新淦县（今江西新十县）。宝元二年（1039 年）任江宁府通判的父亲王益卒于江宁。王安石在江宁守丧。庆历元年（1041 年）王安石入京应礼部的考试，第二年三月终于以第四名进士及第。中进士之后，王安石被任命为签书淮南判官，八月至扬州赴任。其间，他至南丰与久欲结识的曾巩相见，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王安石个性倔强，大至处理国事，小至与宾朋交往，都不屈服于威势。王安石个人品格正派，他不爱财，不好女色，生活不太讲排场，与地位低的人交往也不喜欢摆架子，是个封建社会中能坚持儒家传统的操守，行为检点的人。

扬州任满后，赴京听候调选。王安石不愿求京官职，而愿意继续在地方任官，以进一步了解民情和增长从政才干。于是他被调任为浙江鄞县县令。

作为一县百姓的“父母官”，王安石在鄞县督促乡民兴修水利，构筑堤堰，疏浚渠川，开挖塘陂，以解除干旱的威胁。在农民青黄不接之际，王安石把政府存粮借贷给他们，秋收后让农民加少许利息归还。他这种措施在鄞县收到实效，使他更加自信，对他执政以后在全国推行青苗法大有影响。

皇祐三年（1051 年），王安石以殿中丞升任舒州通判，更丰富了他从政的经验。舒州通判任满后，王安石赴京听候调选，并乞外任。后被改任为群牧判官，群牧司是主管国家养马事务的机

关。在群牧判官任上并不能施展王安石的政治抱负，他仍然请求外任。于嘉祐二年（1057 年）知常州。

不久，他被调任江南东路提点刑狱。提点刑狱是掌管一路（宋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划）司法、刑狱，审问罪囚，复查案件，并监察地方官吏大员的官职。在任满回京后，他对国事必须实施改革的思考与建议，写进了著名的《上皇帝万言书》中。

提点江东刑狱任上，王安石仍以兴利除弊为己任。江东路是北宋茶叶的主要产区之一，当时政府实行茶叶专卖制度，称为榷茶制。嘉祐三年（1058 年）九月，废除了榷茶制，改为由政府收税而允许百姓贩卖茶叶。但一些官员要求恢复旧茶法，王安石著《茶商十二说》，坚决反对复旧，终于在江东路坚持了新茶法。

王安石在地方任职十余年的作为，使他声誉日隆。朝廷于嘉祐五年（1060 年）五月，任他为三司度支判官。同年十一月，朝廷又任命他兼任同修起居注，这是记录皇帝每天言行的工作，官居清要，但王安石对此不感兴趣。曾到厕所里去躲任命的敕书，但朝廷强行敕令，他只好就职。嘉祐六年，王安石改任为知制诰，并纠察在京刑狱。第二年冬天，王安石又被加上了同勾当三班的职务。英宗继位后不久，王安石母亲去世，他辞掉一切职务，回江宁守丧。

王安石在地方和中央任职达 20 余年，长久的从政历练，使他对宋王朝的国势民情有具体的了解。他给仁宗上“万言书”，第二年又写了《上时政书》，集中地发表了他的政见。

神宗即位后，常与左右大臣商议变法图强。他对王安石的才干早有所闻，即位后即委任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没几个月，又召为翰林学士。神宗向王安石询问治天下的办法，王安石指出“变风俗，立法度”是当务之急。

熙宁二年（1069 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当时宰相是曾公亮与富弼，参知政事有唐介、王安石等。这五位宰执大臣乃“生、老、病、死、苦”。王安石 49 岁，生气勃勃，精神焕发。但苦于初上任便碰上这样的局面，他逐渐意识到不设置新机构恐怕无法实行改革，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

总机关。神宗让枢密院陈升之与王安石共同主持三司条例司的工作。又选吕惠卿、苏辙等人为属官。三司条例司为变法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并具体制定一些新法的条例，熙宁二年，这个机构并入中书。

经过一系列准备之后，在王安石主持下，自熙宁二年七月至七年九月，陆续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将兵法等变法的主措施，并改革学校和科举。

王安石的变法的总目标是富国强兵，巩固封建国家的统治。虽然由于变法本身的局限及在执行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产生许多弊端，实际执行情况与王安石原意也有不小的差距，效果自然是要大打折扣的，但某些新法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首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兼并之家。其次，新法的实施增加了国家收入。再次，新法对于社会生产的发展起过一定作用。

但王安石的变法，以失败而告终。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由于新法的全部内容都是从统治者的利益出发而制定的，因而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此外，还有其他原因，如反对派的强大，用人不当，变法派内部的矛盾，变法进程过急等。

王安石变革“祖宗田制”，在统治集团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是一些元老重臣反对最为激烈，反对变法的首要人物是司马光。同时，韩琦、程颢、苏轼等人均一再上疏言新法不便。神宗为之动摇。十二月，王安石被任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变法在王安石主持下加快了进程。熙宁七年四月，天灾频频，反对派人物借此中伤王安石，于是他被第一次罢相，吕惠卿、韩绛当政，新法又恢复施行。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恢复相位，但变法停滞不前。第二年六月，其子逝去，王安石极为伤痛，十月，第二次罢相，再也没有回到京师。

任人不当也是新法失败的重要原因，王安石仍用旧有的各级官僚执行新法，于是新法都走了样。变法派内部的纷争使王安石逐渐灰心。

王安石于熙宁九年（1070年）十月第二次罢相后，直到元祐

元年（1086 年）四月逝世，都居住在江宁。起先，他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的头衔判江宁府，后来，他干脆辞掉了这个职务，只以使相的资格任集禧观使，这是一个清贵的闲职。元丰元年（1078 年），他被封为舒国公，三年，又改封荆国公。这些都是爵位，并无实职。在江宁的十年时间，他始终不再过问国家政事。

王安石在江宁修筑了一个简单的居所，取名“半山园”，他自号“半山老人”。他经常携书卷往来于钟山各胜迹之间。王安石常骑驴外出，但似乎并无一定目的地，如果仆人牵驴在前走，则听凭仆人的意向，如果仆人走在驴后，则听凭驴自己奔走。王安石隐退期间，苏轼路过江宁，曾去拜访王安石。他们同游钟山，论诗谈禅，生活过得很惬意。

王安石闲居 10 年，除读书赋诗外，仍用功著述。他将过去完成的三经（《周礼》、《诗经》、《书经》）“新义”加以修订，纠正其中错误。他还花费许多功夫写成《字说》二十四卷。对文字的含义加以探究，以成一家之言。

王安石的学术思想被概括为“荆公新学”。他的学术思想为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变法的实践又促使王安石进一步完善他的学术思想。新学的标志是《三经新义》的修定颁行。《三经新义》是根据王安石的经说立论的，最后又经过王安石修定。

王安石主撰《三经新义》，是要统一思想，其现实意义是反驳守旧派对新法的攻击，为变法服务。王安石的新学著作除《三经新义》外，还有《字说》二十四卷、《易义》二十卷；《洪范传》一卷、《论语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老子注》二卷、《淮南杂说》十卷。以上著作，除《洪范传》今存于他的文集中之外，其余均已佚。

北宋中叶的诗文革新运动中，王安石无论在诗歌或散文方面，都以自己超卓的见识和杰出的艺术成就，为诗文革新作巨大的贡献。

王安石强调文必须“有补于世”，即以实用为主。同时，他还强调文章要“言志”、“贯道”，不离开圣人之径。他反对西昆

体的浮艳，也批评韩柳偏于辞。

王安石的散文创作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特别他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也居于突出地位。他的政论文联系北宋的政治形势，为变法论战。在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中，他用三百字就把司马光引经据典，冗长不堪，最长一封有三千三百字的三封信驳得支离破碎，显得劲悍凌厉。他的随笔、杂感式小品论证方法各异，最后都能持论公平、深中肯綮、精辟透彻地说明问题。他的游记散文往往夹叙夹议，多议论的成分。王安石形成自己独特的豪悍峻迈、流转畅达的风格，成为蜚声文坛的散文能手，是继韩愈之后，以笔力雄健见长的散文名家。

王安石的诗歌题材丰富，体裁多样，古体近体无所不工。他的诗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有较强的思想性的政治诗；另一部分诗是写景抒情的闲适诗。多用律体、绝句，玲珑工致，十分注意艺术上的锤炼，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陈师道说：“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工、新、奇这三个字正道出了这三位诗人的特色。王安石的小诗的确以工取胜。其绝句最受人推崇，最富有趣味。

王安石在宋代诗坛上，是诗歌成就仅次于苏轼的诗人。是承前启后的诗人。

朱 熹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别称紫阳，世称朱子。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朱熹是中国南宋时期最博学的哲学家、教育家和学者，程朱理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朱熹的父亲朱松是一个很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他因为不满于南宋王朝求和苟安的做法，把家搬到了福建。出生在书香门第的朱熹，从小就博览群书，广读词章，出入佛老，对各种学问有着极为广泛的兴趣。从24岁起，他受学于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开始真正走上理学的发展道路。

朱熹18岁就中了进士，曾担任过秘阁修撰等职。他一生做官的时间不过十几年，但却教了四十多年的书。在教学的过程中，朱熹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朱熹的学问渊博，于学无所不窥，在先秦诸子、佛道思想、史学文学、天文地理、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典章乐律乃至自然科学等许多方面，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及不小的成就。朱熹哲学发展了程颐等人的思想，集理学之大成，构建起了一个规模庞杂而又不失缜密精致的思想体系。认为“理”、“气”不相离，但“理在先，气在后”，“理”是物质世界的基础和根源。朱熹的著作很多，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学者之一，《宋史·艺文志》中著录的有四十余种，未著录的尚有二十余种，另外由其弟子或后人编纂的著作也有二十余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诗集传》、《周易本义》、《西铭解》、《太极图说解》，以及后人编纂的《朱子全书》、《朱子语类》等。

朱熹生活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的时代。他出生那年，就爆发了钟相、杨么起义。起义最后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各地的农民反抗活动仍然时有发生。由于偏安一隅，南宋王朝每

年还要向金朝进贡，被勒索不少金银钱财。在刚走上仕途时，朱熹曾力主抗金，进行北伐，但后来就慢慢泄气了。他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认为搞好内政才是重要的，所以应该对农民起义进行镇压。所以，对当时普遍的农民反抗活动，他不仅感到担心，而且还亲自参加了镇压活动。与此同时，他建议朝廷和地方官要注意对农民进行赈灾，注意轻徭薄赋，从而减少阶级对抗，从根本上消灭人民的反抗意识。为此，朱熹曾设立过“社仓”，由政府借贷粮食给农民，让他们渡过生活中的难关。朱熹认为，这样可以杜绝祸乱之源。朱熹认为，人都是会感恩戴德、害怕威严的，这样做可以既让农民感念官员的恩德，又会畏于官员的威严而不敢反抗。朱熹的这一套想法和做法，都是为了维持统治阶级的需要。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朱熹是我国封建社会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早在北宋时，程颢、程颐兄弟就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在这套体系中，他们提倡理学，说“理”就是世界的本源，万物皆由理而出。朱熹接受了他们的学说，并且有不少发展，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伦理体系。他把三纲五常说成是永恒不变的天理，认为“君臣有君臣之礼，父子有父子之礼”。他认为，“天分即天理”，应当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之分，臣安其臣之分。他极力宣扬，人应该“存天理，灭人欲”，对一切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和学说，都应该扑灭。与二程兄弟一样，朱熹的思想也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因为朱熹的学说主要是从二程继承过来的，所以，在后世人们往往将程朱并称，他们奉行的一套哲学则被称为“程朱理学”。

为了提倡理学，同时为统治阶级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朱熹花了自己一生的大部分精力来进行教育活动。即使是在做官时，他也不忘提倡理学。他做官每到一地方，最重视的就是教育，就是整顿当地的学校。在他的主持下，创办了武夷精舍书院，并且使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得到了恢复。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明人伦，整顿封建伦理道德。在教育上，朱熹主张应该按人的年龄、心理及理解能力，设小学、大学等各类学校。他还主张

教育应该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熟读深思。朱熹的教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不少的影响。

朱熹晚年卷入当时朝廷的政治斗争，被夺职罢祠，其学说被定为“伪学”，遭到禁止。其人也被定为“伪学首魁”，直到去世之时“罪名”尚未解除。但朱熹死后不久，“党禁”解弛，朱熹的地位开始日渐上升，最终成为配享孔庙的“孔门十哲”之一，而其在历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元代复科举后，朱学被定为科场程式。在明清两代朱学被列为儒学正宗，在思想界形成“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的局面。朱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如李朝时期的朝鲜、德川时代的日本，“朱子学”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托马斯·阿奎那

13 世纪中叶，在著名的巴黎大学有一位年轻的神学教授，因沉默、温顺，人送外号“哑牛”。但他才华横溢，年纪轻轻已崭露头角，一些有名望的学者很赏识这位年轻人，阿尔伯特就曾断言：“哑牛”之声必将闻名于世。”果然，“哑牛”后来成了中世纪最有名的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他就是意大利人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 年），中世纪基督教经院哲学居想的集大成者。

托马斯·阿奎那出身于意大利的一个贵族家庭，青年时代就成了多明我修会会士，曾先后在那不勒斯大学和巴黎大学就学，跟随亚里士多德学者大阿尔伯特学习，深深为之折服。这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自 1257 年开始，他在巴黎大学教授神学，用 10 年时间专心从事教学和著作活动，并被罗马教廷任命为神学顾问与讲师。

其时基督教会正统神学家们，如安瑟伦之类，惯于采用柏拉图的先验论哲学来阐述神学教义。面对日益兴起的唯名论哲学和阿威罗依主义，这种思想体系已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托马斯的著作一改前人做法。他首先肯定神学是一门学问，这就是说，神不仅是信仰的对象，而且也可以成为理智把握的对象。接着，托马斯在肯定传统启示神观念的同时，又强调了自然神学的必要性，而他本人更注意对自然神学问题的研究。托马斯的著作广泛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范畴和逻辑方法，重新论证了基督教的信仰，使之成为一个全新的体系。托马斯对基督教思想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托马斯·阿奎那成功地将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融合在一起，建立起了庞大的经院哲学体系。他一生著有 18 部巨著，其中包括集基督教思想之大成的《神学大全》和《哲学

大全》、《论存在和本质》、《反异教大全》等。

托马斯·阿奎那的全部理论都是为天主教信条服务的。他明确提出哲学必须为神学服务，之后，又为上帝存在这一神学最高信条作了哲学的论证，认为应通过上帝的创造物来认识上帝的存在，利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目的论的唯心主义思想推论出万物创造者的上帝的存在。

在所著《神学大全》一书中，他认为宇宙秩序是按等级的阶梯来安排的，从非生物体开始，逐级上升到人、圣徒、天使，最高是上帝，每一个较低的等级都有高一级的目的，并力图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整个体系都倾向于上帝，上帝是宇宙的最终目的。所有知识必须为神学服务，如果知识不以证明上帝为目的，任何知识都是罪恶。托马斯的神学直至现在还支配天主教会思想体系。19世纪末，罗马教廷宣布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为天主教会最高哲学权威。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还流行所谓新托马斯主义，竭力使科学从属于宗教，理性从属于信仰。

托马斯·阿奎那还极力鼓吹教会的权力至高无上，认为如神高于人，灵魂高于肉体一样，教会高于世俗的国家。教皇是基督的代理人，政权应由他掌握，国家必须服从教会，国王必须顺从教皇。他还极力维护封建君主的统治权力，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治形式，并说，没有一个统治者控制和指导民众，社会就会解体。

托马斯·阿奎那从灵魂不死的观点出发，大力宣扬“来世幸福”，认为尘世生活的幸福并非最高幸福，最高幸福是对上帝的静观，从而使灵魂得救。这只有在来世，在彼岸世界才能做到，因而为争取现实生活的幸福而进行斗争就是恶就是犯罪，最大的犯罪行为是异端或异教行为。对一切异教徒均应活活烧死，“将他们从世界上消灭掉”。

托马斯·阿奎那包罗万象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产生后，受到了一些正统神学家的攻击。他去世3年后，巴黎各神学大师曾谴责了219条命题，其中有12条是托马斯的观点。在中世纪，这是最严厉的谴责。

但是，教会在他生前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和极高的声誉，称他为最光荣的“天使博士”。他的学说很快成为西欧中世纪思想领域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学说。1323 年教皇追封他为“圣徒”，1567 年他又被命名为“教义师”。1879 年，罗马教皇利奥十三颁布教谕，规定以托马斯主义为天主教的官方神学和哲学。在 20 世纪中，新托马斯主义在西方思想界中十分活跃。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剧作家。它又是近代西方政治学的奠基人，历史哲学的开拓者之一。

马基雅维利 1469 年出生于意大利半岛的佛罗伦萨。他的家族曾长期是佛罗伦萨的望族，但他出生时已经没落了。依靠父母的家庭熏陶和指导，马基雅维利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少年时代就大量地阅读了西塞罗、贺拉斯、李维等人的著作，通过自学精通了深奥的拉丁文，培养了一种独立思考、崇尚自由的气质。

受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参加了佛罗伦萨的共和革命。1498 年，被任命为佛罗伦萨的第二国务秘书。此后多年的政治生涯，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并且在时势的起落中，为人类留下了一部政治学巨著——《君王论》。

马基雅维利赞美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他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主张结束意大利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他认为，当时处于人性堕落、国家分裂、社会动乱状况的意大利，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惟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他痛感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君主来拯救意大利。于是，他极力称颂当时的阴谋家瓦伦丁诺公爵切萨雷·博贾的欺骗、阴谋、暗杀和其他暴力手段，希望君主效法他，以各种手段达到正确的目的。他的这些主张，比较全面地展现在《君王论》一书中。

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类愚不可及，总有填不满的欲望、膨胀的野心；总是受利害关系的左右，趋利避害，自私自利。因此，利他主义和公道都是不存在的，人们偶尔行善只是一种伪装，是为了赢得名

声和利益。他认为，人都是“忘恩负义、心怀二志、弄虚作假、伪装好人、见死不救和利欲熏心的”；即使最优秀的人也容易腐化堕落，因为作恶事更有利于自己，讲假话更能取悦于别人。人民有屈从权力的天性，君主需要的是残酷，而不是爱。人应当在野兽中选择狮子和狐狸，像狮子那样残忍，像狐狸那样狡诈。君主不妨对行恶习以为常，不要因为残酷的行为受人指责而烦恼；慈悲心是危险的，人类的爱足以灭国。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

马基雅维利还指出，受人敬爱不如被人惧怕。一个君主被人惧怕比起被人爱来，更为安全些。但他有时又有必要让人民相信自己是“集美德于一身的人”。也就是说，统治者在公开场合应表现出爱民如子和仁慈宽厚的样子。惩罚人的事应让其他人去干，最后还可嫁祸于人，找替罪羊，以避免自己受到国民的谴责。奖赏别人的事应当亲自出面，以免让下属行私惠。给人恩惠要一点点地来，让他有盼望。给人打击要一下致其于死地，不让他有报复的可能。君主平常应当不露声色，对凡事装作懵懂无知，避免让下属了解自己。但对下属自己心中要了如指掌，随时操纵他，并且动用杀罚大权。

与此同时，马基雅维利本人也备受人们的身后攻击。没有几个政治哲学家受到像马基雅维利这样强烈的谴责。多年来，人们骂他是地地道道的魔鬼的化身，并把他的名字当作欺骗和狡猾的同义词来使用。其中最强烈的谴责常常出自于把他所倡导的学说付诸于实践的人们之口。人们厌恶马基雅维利，并贬称他为“恶魔的头子”。但伏尔泰说得有理，这只是因为他泄漏了他们的天机。本尼托·墨索里尼是曾经公开称赞马基雅维利的少数几个政治领袖之一。毫无疑问，许多杰出的政治人物都认真地读过《君王论》这本书。据说拿破仑睡觉时把一本《君王论》放在枕头下面，人们对希特勒和斯大林也有类似的传说。

马基雅维利对政治理论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早期的作家如柏拉图和圣·奥古斯丁把政治学和道德学或神学密切结合起来。马基雅维利抛弃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教条式的推理方法，不再从

《圣经》和上帝出发，而是从人性出发，以历史事实和个人经验为依据来研究社会政治问题。他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国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他暗示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人们应该怎样表现，而在于实际上他们怎样表现；不在于谁应该掌握政权，而在于实际上人们怎样取得政权。今天讨论政治学说的方式比从前现实得多，这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由于马基雅维利的影响。他是名符其实的现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恩格斯称赞马基雅维利为“巨人”，马克思推崇马基雅维利为近代政治学的先驱。

马基雅维利在历史学、戏剧等方面也成绩卓著。除《君王论》外，他的代表作还有《论李维》、《战争的艺术》、《佛罗伦萨史》等。

托马斯·莫尔

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英国16世纪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奠基人。他出生在英国伦敦的一个法官家庭。莫尔曾进牛津大学学习，后被开除。1504年被选为下院议员，带头反对亨利七世增加新税的要求。1514年受封爵士。因莫尔与国王意见有分歧，于1532年辞官。1534年，亨利八世设法让国会通过“至权法案”，宣布他（而非教皇）是英国教会的首领。在这项法案之下规定必须作一次“承认至权宣誓”，莫尔拒绝宣誓。1535年莫尔以叛徒罪被处以死刑。

莫尔的主要著作是几乎全由他写的《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即《乌托邦》（1518）。

《乌托邦》是对空想社会主义所特有的某些原理加以明确表述的最早的一本书。在书中，莫尔对当时欧洲各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刚刚产生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莫尔把贵族、地主为了积累资本进行的圈地运动，斥之为“羊吃人”。他写道：“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成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城市要蹂躏完啦”。这种诙谐而辛辣的语言，深刻地说出了英国农民丧失土地的原因，指出了圈地运动的严重后果。莫尔指出，凡是出产羊毛的地方就有贵族和豪绅的罪恶。在英国这个奇怪的国家里，畜生的生活也比失去土地的农民的生活强。他们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前程渺茫，无处栖身。他们习惯于种地，可是现在无地可种。莫尔为深受圈地运动之害的农民大鸣不平。莫尔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见证人，对“羊吃人”的议论是直接针对残酷剥削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而发的。由此他认为只有完全废止私有制度，社会财富才能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最终幸福。

莫尔精心设计的乌托邦制度是社会主义史上第一个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空想社会主义方案。在乌托邦，私有制根本不存在，一切都公有，大家都热心于公事。乌托邦人痛恨私有制，他们知道这种制度意味着人剥削人压迫人，意味着少数人发财致富和大多数人贫困。所以他们不让私有制有任何存在和复活的余地。不仅生产资料公有，连消费品也公有。任何人都不得占有财产，大家关心的是如何共同富裕。对外贸易是由国家经营的。生产的直接组织者不是整个国家，而是城市。所以，国家好像是城市联盟一样。莫尔的方案是社会主义史上第一个主张彻底消灭私有制的方案。

莫尔在社会主义史上首次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社会生产的问题。在乌托邦，劳动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由于劳动义务普遍化，劳动时间有可能大大缩短。在乌托邦，很注意人的全面发展。“一切公民在体力劳动之后，有充分的时间让心灵自由自在并且得到启发。他们认为这就是人生的幸福。”并且在乌托邦不存在城乡对立，也不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

乌托邦人的分配原则是按照需要分配。莫尔认为，只要实行普遍的劳动义务制，就可以生产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一切需要。莫尔提出了实行按照需要分配的两点依据：首先物质是充分的，其次个人都是按需领取需要的物资。他把产品丰富和人们高度自觉看做是实行按需分配的根据，这是莫尔的创见。但是，他不懂得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要在手工技术的基础上达到产品的极大丰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虽然莫尔的按需分配带有明显的禁欲主义色彩，这种禁欲主义的规定显然是同按需分配大相径庭的。但他首先意识到了在产品极其丰富的条件下才能实行按需分配。

莫尔认为在乌托邦中商品货币关系已经不存在。因为乌托邦人生产的不是商品，而是直接满足社会全体成员需要的产品。没有商品生产，也就没有商品交换。因此，货币也就随之废除。在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中，几乎都把商品货币关系当作是永恒的自然现象，这使莫尔大大高出于同时代的思想家。但

是，莫尔并不懂得商品货币关系消亡所应具备的条件。他企图在小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下取消商品货币关系，这只能是一种十足的空想。

虽然《乌托邦》写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之初，但莫尔能用批判的态度对待这个社会的各项原则，同时提出社会平等和共有的思想。直到 18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为止，社会主义思想史上还找不出一部可与《乌托邦》媲美的作品。虽然莫尔所制定的“最好的”社会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莫尔完全有资格被称作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之一。

王守仁

王守仁（公元 1472 ~ 1528 年），字伯安，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中国浙江余姚人，谥文成。出身于官宦人家，其父曾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他从小抱有“读书学圣贤”的志向，就读于名儒。他生活的时代，正值明王朝由稳定开始进入危机、衰败的转变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之中。他忧虑现实，也希望能够改变现实。他认为社会危机的总根源是“良知之学不明”，是烦琐而僵化的程朱理学助长了人欲的滋生。因此，王守仁建立了完整的心学体系，主张从“格心”入手，倡导“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加强道德教化，唤起人们内在的天德良知，从而达到消除“祸乱根寻于无穷”的危险，实现“天下可得而治”。他创立的这套学说，不仅在当时风靡海内，名噪一时，而且在其身后，几乎左右思想界达百年之久；就是对近、现代思想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现实政治中，王守仁也是明代一位事功卓著、刚正严明的政治家，将“开导人心”的道德说教与剿抚并用的军事镇压结合起来，积极加强对劳动人民的控制。

王守仁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大学问》、《传习录》等，其著作汇集是《王文成公全书》，共 38 卷。

王守仁在贵州龙场悟出“心即理”的第二年，即正德四年（1509 年），受贵阳提学副使席元山之邀，主持贵阳书院，讲学授徒。在此期间，他提出了“知行合一”思想。这是王守仁心学哲学确立和发展时期的重要思想之一，也是王守仁哲学思想的“立言宗旨”和最值得重视的部分。“知行合一”的提法，为王守仁首创，是他在吸收和改造程颐知先行后，知而必行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知行合一”首先是针对朱熹而发的，他认为朱熹不

懂“心即理”，把心和理分离开而当作两回事，离心而求理，因而造成知行割裂的弊病。他指出，所谓“知”，主要是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是人先天固有的“良知”的自我体认；所谓“行”，主要是指人的道德行为，是良知的实际表现。因此，知行关系主要是指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活动的关系。它们可以从几个不同方面说明：首先，“知行之体本来如是”，既然人心及心中的良知就是天理，是万事万物的主宰，那么知与行便都统一在心和良知的基础上，“知行本体”就是“心之本体”，也就是“不假外求”而先天固有的良知，因此有知就有行，知就是行，可以知代行；其次，“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相互包含，彼此融会贯通，行中有知，知中有行，行在知在，知在行在，“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以知代行；再次，“真知即所以为行”，由知到行是无矛盾、无过程的必然趋势，因为每个人天理具足的心是生生不息的，如果不被私欲隔断，必然要贯彻到事事物物中去，必然要表现为行，这是良知自然而然向外显现的结果；“不行不足谓之知”，只有行才可称之为知，因此王守仁也承认行而后知的情况，如人有出家旅行的要求，就应去“知路”，了解行程；而亲身“履历”走过了路之后，就可知“路岐之险夷”，路到底如何了，这个知就是真知。行而后知的观点虽然潜在地包含了行为知因、知源于行的思想，但却导致了王守仁“知行合一”说的自相矛盾，这是由于他夸大了行的范围，使之自由出入于主观的心动和客观的活动。最后，王守仁批评了知行脱节、知而不行的“空疏谬妄”，认为如果把知行分成两个，那是“私意隔断”失去了良知本体，不是陷入“冥行妄作”而胡来，就是溺于“揣摩影响”而不行；都有违圣人之教。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第一次明确地规定了知行这对范围，是统一的、不可分离的，为后来唯物主义和启蒙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

王守仁还提出了“良知是学家的准则”命题。这种良知标准说为当政者随心所欲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革新的人们解除了思

想束缚，对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王守仁建立了一套心学哲学体系，集我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学说之大成，它的理论对我国思想界影响深远。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 1483 年生于德国艾斯勒本，半年后全家搬到曼斯菲尔德。父亲汉斯·路德开始当矿工，以后成为小矿主、镇会议员。家庭宗教气氛浓厚。路德 7 岁进入当地一家拉丁文学校，以后在马格德堡、埃森纳赫读书。1501 年进入埃尔富特大学，1505 年拿到硕士学位后继续在校攻读法律。

一次遭遇改变了路德的一生，那是 1505 年 7 月的一天，他在埃尔富特附近的斯托滕海姆旅行，遇到一场暴风雨，雷电交加，路德恐怖地大叫：“救救我，圣安娜！我将去做一个修道士。”这时天空中出现希伯来女神圣安娜（圣母玛丽亚之母），而不是法律保护神。路德平安回家后，不顾父亲的忧伤和同学们的劝阻，毅然决然地进入一家埃尔富特的奥古斯丁修道院，潜心修习神学。1512 年路德获神学博士学位，被聘为维登堡（一译维滕贝格）大学圣经学教授。在教学过程中，他反复研读《罗马书》，认为人的灵魂得救仅靠个人的虔诚信仰，而不在于遵行教会规条。这就是以后形成路德教义核心的“因信称义”神学理论。

1517 年教皇利奥十世借口修缮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派人到处兜售赎罪券，搜刮民财。其中一个叫特策尔的修士，特别卖力，他周游德国，在兜售中大叫：“只要购买赎罪券的钱一敲响钱柜，罪人的灵魂马上就可以从炼狱升入天堂。”他甚至要人们就是只剩一件衣服也应脱下来卖了买赎罪券。这种巧取豪夺、无耻欺骗的伎俩遭到各阶层群众的广泛谴责。1517 年 10 月 31 日，马丁·路德在维登堡教堂正门贴出用拉丁文写的《九十五条论纲》，反对兜售赎罪券，并要求在维登堡大学就他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辩论。马丁·路德的行动揭开了席卷西欧的宗教改革的帷幕。

《九十五条论纲》一贴出，有如火星落入火药桶，引起极大

反响。论纲被译成德文，争相传抄，两个星期内传遍全国。一个当时的人说：“它四个星期内飞传整个基督教世界，好像天使在传送它们。”马丁·路德得到广泛的支持，萨克森选侯腓特烈也庇护着他。1518年8月，教皇命令路德到罗马受审，等待他的将是监禁或死刑。萨克森选侯利用自己的影响，使审判改在奥格斯堡。10月，审判由红衣主教、教皇特使卡杰旦主持。法庭上，路德引经据典，慷慨陈词，驳得卡杰旦无言以对。他在事后对同伴说：“红衣主教像驴子弹竖琴。”当时有谣传说红衣主教将下令逮捕路德，朋友们劝他赶快离开奥格斯堡。路德给教皇和红衣主教各写了一封信后，乘着夜色在朋友的帮助下逃回维登堡。卡杰旦要求萨克森选侯送路德到罗马或将他驱逐出萨克森。1519年，教皇派特使米尔蒂茨请求萨克森选侯支持，特使同意选侯在赎罪券收益中可获利更多作为条件。特使同时与路德周旋，企图把路德骗离萨克森以惩治他。路德一面表示对教皇屈从，但坚持自己是在拯救腐败的教会；一面拒绝离开维登堡。7月，路德与神学教授约翰·艾克在莱比锡就教皇权问题进行辩论。艾克是一位辩论老手。他将教会已定罪的案例如威克里夫、胡斯（两人为宗教改革的先驱）等案重新提出，把路德引入“异端罪”。路德毫不妥协，公开抨击教皇神权，肯定圣经权威，并为胡斯辩护。

1520年，马丁·路德先后发表3篇文章：《致基督教贵族公开信》、《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和《论基督徒的自由》，阐述了自己的神学观点及与此相适应的组织原则和礼仪规定，为路德宗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2月10日，许多学生和教师聚集在维登堡城外，高唱赞美上帝的歌，路德当众烧毁了教皇限他60天内低头认罪，否则开除教籍的通谕以及各种支持教皇权的著作和教会法令集。1521年，教廷正式开除路德教籍。1521年初，皇帝查理五世在沃姆斯主持帝国会议，召路德到会。会上，各地诸侯纷纷发泄对教廷的不满，提出上百条意见。路德有恃无恐，拒不认错，还在会上宣传自己的宗教主张。查理五世面对如此形势，只好让路德先逃离沃姆斯，然后再下逮捕令。萨克森选侯则暗中派人“绑架”路德到瓦特堡，大家心照不宣。路德在瓦特堡避居期间，把圣经译成德文（1522年9月德文本新约出版。

1534 年全部圣经译完，1542 年出版），这对宗教改革、新教传播和德意志语言统一都有重大贡献。

从 1521 年开始，群众性宗教改革运动风起云涌。在托马斯·闵采尔领导下发展为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1522 年路德回到维登堡，连续 8 次讲道，反对暴力，阐述了不愿靠暴力和流血来维持新教福音的观点，呼吁和平，甚至要诸侯无情地镇压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很快地被诸侯残酷地镇压在血泊之中，正当其领袖闵采尔等人头颅被示众之时，路德正新婚燕尔，以力行自己的教义。1525 年 6 月，他与一位修女博拉结婚，夫妻俩感情弥笃，共生有 6 个子女。

1529 年，帝国会议在斯拜尔召开，会上天主教诸侯要求：天主教在新教地区享有全权，而新教在天主教地区将不受宽容；禁止教会财产进一步世俗化等。6 个路德派诸侯和南德 14 个帝国城市提出抗议，以后路德宗和新教被称为“抗议派”。1530 年，皇帝查理五世在奥格斯堡召开帝国会议，谋求天主教和路德派新教和解。会上，路德派提出信仰声明，天主教诸侯反对，路德的好友梅兰希顿答辩。皇帝支持天主教会，路德派以拉丁文、德文公布此声明，这就是梅兰希顿起草的《奥格斯堡信纲》、《路德仍受通缉，未能到会》。

1531 年 2 月，7 个新教诸侯和 11 个帝国城市组成施马尔卡登同盟，与皇帝及天主教诸侯作战。1537 年新教诸侯与神学家再次在施马尔卡登开会，由于路德因病缺席，大会由梅兰希顿与黑森的新教诸侯菲力普主持，会议采纳了梅兰希顿起草的《奥格斯堡信纲》及奥格斯堡帝国会议上的答辩，路德起草的《施马尔卡登信纲》未被采纳。后来路德将自己未被采纳的信纲加以修改，并于 1538 年出版。此文共 21 条，主要列出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区别，成为路德宗脱离罗马天主教的正式宣言。

1538 年施马尔卡登同盟由于丹麦参加力量增强。同年皇帝与天主教诸侯组成天主教同盟。双方时战时和持续了 10 多年，1555 年达成妥协，在奥格斯堡帝国会议上确认：各邦诸侯有权决定其臣民的信仰（即“教随国定”），但教会诸侯一旦改变信仰就丧失其教会职位；帝国城市允许两种信仰等。路德本人未能看见路德

宗的胜利，他于 1546 年 2 月 18 日卒于艾斯勒本（他的出生地），安葬在维登堡教堂。

在德国宗教改革的推动下，路德宗逐渐传播到挪威、丹麦、瑞典各国并向世界各地发展。目前路德宗信徒总数近 8000 万人，约占新教总数 1/4，是新教诸派中信徒最派，世界上有百余个国家有该宗信徒。

路德一生著作很多，后世陆续整理出版。包括论文、讲道词、圣经导论、注释、圣诗和笔记，以及圣经释文、桌上谈和书信等，内容涉及神学、灵修、伦理、教育、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各个方面。路德为路德宗奠定了基本神学理论，归纳如下：1. 因信称义。信徒只要信仰基督就可得救。这也成为新教各宗的理论基础，2. 圣经权威。圣经是信仰的最高准则，否认教皇的权威。3. 廉俭教会。仅保留两项圣礼：洗礼与圣餐。4. 平信徒皆祭司。反对教阶制，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5. “灭职”观。路德重视现世生活，反对修道、禁欲，提倡教士自由结婚。主张完成日常工作即可达到最高道德准则。6. 建立民族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断绝组织联系，以德文传教与举行仪式。但路德把教会管理交给了新教诸侯。

路德发动了德国宗教改革，并使宗教改革在德国取得成功，建立了民族教会——路德宗，打破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局面。路德翻译圣经成德文，不仅为宗教改革运动的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也为德国语言的统一作出重要贡献。诚然，由于农民战争的失败，建立统一德国和消灭封建制度的任务未能完成。但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席卷西欧，为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最终胜利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约翰·加尔文

约翰·加尔文（1509～1564年），是16世纪西欧宗教改革运动中最重要领袖之一，加尔文宗教的创立者。

加尔文出生于法国北部努瓦营。父亲杰勒德·加尔文曾是当地一位有名望的主教秘书，兼主教区教堂律师。母亲珍妮·弗兰克是一位退休的旅馆业者的女儿，不幸早逝。加尔文遵父命12岁成为一名修士，14岁时到巴黎就读于那马奇学院和蒙太古学院。加尔文性情沉深、头脑敏捷、智力过人。1528年他大学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原计划攻读神学。可是他父亲在努瓦营与当地天主教会有了冲突，一怒之下命儿子专修法律，于是加尔文先后到奥尔良、布尔日两所大学潜修法律。1531年他父亲去世，加尔文就放弃了以法律为职业的意向，转回巴黎学习希腊文、希伯来文，研讨（七十子文本）圣经，攻读神学与文学名著。加尔文在就学期间深受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莫、勒费弗尔和瓦拉等人的影响。1532年4月，加尔文发表处女作（评塞涅卡仁慈论），文章被公认为“典型人文主义作品”，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渊博学识与独特风格，但未涉及宗教问题。

1533年，加尔文经历了“忽然的归正”，从罗马公教（即天主教）改信基督新教，对此他解释说：“这种改变是上帝亲自造成的。”实际上，此前他的表兄新教徒阿立威坦对他有较大影响。在一段时期加尔文经过内心长期斗争，对伊拉斯莫、勒费弗尔等的妥协性的教会内部改革深感失望，终于说服了自己而作出重要的改宗决断。此后他彻底改变了信仰生活，开始集中精力研究神学，并积极参与巴黎改革教派组织活动，因而被控为异端，被迫流亡国外，先后到过昂古莱姆、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和日内瓦。1536年加尔文第一次出版了他的神学名著（基督教原理），初版

篇幅不大，此后陆续修改补充，至 1559 年最后修订版比初版篇幅扩充达 5 倍之多。《基督教原理》全书共四卷，按《使徒信经》次序，父《创世主》、子《救世主》、圣灵与教会，每卷 20 章。此书被公认为加尔文宗《圣经》，它是加尔文宗教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 16 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新教百科全书。

1536 年 8 月加尔文赴斯特拉斯堡途经日内瓦，他的好友、法国宗教改革家法雷尔正在该城从事宗教改革。于是法雷尔就赶到旅馆会见加尔文，苦劝他留下来与自己合作。从此，加尔文开始在日内瓦积极推行宗教改革，把自己的宗教思想付诸实施。加尔文按照自己著的《教义问答》和法雷尔著的《信经》着手改革教会，整顿道德风尚、严格纪律，对违犯者轻则不许领圣餐，重则开除教籍。1537 年 7 月，日内瓦大议会决定所有市民均需宣誓接受新教理论。任何人只要有信奉天主教之表现，如持念珠、保存圣物等需议处；妇女着奇装异服者禁锢，赌博者戴镣，通奸者游街后流放。但这些强制性措施遭到部分市民反对。1538 年初，反对派上台，加尔文和法雷尔遭放逐。

加尔文到斯特拉斯堡担任法国流亡者牧师，他从事布道、教育和写作，广泛结识改革派人物。并于 1540 年和一位身体纤弱、容貌动人的寡妇波蕾结了婚，夫妻感情深厚，生有一个儿子可惜早夭。1549 年波蕾逝世，加尔文在书中提起她，说她是自己最好的伴侣和忠实助手。加尔文没有再婚。

1541 年改革派再次在日内瓦掌权，加尔文受邀于是年 9 月受到凯旋式的欢迎回到日内瓦主持宗教改革，直至 1564 年逝世。加尔文于 1541 年 9—10 月间，主持拟定《教会法规》，确定以长老为中心的组织领导体制。加尔文宗的教会包括牧师、教师、长老和执事四种职务。由信徒选举出来的长老是新型社会组织的核心，他们的职责主要是维持社会秩序、道德和纪律。牧师负责布道、主持圣礼和训诫信徒。教师的任务是教授“正统的教义”。执事掌管慈善事业。由小议会和大议会推选的 12 名长老和 6 名牧师组成宗教法庭，负责监督信徒的宗教生活和审理宗教案件，每星期四审讯案件，最高处分可开除教籍，超过此限度则移交市政当局审理。加尔文在为日内瓦宗教改革和加尔文宗的建设及日内瓦神权共和国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毕生的努

力与贡献。

加尔文的改革彻底改变了日内瓦人的政治、宗教和道德生活，他强烈攻击专制主义、暴虐政治，但又坚决反对暴力斗争，主张一种贵族政体与“温和的民主”相结合的折衷主义。加尔文制订《日内瓦法规》，强调日常生活的宗教意义，谴责散漫、轻浮，并通过政府强制取缔赌博、跳舞、酗酒、奇装异服、卖淫等，违者被判刑或驱逐出境。加尔文严禁信徒自由选择教会和自由研究教义，公开支持教会与国家共同镇压异端，在这方面他的所作所为丝毫不比罗马天主教会逊色，许多优秀人物被加尔文亲自批准处死或放逐，在1541—1546年间被处死者58人、被放逐76人，而当时日内瓦居民仅1.6万人。西班牙人文主义者、自然科学家塞尔维特因反对三位一体教义也在1553年10月27日在日内瓦被处火刑烧死，他原是加尔文的朋友，曾给加尔文写信劝说支持推翻三位一体教义，加尔文却通过一位朋友向罗马教会告发塞尔维特，因此，塞被判火刑，在行刑前从监狱中脱逃，结果鬼使神差地逃到日内瓦。在加尔文一次讲道中被发现逮捕，经两个月审讯、监禁，最后被加尔文坚持下处死。加尔文派1555年完全控制了日内瓦。加尔文于1559年创办日内瓦学院——日内瓦大学前身，它培养的牧师派往欧洲各地。加尔文因此被称为日内瓦的教皇，日内瓦也被称为新教的罗马。加尔文于1564年5月27日逝世于日内瓦。著作刊有《加尔文全集》52卷。

加尔文接受了路德的一些基本教义：因信称义、圣经权威、廉俭教会（仅保留洗礼与圣餐两种礼仪，他的圣餐观点介于路德的“临在说”与慈温利的“纪念说”之间，可称为“圣灵感召说”，他认为圣灵作用于我们的内心，使我们明白了救赎、成义、成圣、永生和各种基督赐给的恩惠）和“天职观”（加尔文称为“主的呼召”）等。但加尔文也有他自己的独特内容：

①预定论。这是加尔文学说的核心，它以路德的因信称义为基础，结合保罗和奥古斯丁的预定论演变而来。他认为上帝以其绝对的、不可改变的最高意志对世人进行拣选，被选中者即是上帝的选民，否则就是弃民，要受永罚。他理解的“选民”与祈

祷、善功、修道等完全无关，完全是上帝的恩惠。他认为信徒所做的只是荣耀上帝与证明自己是选民，这可以从事业成功、百事如意、道德高尚等体现出来。他鼓励信徒们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马克斯·韦伯认为这是加尔文宗禁欲主义伦理观的理论依据，它体现出资本主义精神。恩格斯说：“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加尔文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分化、商业竞争的成功与失败的社会现实加以神化，鼓励追求财富，同时又要求破产者、社会下层等服从上帝的安排。

②教会观。加尔文主张教会应监督国家（路德把教会交给世俗诸侯管理）与家庭，他以自己的宗教思想改造社会，使社会基督教化，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加尔文宗有信徒 4000 多万，分布于 80 多个国家。1843 年传入中国。

加尔文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日内瓦。他的著作及在日内瓦建立教会模式，日内瓦学院和他经常与别人的通信，培养了法国、尼德兰、苏格兰的新教和英国的清教徒，他的影响渗透到德国南部、波兰和匈牙利。加尔文的学说是尼德兰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他的伦理观孕育了资本主义精神，促进资本主义在西欧乃至世界的发展。

李 贽

李贽，本姓林，字卓吾，是中国明代具有“反叛”意识的思想家。他是福建泉州晋江县人，生长在一个笃信伊斯兰教的商人家庭。泉州当时是我国著名的对外贸易的港口，有海上“丝绸之路”源头的美称。这种商品经济的贸易关系和社会家庭氛围对李贽的思想形成有重要影响。

李贽幼年丧母，随父林白斋读书学习，12岁时作《老农老圃论》而为人所称道。他26岁时，乡试中举。嘉靖三十五年，被授河南共城（今辉县）教谕职务。嘉靖三十九年升迁南京国子监博士。此后又多年为官，万历八年（1580）辞官，专心著述。晚年的李贽漂泊不定，到处参禅讲学，并出家当了和尚。后北上通州，被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李贽在狱中说：“衰病老朽，死得甚奇，真得死所矣。如何不死？”万历二十年（1602年）三月十五日，还没被最后定罪的李贽用剃刀在狱中自杀。他在咽气之前，用手指写字，与狱卒有如下的对话：“和尚痛吗？”

“不痛。”“为什么要自杀？”“七十老翁何所求？”

用现在的话来说，李贽所犯的是思想罪。在他的思想中，充满了一种追求个人自由与解放的反叛意识。他最主要的著作《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等，里面反映的也大多是这种思想。他曾自言“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他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封建理学进行批判。

在李贽看来，历来儒家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这是不妥的。他认为，天生一人，自有一人的作用，孔子的作用很大，但不能夸大孔子的作用。他讽刺道学家“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

崇拜，挖苦说：怪不得孔子以前的人整天点着蜡烛走路！

李贽进而认为，道学家崇尚的所谓“经典”，是用来骗人的，正所谓“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藪”。他讽刺道学家“依仿陈言，规迹往事”，“瞻前虑后，左顾右盼”，这些人平日只会“打躬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一旦社会有变，“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他批判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虚假说教，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伦理表现在日常生活之中，而不在日常生活之外。他斥责道学家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衣冠禽兽，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两面派、伪君子。他表示与假道学誓不两立，说：“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自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可以知我之不良死矣，可以知我不怕人矣，可以知我不靠势矣，盖人生总只有一个死，无两个死也。”

李贽的思想涉及到许多方面。他早年的自然观有唯物主义倾向，认为天地万物皆阴阳二气所生。他虽表示不信仙佛，但自从接触王守仁心学后，思想有所转变，后来他还接受了禅宗的观点，相信“万法尽在自心”，山河大地同清静本原合而为一。因而李贽的学说服膺于“心学”，并把王守仁的“良知说”，发展为“童心说”。他分析由于人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了许多假事、假理、假言、假语，而逐渐失玄童心；“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他力主批判假言假语、假人假理。李贽的“童心说”影响很大，它不仅成为其批判道学的理论依据，而且作为一种文学新见解，即为文要从真心中自然流出，这个观点对于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公安派散文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非礼勿视”、“男女授受不亲”是当时社会的准则，一个男子与已婚女性的交往是人伦大防。但李贽却视名教如无物。他在麻城削发为僧后，曾带领僧众到一个寡妇的卧室去化缘，他不仅仅以衲子身份与上层社会的女性来往，更收了其中一名孀妇为女弟子，来往通信，讨论佛法，甚至将这些讨论编辑成《观音问》，

刊刻发行，竭力赞颂她们的才能。

他这种行径，自然遭到了传统士人的猛烈抨击，当时的礼部给事郎中张问达给万历帝的奏折中这样说道：“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日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院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士大夫亦捧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最终，李贽的性命就断送在这道奏折上了。

造成李贽这种狂狷气质的原因有多种，但究其根本，应当是社会的变革、信仰的崩溃和陆王心学的内在要求。面对“大礼议”和“国本之争”的纷争，面对张居正的专权和专权后的党争，士人一向引以为自豪的操守在瞬间不知何去何从。陷于党争之中的人，要么放弃原则与操守，要么做一个毫无生气的人，此时，儒家的经世济国思想不敌仕途的风险，或作名士，或作隐士，也就成了文人放浪形骸的选择。这种选择，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乱世之中，当不能“兼济天下”时，“独善其身”就是全身之法，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与自我气节的操守是正直之士对朝局的不满的表达。李贽在这种境遇下由儒入禅，正是随缘任运，但遁迹入山后的徘徊人世，则是士行操守对他的内在要求。这种心理矛盾，也就造就了他的超越放达。

李贽愤怒于理学的杀人本质，希望能为世人建立一个自由的精神世界，使天下人能够做回自我，体现本色，但生长在理学根深蒂固的晚明时期，已无法有任何作为。当他的愤怒不知如何表达时，他只能用佯装的声色，用狷介的行为偏激着。即使在他的后来，还有着公安三袁对性灵的追求，但只能称之为最后的绝唱了。李贽的理想，在愈演愈烈的狂放颓废的表演中，泯然无声。

“七十老翁何所求？”是李贽离开这个人世的最后一句话。他是中国明末的一个特殊人物。作为狂禅教主，他的理论非圣非法，喝佛骂祖，按传统道学观念，他是彻头彻尾的异端。在中国

历史上，不乏才高气傲之士屈死在统治阶级的樊笼中的，李贽就是这样的一位。

李贽的悲剧，正是晚明文人的悲剧，亦是儒学发展到末期时的民族悲剧。他对于无拘无束的人生境界的追求，在那个时代，只能得到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七十老翁何所求？”他的理想最终结束于他自己的激情放任。

让·博丹

让·博丹（1530～1596年），法国政治思想家、法学家，近代资产阶级主权学说的创始人。出身于法国安吉尔省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曾担任过教师、律师、检察官和三级会议代表。除了致力于政治学和法学的研究外，对古希腊哲学及占星学、地理学、物理学、医学均有不凡的造诣，并精通多门外语。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主权”的概念，并把“国家”和“主权”联系起来，创立了国家主权理论。主要著作是《国家六论》（《国家论六卷》）。

《国家六论》中，首先谈到的是国家理论。博丹承认上帝是人类的缔造者，认为上帝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但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上帝，必须首先清楚地了解人类本身和所处的这个社会，必须深入研究促进社会发展的原因，包括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作用。他试图表明自己对世俗政治的兴趣来源于宗教问题。他认为，要了解一个民族，了解人和人类社会，就必须首先了解人类的历史。通过研究一个民族的政治法律制度，我们能够认识这个民族的历史，进而能够认识这个民族的特征。

以此为依据，博丹创立了他的国家论。在研究国家发展历史进程这一过程中，他确定家庭是人类社会联系的首要 and 关键的形式，国家是以家庭为基础而发展形成的。另外，家庭是合法权威和政府的完美原型。博丹在书中推测了国家形成的原因：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家庭繁衍出许许多多的小家庭，而这些家庭再也没有原先那个家庭的凝聚力，这样就产生了许多松散的联合体。因为战争和外来征服者等原因，这些松散的联合体就自发统一起来，形成了国家。因此，国家具有很多家庭的特征。在一个家庭中，男人居于统治地位，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由此，一个国家也不可能实现人人平等。家长至高无上的权威使一

个家庭能够正常活动，国家也是如此。在一个国家中，这样的权威就是国家的“主权”。

博丹认为国家主权是不可分割的，是绝对的、最高的、不受限制的、永恒的权力，主权是一国的标志。博丹指出这种主权在本质上不属于政府，而是属于国家。统治权可以从一个政府转移到另一个政府手中，但是主权却是一个国家永久的属性。主权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人类社会运动的结果。博丹承认国家主权是受到限制的——主权国家应被自然法制约。他明确地指出统治者必须尊重私有财产和家庭，因为财产和家庭是国家产生和存在的基础。

博丹第一次区分了国家类型和国家管理形式。他根据主权所有者的不同，将国家的政体分为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他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国家形式，因为这样国家的主权就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能够协调各种对立的关系。博丹认为人民无法对国家大事做出正确的判断，容易造成混乱，导致无政府状态，因此民主制是一种最坏的国家形式。贵族制往往易于引起党派矛盾和斗争。博丹将君主制分为“领主的”君主制、“暴君的”君主制以及“王权的”君主制，并对这三种君主制一一评价。他认为“王权的”君主制是一种能够很好地实施权力的国家，是最好的君主制；领主的君主制国家中，人民没有自由，像古代奴隶一样；暴君的君主制无疑是最坏的一种君主制。

《国家六论》通常被人们看做最早论述政治科学的真正现代著作。尽管主要因为风格方面的原因（既冗长又有些乏味），如今的人们很少谈及它，但博丹的观点仍常被引用。在《国家六论》一书中，博丹试图为现代政治学做亚里士多德在近两千年前为古典政治学做的工作。他的目标是创立一般国家理论。

《国家六论》是博丹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他在书中探讨了主权、政体、社会结构、君主主权理论及环境对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影响等问题。在该书中，博丹第一次提出了主权概念，并系统地论述了国家主权理论，从而成为国家主权理论的奠基人。博丹的主权学说和政体分类原则，不仅为反对分裂、对抗贵族、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也为后来世界各国政府维护自身独立自主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提供了理论依据。博丹在阐述自己的理论建构过程中，十分合理地运用了演绎的逻辑手法，他先从家庭推论出关于国家的理论，又从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军事权中抽象出主权的概念。这种推理的运用使该书逻辑严密，丝丝入扣，理论清晰，引人入胜。但在书中，博丹所提出的“公民的权利义务不能平等”以及“夸大环境对社会政治的影响”等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同时，博丹认为“主权”属于君主之类的强力集团，这就使他的理论有为君主专制和独裁统治辩护的意味。

弗兰西斯·培根

弗朗西斯·培根，英国哲学家，近代西欧哲学的开创者之一，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派的创始人，被马克思称作“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培根出生在伦敦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的掌玺大臣，母亲是一个颇有才学的加尔文派教徒。由于家庭的关系，培根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2岁时即进入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学习，担任他导师的是当时很有名气的三一学院院长怀特姬夫特博士。

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培根就对具有1500年历史的知识体系提出了挑战。他宣称，剑桥的教授们把自己的学问建立在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础上是大错特错的。1576年，培根因不满学校教学内容而中途辍学，作为英国驻法大使埃米阿斯·鲍莱爵士的随员到法国工作。1579年，由于父亲突然病故，培根回到英国。从此，他开始攻读法律，21岁时进入一家律师事务所，当上了一名律师。

1584年，培根当选为国会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后来培根结识了女王的宠臣、青年贵族埃塞克斯伯爵，成了他的朋友和顾问。当埃塞克斯失宠、密谋政变被捕后，培根作为证人和密友在法庭上指控埃塞克斯有罪，埃塞克斯即被处死。因为这件事，培根遭到很多人的非议。

詹姆士一世即位后，培根被授予爵士爵位，并且在政界步步高升，1607年被任命为副检察长，1613年就任总检察长，1618年成为大法官，同年被封为男爵。

培根在政界春风得意的时期，也是他积极从事理论著述的时期。

1603 年，他写了《关于自然解释的序言》、《关于自然的解释》、《论时代勇敢的产儿》等文章。

1604 年，培根又出版了《论事物的本性》和《论人类的知识》。

1605 年，培根发表《论学术的进步》，这是以知识为其研究对象的一部著作，也是《伟大的复兴》这部巨著中的第一部分。在该书中，培根论证了知识的巨大功用和价值，高度赞扬了科技文明，批判了无知无识的蒙昧主义，为日后提出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奠定了思想基础。这本书在欧洲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所阐发的科学分类及由此建立的科学知识体系的新结构，是近代科学分类的先导，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对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

1620 年培根被封为子爵，这是培根政治上最显赫的时期。

也就在这个时候，培根的重要代表作、著名的《伟大的复兴》出版了。这是培根要复兴科学、要对人类知识整个加以重新改造的一部未完成的巨著。他计划分六个部分来阐述他的科学哲学，1605 年的《论学术的进步》是第一部分，现在出版的《新工具》只不过是第二部分。《新工具》中培根批判了经院哲学所坚持的亚里士多德那一套科学推理程序，提出了自己的实验归纳方法论。培根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对观察和实验具有重大意义，奠定了近代归纳学说的基础，构成了自那时起科学家一直所采用的方法的核心。《新工具》堪称近代最有影响的逻辑学、哲学著作之一。

就在培根仕途达到顶峰之后，1621 年培根以受贿罪被弹劾。培根的政治生涯结束了，但他很快从消沉中振作起来，埋头著书立说。

他先后出版了《论厄运》、《亨利七世》、《亨利八世》，并写出了《大不列颠史》的大纲。

1623 年，培根把《论学术的进展》译成拉丁文，并进行了增改，把篇幅扩大为九卷本，书名定为《论学术的进展与价值》。

培根在科学方法上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他最先倡导有组织

地集体协作研究。

在他最后一部著作《新大西岛》中，虚构了一个有组织的科学研究机构，是对未来科研机构的一个构想。

1626 年，培根因支气管炎在伦敦逝世，终年 65 岁。培根的去世并没有影响他的哲学在历史发展上所起的伟大的转折作用，作为现代科学的指路人，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是永恒的。

托马斯·霍布斯

托马斯·霍布斯（1588 ~ 1679 年），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开创者，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的创始人之一。出身于一个乡村牧师家庭，自幼聪颖，熟读古典著作，深受当时英国一些抱有自由主义思想名流的影响。由贵族的家庭教师而进入上层社会，曾任培根的秘书。他的自然法思想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之上。著有《论公民》、《论物体》、《论人》、《利维坦》等。

“利维坦”，是《圣经》中记载的一种巨大的海兽，力大无穷。霍布斯以此来为自己的著作命名，表示他主张国家应该拥有强大的权力。他在书中一方面反对封建贵族势力，主张在司法上人人平等；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小资产阶级和平民的民主倾向，主张建立极端的君主专制。

《利维坦》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从人类的自然属性，包括人的感觉、人的想象、人的语言以及人的激情等方面进行论述。作者认为，人类产生的所有概念都是首先从感官上产生的，外界的事物给予人的感官以直接或间接的压力；人类所能够想象到东西是因为我们的感官首先曾经感受到过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不会对未曾感知过的东西产生思想；语言是人类文化传播的载体，没有语言，人类社会就不会有国家、社会和契约的存在；人类能够通过推理探询一个新的结论，这是人类优于动物的地方；人的激情包括欲望、爱好、爱情、憎恨、快乐和悲伤等等，造成人类智慧差异的原因在于激情；人类的知识分为两种，一种是关于事实的知识，另一种是关于推理的知识，如学识；人的权势普遍说来就是一个取得某种利益的手段，而人的价值或身份取决于别人的需要和评价；统治者首先使人民头脑中有一种信念，他们的宗教信条是神的指令，这样人民就更容易接受

他们制定的法律；人性会导致人们彼此相互竞争和猜疑，使人们离异甚至相互侵犯摧毁，这种人人相互为战的状态，使得任何事情都不会是不公道的；自然法是人类理性所发现的一般法则。它能够保证每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所谓自由，就是外界不妨碍人去实现自己的利益。他将所有的自然法归结为一条原则，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第二部分，霍布斯又从人性出发，认为应该建立一种能够保护人们安全的共同权力，即将大家所有的权力授予一个集体。对于某一个人而言，他的权力给予了这个集体，同时其他人的权力也给予了这个集体，那么这个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被称为国家，承担这一人格的人就是主权者。作者接着谈到，对于已经交出自己那一部分权力的人，就必须受到信约的束缚，也必须承认主权者的行为与裁决。主权是不可转让和不可分割的权利，它是一国存在的标志。根据主权所有者的不同，作者将国家分成三种形式：即君主国、民主国、贵族国。主权不因国家的不同而改变，而且国家主权是无限的，不论是谁，如果认为主权过大，就要使它变小。霍布斯用大量的篇幅叙述了法律方面的各种问题，指出法律是根据社会契约由有权统治的人向应该服从他的人所发布的命令。他还阐发了其独到的刑法思想。关于犯罪的概念，他认为凡是违反法律所禁止的言论与行动，凡是法律所规定的而又不遵守，这就是恶，这种恶也就构成犯罪。思想不构成犯罪；犯罪必须是违犯法律的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

最后，霍布斯论述了基督教体系的国家 and 黑暗的国家。在一个基督教体系的国家中，世俗主权者是最高的统治者，全部臣民都由他管辖，所有教士的职权来自于世俗的君主，仰仗世俗主权者的保护。因此，臣民没有义务服从于基督的使者！黑暗的王国是骗子的联盟，为了取得统治人民的权力，他们总是误导人民。

霍布斯是继马基雅维里之后西方近代最伟大的资产阶级政治学家。《利维坦》一书是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该书的政治思想对以后洛克等一大批资产阶级政治学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该书中，作者一方面论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一方面又极力地

为这种专制统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霍布斯的社会政治理论具有极大的启蒙意义，他采用人性论和社会契约论的观点论证了国家的起源和发展，突破了天主教君权神授的观点，对于近代反对宗教、倡导理性的启蒙运动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利维坦》一书所阐述的许多观点与西方传统的政治思想是相反的，因而遭到了许多人的驳斥。然而，由于该书冷静地展现了人性本质及其行为，对政府问题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因而，300多年后的今天此书仍是政治学家的首选必读之作。

阿姆斯·夸美纽斯

阿姆斯·夸美纽斯（1592～1670年），17世纪捷克著名教育家。出生于欧洲宗教改革后的动荡时期。一生经历了民族压迫、宗教迫害和30余年的战争苦难，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但从未因此而放弃或中断对教育理论的研究和对教育实践的探索。夸美纽斯曾长期担任中学校长，这种经历使他能将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夸美纽斯因为在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上的成就而在欧洲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足迹遍布波兰、瑞典、英国、荷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家。据说夸美纽斯在教育方面的著作多达256种，其中最有名的是《大教学论》和《母育学校》。

《大教学论》全书共有33章，可分为6个部分：1～14章为总论部分，讨论了人生的目的、教育的目的、任务、效能、重要性、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和教学理论的根本指导思想等；第15章阐述体育问题；16～22章为教学论，探讨了教学的根本原则；23～26章为德育论；27～32章为学制系统和各级学校的课程设置；最后一章为结论部分，主要谈的是教育改革问题。

第1章可以看做是全书的引言，“人是造物中最崇高、最完善、最美好的”这一标题反映了作者的人文主义世界观，这是夸美纽斯全部教育理论的基石之一。2～4章从人生的目的探讨教育的目的和任务，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来生做准备，教育的任务是知识、德行和虔信。5～7章讨论教育的可能性、必要性和早期教育的重要性，他深信人接受教育的可能性，人是自然就能获得一种关于万物的知识的。凡生为人都有受教育的必要，人不应成为无理性的野兽。人的教育应该尽早开始，能够持久的东西都是年少时学来的。第8章论述学校教育的优越性，学校是最适合接受

教育的地方。第9章论述了普及教育的民主思想，认为一切男女都应该进入学校学习。第10章论述学校的职能，人们从学校学到的应该是最重要的事物的原则、原因和用途，学校还要教人发展每个人的心灵。第11章批评了当时的学校：学校太小、太贵、管理不善、效率低下、纪律松散等。第12章论述了改革学校教育的必要性，第13章探讨一切教育活动中的根本规律——纪律。第14章提出一切教育活动的根本原则就是模仿自然，以自然为导向。

第15章中阐述关于体育的观点。中世纪时教会提倡轻视生命，视肉体为灵魂的监狱。夸美纽斯一反传统，提出要延长生命、爱惜生命、保持身体健康的观点，要求抛弃禁欲主义。16~18章中总结了丰富、具体、有用的教育经验，包括前人和自己长期从事实践的经验。他认为，在自然、社会和人类的活动中存在着普遍性的规律，一切教育和教学都必须服从这种规律，这就是自然适应性。他还强调了教育中每个问题的偏差和纠正办法。夸美纽斯在这三章中提出了对教育改革的主要建议，共有二十几条。19章论述班级学习制，这是针对当时的个别教育制所提出的改革措施。第20~26章分别论述科学、艺术、语文、道德和宗教等具体学科的教育和教学方法，作者对感觉经验做了高度的评价，指出知识的开端永远是来自感官。在德育教育部分，夸美纽斯十分重视以道德教育取代宗教在学校里的地位，同时还对纪律观念做了特别的强调。

《大教学论》的第27~31章论述的是夸美纽斯所建议的新学制以及各级学校的课程设置，还提出了设立学校培训老师的建议。

《大教学论》一书是夸美纽斯的代表作，在其所有著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该书奠定了夸美纽斯教育观及其全部教育活动的基础，他后来的作品和教育实践都是该书所体现的信念的具体化和发挥。从书名来看，《大教学论》只是一部论及教学理论的书，实际上远远超出了教学理论的范围，是一部系统的教育学著作，是作者改革旧教育的全面方案。在书中，作者论及的内容包括教

育目的、原则、方法和内容等多个方面。作者在书中还明确指出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在青年时代的理想，以一种更好的教学方法促进社会和人类的进步。

夸美纽斯在书中所提出的新学制以及课程设置等教育假设，部分地在今天成为现实。西方的教育史著作中都毫不例外地将夸美纽斯称为“教育科学的真正奠基人”。

《母育学校》全书共 12 章，可分为儿童的价值、父母的责任、早期教育的性质和价值、智育、体育保健、德育、宗教教育和幼小衔接等几个部分。

在《母育学校》的开始部分，夸美纽斯提出了与传统的，“性恶说”完全不同的儿童观，他认为儿童是上帝赐予人类的荣耀，并列举了七条理由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在父母的责任部分，夸美纽斯认为，父母不仅从生育子女中获得快乐，还要通过教育和训练来表现自己的热情。为人父母者，必须给予自己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幼儿必须接受教育，目的在于信仰和虔诚、端正德行以及获得语言、艺术等方面的进步。

在早期教育的价值和性质部分，作者认为，德行、智慧和知识不可能自发地获得，只有付出劳动，儿童教育才能达到这一目的。任何人在幼年时代播下怎样的种子，就会在老年的时候收获怎样的果实。为人父母者必须在子女幼小之时奠定三方面的基础：虔诚、德行和智慧。在智育部分，作者首先介绍了学习的内容，儿童在前六年里，必须掌握的知识有：自然事物、科学常识、社会科学知识、音乐知识、语言、绘画和写字等。在体育方面，作者指出儿童天性好动，活动与游戏是儿童成长不可缺少的方式。在德育部分，夸美纽斯认为，幼儿的头几年是形成良好德行的最佳时期，可采用的管教方式有示范、教导和告诫、惩罚、培养等。

在该书的最后两章，夸美纽斯谈到了母育学校和小学的衔接问题。他认为儿童在六岁以前是不适宜上学的，发现儿童能进入公共学校能力的标志后方可让孩子进入学校，父母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就送子女上学是不明智的。

《母育学校》是历史上第一部幼儿教育专著，也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部家庭幼儿教育学著作。该书在儿童教育方面的许多观点在当时是具有历史开创性和预见性的，对幼儿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本书和夸美纽斯主编的幼儿看图识字读物《世界图解》一起构成了他对幼儿学前教育的重要贡献，它对后来的幼儿教育家福禄培尔和蒙台梭利以及杜威等都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勒内·笛卡尔

勒内·笛卡尔，法国数学家、科学家和哲学家。他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奠基人之一。他的哲学与数学思想对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了这样一句话：“笛卡尔，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为人类争取并保证理性权利的人。”

笛卡尔出生于法国，父亲是法国一个地方法院的评议员，相当于现在的律师和法官。1岁时母亲去世，给笛卡尔留下了一笔遗产，为日后他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8岁时他进入一所耶稣会学校，在校学习8年，接受了传统的文化教育，读了古典文学、历史、神学、哲学、法学、医学、数学及其他自然科学。但他对所学的东西颇感失望，因为在他看来教科书中那些微妙的论证，其实不过是模棱两可甚至前后矛盾的理论，只能使他顿生怀疑而无从得到确凿的知识，惟一给他安慰的是数学。在结束学业时他暗下决心：不再死钻书本学问，而要向“世界这本大书”讨教，于是他决定避开战争，远离社交活动频繁的都市，寻找一处适于研究的环境。1628年，他从巴黎移居荷兰，开始了长达20年的潜心研究和写作生涯，先后发表了许多在数学和哲学上有重大影响的论著。在荷兰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集中精力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1634年写了《论世界》，书中总结了他在哲学、数学和许多自然科学问题上的看法。1641年出版了《行而上学的沉思》，1644年又出版了《哲学原理》等。他的著作在生前就遭到教会指责，死后又被梵蒂冈教皇列为禁书，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的思想的传播。

也许笛卡尔哲学的最有趣之处来自他的方法。笛卡尔十分留心被普遍接受的大量错误的概念，决定要达到恢复真理的目的，就须得从零开始做起。因此他开始怀疑一切——老师教给他的一

切，他的所有最崇高的信仰，所有的常识观念，甚至外部世界的存在，连同他自己的存在——总之是一切的一切。

这自然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消除如此普遍的怀疑来获得一切事物的可靠知识呢？笛卡尔用形而上学观点进行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推论，证明出使自己满意的结果：由于他自己的存在（我思我在），上帝才存在，外部世界才存在，这就是笛卡尔学说的起点。

笛卡尔方法具有双重意义。第一，他把“什么是知识”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置于他的哲学体系的中心。早期的哲学家力图描写世界的本质，但是笛卡尔教导我们这样的问题若不和“我怎么能知道？”联系在一起，就得出不了满意的回答。第二，笛卡尔认为，我们不应该从信仰开始而是从怀疑开始（这恰好与圣奥古斯丁及大多数中世纪神学家的看法相反，他们认为信仰第一）。这样笛卡尔确实得出了正统神学的结论。但是他的读者对他的倡导方法远比他得出的结论还要更为重视（教会担心他的著作会起破坏性作用不是没有理由的）。

笛卡尔在他的哲学中强调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区别，在这方面他提倡彻底的二元论。这个区别以前就有人提出过，但是笛卡尔的论著引起了对该问题的哲学讨论。他所提出的问题从那时以来就引起了哲学家的兴趣，但是尚未得到解决。

笛卡尔的物质宇宙观也很有影响。他认为整个世界——除了上帝和人的心灵之外——都是机械运动的，因此所有的自然事物都可以用机械原因来解释。他否认占星术、魔法以及其他迷信形式，同样否认了对事物所做的一切目的论的解释（也就是他寻找直接的机械原因，否定事物的发生是为了某种遥远的终极目的的认识）。由笛卡尔的观点可以看出，动物从本质上讲就是复杂的机械，人体也受通常的力学定律所支配。从那时起，这就成了现代生理学的基本观点之一。

1649年，笛卡尔接受了瑞典女王克里斯蒂的慷慨之邀，来到斯德哥尔摩做她的私人教师。笛卡尔喜欢温暖的卧室，总是习惯晚些起床。当得知女王让他清早5点钟去上课，他深感焦虑不安。笛卡尔担

心早上 5 点钟那刺骨的寒风会要了他的命。果不出所料，他很快就患了肺炎，1650 年 2 月，在他到达瑞典仅 4 个月后，便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笛卡尔是近代科学的始祖，是欧洲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黑格尔称他为“现代哲学之父”。他自成体系，熔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于一炉，在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他又是一位勇于探索的科学家，提倡科学上的怀疑精神，他所建立的解析几何在数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笛卡尔堪称 17 世纪的欧洲哲学界和科学界最有影响的巨匠之一，被誉为“近代科学的始祖”。

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年），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哲学家。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其父黄尊素是东林党的名士。黄宗羲自幼受东林党人的影响，19岁时入京为父诉冤，以铁锥毙伤仇人。以后，他发愤为学，从师著名学者刘宗周，广读诗文经书，学问渊博，与孙奇逢、李颐并称三大儒。清兵南下，他召募义兵，成立“世忠营”，武装抗清。失败后，他隐居起来，潜心读史，探讨救国济世的实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开始了最后几十年勤奋著述、讲学授业的生涯。黄宗羲对天文、算术、乐律、经史百家以及释道之书均为精通，史学成就尤大，所著《明儒学案》开浙东史学之风气。在哲学上，他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提出理气不可分的观点，并认为心就是气。在认识论上，他把“致良知”的“致”等同于行，反对空想空谈，强调并自身积极投入实践斗争。在社会政治方面，他提出君主是天下的大害，天下不应该以君主一姓的存亡为转移，而应该以百姓的忧乐为出发点。黄宗羲还主张改革土地及赋税制度，强调工商皆本。他一生著作盈车，有60余种，1300余卷，主要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案》、《孟子师说》、《破邪论》等。

黄宗羲在1676年完稿的《明儒学案》中，全面地阐述了他的理气观，反映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首先，他在《明儒学案》中指出，宇宙万物都是由物质的“气”所构成，气是客观存在的，它主宰着一切，世界上的一切人、一切事物都是由气产生的，不仅如此，气还亘古越今，永远存在。他说，如果不承认气主宰一切，怎么会有春夏秋冬的依次更替呢？他认为草木的荣枯、寒暑的转换、地理的差异、气象的变化以及人、物的发生、

变化和死亡都是气主宰的。其次，他批判了宋儒关于理先气后、理能生气的说法，指出理是气的理，没有气就没有理。他说，从宇宙的整体看，气没有穷尽，理也没有穷尽，理和气都是永恒无限、无始无终的，二者相依相存，不能分开；从事物的运动变化来说，理是随着气的变化而变化的。他进一步提出，理和气是不可分的。从物体的沉浮升降流动变化来说，这是气；而物体的沉浮升降流动变化的规则、秩序来说则是理。最后，黄宗羲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了气、理、心三者的关系，批判了那种把三者割裂开来的观点。他认为，离开作为宇宙万物本原的气，是无所谓理，无所谓心的。但他有时把心与气等同起来，有混淆精神与物质的倾向。

在人性善恶问题上，黄宗羲主张人性善论，他认为人和万物之性都是由气质决定的，“人之气本善”。他说：“人和万物并立于天地，亦与万物各受一性，如姜桂之性辛，稼穡之性甘，鸟之性飞，兽之性走，或寒或热，或有毒无毒，古今之言性者，未有及于本草者也。”万物有万性，同类则同性，人禀善气而生，有不忍人之性，所以人性是善的。黄宗羲认为，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仁、义、礼、智，是“人生而有之”的，是来自“人心”的，是“人心”自生的“人性”，“人人如此”，“所以谓之性善。”

黄宗羲力主人性善论，但在现实生活中，他无法否认大量恶人存在的事实，当他无法解释这些恶性与善性并存的原因时，只好摭拾宋明理学的陈旧思想——“存天理，去人欲”，把“恶”归之于“人欲”，由于人欲破坏了善性，所以他认为只有“去人欲”才可以“存善性”。

黄宗羲是明代的大哲学家，他的思想体系缜密。他著的《明儒学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哲学思想史。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后人。

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三三，号姜斋，中国衡阳（今属湖南省）人。因晚年在衡阳西乡石船山下隐居，他自称船山老人，或船山老农、船山遗老、船山病叟，后人遂尊称为船山先生。

王夫之出身于日趋没落的地主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代一方面眷恋着科举考试的旧路，另一方面关心动荡的时局，参加“行社”、“匡社”等，立志改革社会。农民革命的风暴打破了他“学而优则仕”的梦幻。但他拒绝张献忠农民军的礼聘。明亡后，他于1648年在衡山举兵抗清，失败后退至肇庆，后任南明桂王府行人司小官，又到湘南一带过了几年流浪生活。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麓，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从事学术研究。

王夫之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等都有所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是明清之际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王夫之坚持事物运动的内因论，反对外因论。他认为，事物的变化是由于事物内部的对立面相摩、相荡，明确阐述了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万物变化的源泉。

王夫之对事物内部“两端”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抛弃了（周易）八卦以乾为首的观点，认为乾与坤、阴与阳没有先后之分，矛盾的双方相互依赖，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独立存在，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他还认为，矛盾的双方没有固定的主辅地位，在一定条件下为主的一方在另一条件下就会转变成成为辅的一方，同样，在一定条件下为辅的一方也会在另一条件下转变成成为主的一方，矛盾双方的地位可以转化，人们不应当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去看待事物的对立面。

王夫之还进一步用对立面斗争的观点解释社会现象。他明确肯定：豪强兼并的人家与流离失所的百姓是社会的两级，二者是尖锐对立的。他认为，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激烈的斗争，并不完全是坏事，也可能会引出好的结果。他意识到对立面的斗争会促成矛盾的转化。

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一书中，批判了宋明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观点，提出了“天理”“人欲”并存不悖的思想。他认为天理和人欲都出自自然，离开人欲就谈不上什么天理。他说：“理欲皆自然”，“终不离欲而别有理”，“天理人欲，虽异情而亦同行……天理充周，原不与人欲对垒”。王夫之在这里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望的合理性。

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中，对“道”与“德”的内容及其关系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人们对于一般的“道”，应该遵循和笃信，而对于具体的“德”则应加以变通和弘扬。

最后，王夫之得出结论，“故道可弘也，而不用乎笃信也；德必笃信也，而不弘以执之也。”就是说，当人们在把握“道”，即把握一般的规律和原则时，应该把它看作是可以弘扬发挥的东西，而不能把它视为不可移易的教条而加以“笃信”；当人们在把握“德”时，又必须有所“笃信”，不能借口“弘道”而根本抛弃“道”。这里包含了既尊重客观规律，又不把规律当作教条去死守的思想因素。

王夫之的思想博大精深，自成体系，达到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的最高峰。

帕斯卡

帕斯卡（又译帕斯卡尔，1623 ~ 1662 年），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1654 年，他提出二项式展开系数的三角形排列法，即帕斯卡三角形。1651 ~ 1654 年，他提出了著名的帕斯卡定理。他的物理学主要著作有：《关于真空的新实验》、《液体平衡的大量实验之报导》、《论液体的平衡和空气的重量》。在哲学方面，主要著作有《思想录》。为纪念帕斯卡研究大气压强所做的贡献，压强的单位帕斯卡以他的姓氏而命名。帕斯卡首先是一位科学家，他是近代概率论的奠基者。他又是一位哲学家，其思想理论集中表现在《思想录》一书中。他所建立的直觉主义原则对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如卢梭、柏格森以及存在主义者很有影响。

《思想录》一书可分作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未提及宗教，仅仅只陈明人性的堕落。第二部分从圣经证明救世主的存在。帕斯卡尔对《圣经》的解释非常严格，显示他是一位不合时宜的基本教义主义者，致使第二部分失去说服力，不过对生活在社会和宇宙的个人先锋形象的描绘仍不失迷人之处。

帕斯卡将人类的知识分成肉体的、理性的和精神心灵三种，其论证特性是将严格的限制强加于理性之上，甚至在自然科学、尤其在宗教方面。在帕斯卡的术语中，心灵为理性提供基本的观念，例如时间和空间，同时也运用在与推理无关的情绪、美学和宗教领域中。

帕斯卡一方面以理性批判一切，同时又指出理性本身的内在矛盾和界限。他主张从两极观念的对立入手，考察人性，以及世界、人生、社会、历史、哲学、信仰等问题。

《思想录》是帕斯卡尚未完成的手稿，但大部分业已大致成章，斐然可读，文思流畅，清明如水。

1656 年，帕斯卡被说服为阿尔诺辩护，因为阿尔诺遭受巴黎索邦大学神学院关于神学理论方面的禁令。帕斯卡以匿名的形式发出了一系列《致一位省长的信》。其中前十封可谓法国最佳讽刺作品，其目标是耶稣会伦理神学。在这种神学辩论尚未结束时，帕斯卡已决定向广大民众发表演说，即用《为基督教辩护》一书发表其见解。直至去世时为止，他一直将聪明才智投入此项辩论工作中。由于其健康情况非常差，以致大部分工作都零碎不堪。这些首次出版的辩论文章，在 1670 年收集于名为《思想录》的书中，帕斯卡亦以此著作闻名。

夏尔·孟德斯鸠

夏尔·特·孟德斯鸠，1689 出生于法国波尔多附近拉勃烈德城堡的一个贵族家庭，孟德斯鸠的家族——瑟孔达家庭是一个古老的、出过不少文官武将、且富有田产宅第的“长袍贵族”。孟德斯鸠的高祖父购买了“孟德斯鸠领地”，他的祖父曾任波尔多法院院长，此职后由他的伯父继任。他的父亲是个军人，因不是家中长子，按照封建社会“长子权”的俗规，没能承袭爵位与封地，仅从孟德斯鸠的母亲的陪嫁中得到一处庄院与封地。

孟德斯鸠生逢路易十四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由于法王路易十四实行了长期的“绝对专制”，百姓怨声载道。因此，这个“鼎盛”的封建社会实则外强中干。

孟德斯鸠 11 岁到巴黎附近的一所教会学校里读书。尽管学习的内容是一套拉丁文的古典教育，但却使他了解和熟悉了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政治制度，为他后来的著书立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706 年，孟德斯鸠受家庭的影响，专攻法律，两年后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并出任律师。孟德斯鸠到了法定做官的年龄后，被任为波尔多法院参议员。1715 年，他与一位军官的独生女、信仰加尔文教的贵族小姐结婚。获得 10 万英镑的嫁资。翌年，按照病故伯父的遗嘱，他不仅继承了伯父的产业，承袭了孟德斯鸠男爵这个封号，而且还继承了伯父的波尔多法院院长的职位。从此，他开始了影响深远的政治学术研究活动。

孟德斯鸠踏上仕途之时，正逢路易十五继位。此时法国极端腐朽的封建专制趋于没落，加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冲击，法国社会阶级矛盾异常激烈，形成了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的尖锐对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制度内部竭力为自己开辟道

路。

孟德斯鸠对世袭的波尔多法院的职务并不感兴趣。相反，成立于1716年的波尔多学士院，倒引起了他的更多热情。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叛者，作为还比较幼弱的法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从这里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孟德斯鸠博学多才，不仅对法学、史学、哲学等颇有修养和造诣，而且也撰写了有关《论重力》、《论相对运动》等自然科学论文，且有一定的影响。1716年，27岁的孟德斯鸠被选为波尔多科学院院士。

1721年，孟德斯鸠发表了鞭笞时弊的名著：《波斯人信札》。此书用讽刺的笔调，勾划了上流社会中形形色色人物的嘴脸，表达了作者对路易十四的憎恨，倾注了法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与感情。此书的发表，使他的声名大震，一举而成了法国文坛上瞩目的人物。

1731年孟德斯鸠在游历欧洲各国后，他埋头整理资料潜心著述。1734年，写成《罗马盛衰原因论》一书，这本书被认为是孟德斯鸠的思想完全成熟时期的著作。此书用古罗马的历史材料来阐述他的政治主张，认为一个国家的兴衰是由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的优劣决定的。这本书尽管反映了孟德斯鸠的唯心史观，但他也引证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以及风俗习惯等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共和制来反对专制暴政，显然有着历史进步性。因此此书成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源泉之一。